無錫文博

主办单位：无锡博物院
无锡市文物交流中心

封面题字：冯其庸

《无锡文博》编辑委员会

主　任：黄浩然

副主任：蔡卫东　杨建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军　王　莹　王刚毅　刘宝山
邢　娟　邹忆军　杨启明　陈建忠
陈建强　陆建新　陈　宇　陈　蓉
贡振亚　周小东　周小萍　金石声
林　琰　荣骏炎　赵建高　徐　韡
陶　冶　郭会文　黄兴南　盛诗澜
梁溪清　阎智海　韩　锋

主　　编：盛诗澜

执行主编：阎智海

编　　审：蔡卫东

编　　辑：薛鸣法　何　桦

装帧设计：杨琪蕙

目录 contents

● 专题

南宋高宗时期的无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锡史料解读 …… 顾吉辰　03
两《唐书·李贞传》匡正 …… 李心言　14
南齐《善卷寺记》是我国最早的梁祝记载
——兼论江苏宜兴是梁祝传说之源 …… 路晓农　19
再说“绿萝庵里看梅花” …… 石　雨　27

● 历史

解放前无锡报业“四大天王”结果迥异 …… 吴伟勋　29
张闻天与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 王　玲　32
庆丰纱厂 1943 …… 顾　征　37
唐文治故居轶事 …… 于　芷　41
孙武及其《兵法》诞生于无锡？ …… 顾一群　44

● 博物馆

致力城市文博服务　打造奉献公益团队
——综述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两年发展概况
…… 陈　蓉　46

让城市中的名人故居“复活”

——浅谈无锡市薛福成故居的保护、利用与发展 …… 顾　璟　52

问渠哪得清如许

——关于宜兴市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思考与实践 …… 郝殿峰　54

● 品鉴

停云馆帖考（十九）…… 周道振　57

宜兴市博物馆藏“吴云根鱼化龙紫砂壶”…… 朱轩林　73

● 艺术

一件见证现代学人交谊的书信

——钱锺书友人郭晴湖与徐燕谋书墨迹纪事 …… 邹绵绵　75

● 资讯

江阴“霞印天下——徐霞客主题书画展”巡展昆明市博物馆 …… 51

《锋芒都尽墨无声——安徽博物院藏砚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 …… 56

《吴地雅事——无锡博物院藏文氏一门书画特展》开展 …… 74

《江上数青峰——钱瘦铁作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 …… 80

《无锡文博》出版方式改革创新的方案 …… 81

《无锡文博论丛》征稿启事 …… 84

关于开展 2014—2015 年（十三届）无锡文博界优秀论文评奖活动的

启事 …… 84

《无锡文博》编辑部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广场南侧

钟书路 100 号无锡博物院 503 室

邮　　编：214023

电　　话：(0510)85727606

电子邮箱：wuxiwenbo@163.com

印　　刷：无锡市锡沪胶印厂

准印证号：锡新编(K)字第 208 号

出版日期：2015 年 12 月

封面：顾曾寿　九日闲居图

(无锡博物院藏)

封底：南宋　白玉镂雕竹节龙纹饰片(一对)

(无锡博物院藏)

专题

南宋高宗时期的无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锡史料解读

顾吉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的作者是李心传,他生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卒于理宗淳祐三年(1243),享年78岁。他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要录》共200卷,记载宋高宗赵构一朝36年的历史,起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这36年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多事、动乱的时期。北宋灭亡,南宋初建,南北交兵,兵变频发,抗金议和博弈。高宗"偏安江左"时抗金将领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壮的话剧。李心传用编年体裁的史书,逐年逐月逐日记载了这36年间所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要事、大事,其中也不乏记载了今天无锡市,包括江阴、宜兴、无锡三地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官宦等各方面的记录。它对于人们思考历史兴衰、无锡当时现状,均有启迪。本人不揣学识浅陋,在阅读《要录》时,将涉及无锡方面的有关材料,逐一抄出,并加以解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无锡史料不致于湮没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不当之处定多,请方家指正为感。

1.《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午》条云:

诏亲征行营副司、河东宣抚使司官属见责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议郎裴廪,直秘阁沈琯,朝奉大夫韩璿、刘正彦,奉议郎张焘,承务郎邹柄,宣教郎何麒,从事郎何大奎、刘默、张牧等十七人,并与差遣。元若,桐庐人,尝为秘书少监,……大奎,无锡人,与焘皆尝为秘书省正字,……李纲之谪江宁也,元若等皆坐累贬降,至是悉复之。

按:李纲(1083-1140)其祖始居无锡,无锡有梁溪,因此被称为"梁溪先生"。钦宗靖康时出任亲征行营使,保卫汴京有功,遭投降派排挤。他的抗金派官属包括何大奎在内一行十七人均受到贬降。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以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行在。就在抗金派重新掌控国政大事时,李纲的原先抗金人士也一一复出,无锡的何大奎仍然任秘书省正字,与李纲共同肩负抗金治国的重任。从这则历史记载看出,在国家多事之秋,无锡籍的官员与人士是爱国的,是以民族大业放在首位的。

2.《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己酉》条云:

是日,贼军高胜等入常州。先是,胜等过平江,守臣奉直大夫赵研乘城为备,募举人出城外招安之。胜坐举人于木驴,碎之城下。研乃诱胜使入,即脔之。众惧而退,推其徒赵万为首,至无锡县。观文殿大学士李纲方寓居,惧及,出家财散之,贼乃去。

李心传在此则记事后注文又云:

熊克《小历》云,至无锡县,知县郗渐单马造贼中大言曰:"圣驾幸东南,先驱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渐曰:"若等无他,宜于此时转祸为福。"众瞿然相视不敢动,遂送之出境。此据孙觌所作《郗渐墓志》,恐未必果然,今姑附此俟考。

关于"贼军"即兵变人员撤退无锡,有二种说法。一则是李纲在无锡(李纲于建炎元年八月罢相,寓居家乡无锡)疏家财,使"贼军"散去;一则是知县郗渐单骑贼中,进行宣传,高宗"圣驾"至此,迫使赵万等离去。李心传是采用李纲疏财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在民族矛盾高涨之时,兵变人员乘机破坏社会稳定,此举只能为全社会、国家添乱。从这一高度出发,李纲利用自己的前宰相地位以及抗战派首领的崇高声望,规劝"贼军"不可入无锡县境胡作非为,这种举措是相当了不起的,值得一书。李纲的这一义举换来了今天无锡人民的文明,换来了无锡物质、精

神两个层面的时空提升。

3.《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冬十一月戊子》条云(图一、图二)：

银青光禄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李纲鄂州居住。时殿中侍御史张浚等论纲罪状未已。浚言：纲邪险不正，崇饰浮言，足以鼓动流俗，非窜


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於市無得脫者
日歷以此事爲劉光世林泉野記熊克小歷等書皆作王
淵今從之蓋淵領兵往杭州在光世之先故因過鎮江而
遂不
之也
李孝義既攻德安府不能下統制官喬仲福遣人招之是
月孝義行至靳州張世斬之以降擇其徒强壯者隸軍餘
老弱失業者皆還之
十有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輿
戊子銀青光錄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
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綱邪險不正崇
飾浮言足以鼓動流俗非竄之殛之上無以謝宗廟下無

图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影


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弁製造
緋巾數千遣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
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
愎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
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
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
之誅猶當竄之嶺海遐遠無盜賊之處庶幾國家可以少
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
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
無錫縣郁漸嘗郊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

图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影

之殛之。上无以谢宗庙，下无以谢民生，次无以严君臣之分，而国是纷纷。……今陛下驻跸维扬，人情未安，纲居常州无锡县，去朝廷不三百里。纲素有狂愎无上之心，复怀怏怏不平之气。而常州闾阎，风俗浅薄，知有李纲而已，万一盗贼群起，藉纲为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以为李纲者。……又奏承议郎知无锡郁渐尝郊劳纲，且与之燕。渐坐除名。渐，临清人也。

李心传注引吕中《大事记》云：

胡安国之疏曰：赏罚政事之纲，必先核实，而核实必自大臣与台谏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贤否，则有公论矣。而言者独攻纲为甚，一言而罢相，再言而罢职，又再言而投诸海岛，施于纲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则以所毁乱真而不核实。如西防江复令招刺诸州，劝纳发招讨司，未有以为非者。在纲行之，则谓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则独以为可。此不核实者一也。……劫寨之事，人以为姚平仲讲于帷幄，种师道、李纲之所不与也。而乃谓纲之用心，欲置君于何地，此激怒为不贷之罪。此不核实者六也。

从张浚对李纲的攻击，从另一角度证明李纲的一切主张与行为是正确的。他在长三角地区的威望是崇高的，足以撼动高宗统治的基础。正因为高宗听了张浚等人的谗言，将李纲一贬再贬。但是士大夫官僚集团中忠肝义胆者也不乏其人。胡安国就从六个必先核实的理由为李纲张声、辩诬，痛批张浚等台谏官员的投降行径。

4.《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丁亥》条云：

上至无锡县。县令任谌供办整肃，有同宿戒。上再三称奖。

按：这是高宗赵构南渡后第一次到达无锡。无锡县令任谌“供办整肃”，受到高宗“称奖”。但是高宗背后毕竟有金兵压境、追赶，他的一行人马一定很狼狈。吃住行宿只能将就。在无锡历史上，除了清代一些帝王到达无锡“巡视”之外，南宋高宗的足迹也光临过这块沃土，而且是在多事

之秋。另外,任谊的前任是郗渐,由于张浚弹劾李纲而牵连,于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名。这二位无锡县令,应当载入史册。

5.《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辛酉》条云:

御舟泊临平镇。户部尚书叶梦得自宜兴间道之杭州,至是来迓。梦得言:"平江、江宁两府所留上供,约可支半载。欲刷杭州诸司所有借支,俟取两处钱帛至而偿之。"又请更给百官诸军券历及命官权领户部司农太府职事。皆从之。

按: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上次常州",乙卯"上至无锡县",丙辰"上次平江府",丁巳"下诏慰抚维扬迁徙官吏军民",己未"上次秀州",庚申"御舟次崇德县",辛酉"御舟泊临平",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官,显宁寺为尚书省",一路南逃相当紧张。在"御舟泊临平镇"时,户部尚书叶梦得从"宜兴间道之杭州",向高宗禀报平江、江宁两府所留上供财物事情。从叶氏的报告中,似可说明当时江南的苏州、南京这二个地方的财政经济十分不错。北方的战乱,对太湖流域的宁、镇、常、苏、湖等州府影响不大。仅平江、江宁二府上供"可支半截",至于杭州诸司所有借支,亦可取两处钱帛进行协调解决。叶梦得《宋史》有专传,苏州吴县人,迁居湖州。绍圣进士。高宗建炎、绍兴年间,致全力于抗金防务及筹措军饷官俸,使朝廷内外悉力以战。他在户部尚书任上对高宗的建言与报告是正确的。

6.《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庚辰》条云:

金人分兵犯江阴,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纺遣统制官王焕等拒敌,且谓承事郎、签书判官厅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义。公宜勉之,毋少避。"易归告其母蒋氏,蒋氏曰:"我去则汝决不肯坚守。顾与汝同生死。"闻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备,亦引去。

李心传注文云:

此以郑纯所作序及胡纺祭文。易,绍兴十一年八月癸未陈乞加封状参条。序,以为建炎庚戌(即三年)三月二日事,故附于此日。

从李心传的正注文考察,金兵犯江阴,江阴守臣胡纺作了一定的准备,并进行了思想动员。王焕、李易以及易母蒋氏,他们都是今天无锡、江阴人民值得敬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生死关头,以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另,李易者,字顺之,江都人。建炎二年进士第一。历官屯田郎中,累迁敷文阁待制致仕。事见《北山小集》卷二四,《东窗集》卷六、八、九,《宋历科状元录》卷五等。李易父李孝友,历官南剑州司理参军、吉州参军,赠朝请郎。其母蒋氏,赠令人;妻牛氏,封令人。事见《欧阳文忠集》卷七九、《东窗集》卷七。另,江阴统制官王焕,华阳人。北宋真宗、仁宗朝宰相王珪孙。绍兴十二年(1142),除敷文阁待制知临安府,十四年以工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出守平江。事详《乾道临安志》卷三、《吴都文粹》卷一、卷三《御书阁记》、《本朝牧守题名记》等。在"靖康之难"前后,亦是一位抗金志士。

7.《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己丑》条云:

尚书礼部侍郎,节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阴军军马张浚言:"臣伏睹睿圣皇帝亲笔,伏读再三,不觉涕泣。臣窃以国家祸难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国事,补报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负睿圣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圣皇帝以不忍生灵之故,避位求和,固为得策,然臣自有说,不敢不具陈其详。……万一强敌侵陵,不肯悔祸,则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

按:建炎三年三月,张浚是节制平江府、常湖州、江阴军军马的最早军事长官,直接与金兵抗衡。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他是反对"睿圣皇帝""避位求和"的。也就是说,张浚一方面排挤了李纲之后,掌控了长三角地区的政军大权,另一方面对皇帝的"求和"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历史就这样作弄人。

8. 同上书卷《建炎三年三月庚寅》条云:

尚书礼部侍郎、充御营使司参赞军事、节制

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阴军军马张浚试礼部尚书，以所部赴行在。

按：这是高宗或许采纳了张浚的抗金建议，放弃了“避位求和”的主张，将张浚擢为“礼部尚书”，“以所部赴行在”。但从高宗一贯所持的“求和”态度来看，用假升官、实解兵权的办法处置张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9.《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戊戌》条云：

御营平寇前将军韩世忠以所部发平江。初，苗傅闻韩世忠自海道还，以都统司檄命世忠屯江阴。……世忠发平江，舟行不绝者三千里，甲士尽载其上，军势甚振。

按：建炎初，大将韩世忠军队驻扎在江阴，抵御金兵渡江南下。但是，建炎三年三月，武将苗傅、刘正彦等在“行在”杭州发动兵变，杀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及宦官康履等，逼高宗传位于幼子旉，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文臣吕颐浩、张浚及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浚等起兵，杀苗傅、刘正彦等。高宗遂复帝位。李心传记述了当时屯驻在江阴的韩世忠率领部队从平江进发杭州，讨伐叛将苗、刘“军势甚振”的过程。

10.《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卯》条云：

御营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部分，请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镇江府至江阴军，悉令允之措置。从之。

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江阴一直处于长江与大海交汇处的核心区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同样如此。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但他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了镇江府至江阴军的沿江与海岸地分。这恐怕当局从二方面考虑的：一是秋收季节快来了，防止兵变民变对社会农业生产的破坏，影响朝廷统治的经济基础；二是怕秋天到来，金兵乘机渡江南侵，掠夺江南富庶的财物，所以派遣大臣康允之管理。康允之，建炎二年以徽猷阁待制知杭州，三年兼浙西制置使。事详《南宋制抚年表》、《大隐集》卷一《除徽猷阁待制制》、《乾道临安志》卷三。

11.《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条云：

是日，上幸登云门外阅水军。时谍报金人陷登、莱、密州，且于梁山泊造舟，恐由海道以窥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尽护诸将。至是辅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数百里，缓急禀命，恐失事机，请以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充两浙江淮守御使。自镇江至苏、常界圌山、福山诸要害处，悉以隶之。上曰：“未可……止令兼圌山足也。

己酉，上次常州。庚戌，上次无锡县。晚朝进呈，周望言：“昨晚望气楚清党，尝占天象，牛宿光明，正在东南，敌骑不渡江，第恐扰关、陕、襄、邓，为五路灾尔。”上曰：“大率皆本《晋·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纬之学，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人往往习知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

按：上述《要录》记录，反映了几方面的事情。首先，高宗赵构第二次巡视无锡，从庚戌日至辛亥，约在无锡视察多天。其次，这次高宗出巡，是基于“时谍报金人陷登、莱、密州，且于梁山泊造舟，恐由海道以窥江、浙”的金人南侵所使然。再次，高宗对星纬之学是不相信的，一如祖宗之家法，实行禁止。他敢于面对现实，对周望的建言持否定态度。最后，从周望的建言内容看，在近千年前无锡，其生态环境相当好，成了他占象的基础。周望者，累官兵部尚书，迁端明殿学士。建炎三年七月，拜同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枢密院事。次年五月，罢提举江州太平观。事见《浮溪集》卷十一《除兵部尚书制》、《北海集》卷三《除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制》。

12.《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丁卯》条云：

尚书金部员外郎王冈为御营使司参议官。冈，无锡人。吕颐浩之守扬也，冈通判州事，多所赞助，颐浩德之。至是外召为郎，寻荐对而有是命。

按:关于《要录》此处记载的王冈,其生平事迹,据《张华阳集》卷三《除直秘阁宫观制》、《鸿庆居士集》卷三四《直秘阁致仕王公墓志铭》、《宋元学案补遗别附》卷一,是这样的:王冈字寿基,无锡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授睦州青溪县簿,累迁左司员外郎。建炎初召为尚书郎,除直秘阁,主管临安府洞霄宫,移台州崇道观,以左朝散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冈早以文艺游场屋,为名进士。长于《易》,尝著论以黜先儒之谬,晚年深明《春秋》之学。上述《要录》还记录了王冈与吕颐浩的爱国情结。建炎初,金兵下扬州,知州吕颐浩、通判王冈二人精诚团结,共同抗金。后来颐浩执政朝廷,对王冈"德之",荐对高宗,王冈成了御营使司参议官,参与了高层抗金斗争的决策。作为今天的无锡史志,对王冈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应忘记。

13.《要录》卷二九《建炎三年十一月甲子》条云:

陈淬与完颜宗弼遇于马家渡,凡战十余合,胜负略相当。王璮引西兵先遁,淬孤军力不能敌,还屯蒋山。水军统制邵青以一舟十八人当金人于江中,舟师张青中十七矢,遂退于竹条港,统赤心队。朝请郎刘晏以所部走常州,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悉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既闻敌南渡,即引舟之江阴,知江阴军胡纺厚待之。

按:在完颜宗弼从马家渡登上江南后,在陆地或江上,均遇到宋军将士的顽强抵抗。陈淬、张青等就是;但也有溜之大吉者,如王璮。韩世忠"闻敌南渡"后,他焚烧了镇江"城郭","引舟之江阴","所储之资,尽装海舶",作了战略转移,布防在镇江的下游江阴,还受到知江阴军胡纺的厚待。看来韩世忠对江阴光顾与驻屯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值得今人寻访当时的遗存。

14.《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春正月丙辰》条云:

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掠,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按:建炎四年(1130),岳飞军队驻屯宜兴县,其岳家军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守防尽责,广大人民免受溃卒、土匪、金兵之侵扰掠夺,声誉卓著。今天学术界对岳飞的归宿均有一个固定模式:即被宋高宗赵构、宰相杀害。其中学者们大多引经据典、考证史料,加以说明。但他们又忽视了当时宋金对峙的实际情况、双方力量的消长平衡等因素。换句话说,必须将岳飞回归到真实历史的环境中考察,使假设的岳飞成为历史真实的岳飞。

15. 同上书卷《建炎四年二月丙戌》条云:

是日,金人自临安退兵。初,完颜宗弼留临安,闻浙西制置使韩世忠自江阴趋镇江,恐邀其后。是月庚辰,宗弼敛兵于吴山、七宝山,遂纵火,三日夜烟焰不绝。癸未,火息。

按:完颜宗弼掠取临安,宋高宗移走明州海上,宋将韩世忠以浙西制置使从屯兵之地江阴,前往镇江布防,拟在宗弼退出临安,从镇江返回江北途中一举歼灭金兵,即宗弼"恐邀其后"的考虑。从这则《要录》记事,说明南宋建炎年间,宋金军事交构频繁时期,江阴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一度成为大将韩世忠的屯驻重地。江阴成为军事要塞一直持续到明清民国,这跟江阴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

16. 同上书卷《建炎四年二月辛卯》条云:

金人陷秀州。先是两浙宣抚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敌自越州还金陵者。望素不严斥堠,但以传闻之语为信。……望闻金师至崇德县,壬辰,调太湖舟千艘赴吴江御之。

按:据《大隐集》卷三《宣抚使制》及《宋大臣年表》、《北海集》卷四《除两浙宣抚使制》等记载,周望累官兵部尚书,迁端明殿学士。建炎三年七月拜同签枢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枢密院事,次年五月罢提举江州太平观。周望罢为闲职的原因,显然是在职放松军事警惕和准备,致使金兵攻陷秀州。另外,"调太湖舟千艘赴吴江御之",

其“太湖舟”,当然包括无锡在内的湖州、常州沿太湖周边城市的船只千条。说明无锡地区的造船事业颇为发达,水军训练有素,可以抵御金兵的水路北撤的情势。

17. 同上书卷《建炎四年二月辛丑》条云:

初,保宁军承宣使、权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阎勍自西京携所部数千人至越州行在。上以金人入寇,命勍节制淮西等路军马,往据之。勍行次崇德县,闻敌已犯临安,遂至平江,招军得数百人,自江阴渡江,入柴墟镇。

按:据《宋史翼》卷三〇《阎勍传》云:建炎初,官保宁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崇泽奏保护陵寝使。建炎二年九月以所部奉西京会圣宫祖宗神御南归。四年擢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节制淮南军马,屯于定远县,为金所执,不屈死,赠昭化军节度使,谥壮节。上述史实,是阎勍赴淮南西路节制任上,途径江阴之记录。《宋史翼·阎勍传》未记载其“自江阴渡江”一事,可谓珍贵。

18. 同上书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癸卯朔》条云:

是日,完颜宗弼去平江府,时敌之后军泊吴江县,下临太湖,石岸险狭。统制官陈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乱不整,思恭小捷而退。……丁未,是日,陈思恭自乌墩至平江。周望自遁所乃领兵之吴兴。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抚使印,敌既退,募善没者于湖中求得之。上闻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袭敌师,以功赎过。是役也,平江民死者近五十万,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上嘉陈思恭太湖之功,寻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团练使。

按:上述《要录》记载,可说明以下四个问题:首先,完颜宗弼撤离临安后,经过平江府,宋守臣周望逃遁。其次,统制官陈思恭利用“敌之后军泊吴江县,下临太湖,石岸险狭”的不利地形,“以兵邀之,金人舟乱不整”而获得胜利。看来金人是从吴江县下太湖,乘舟由太湖前往无锡,然而沿京杭大运河无锡、常州、镇江或无锡江阴段过长江北撤。无锡显然是完颜宗弼北撤之必经道路。再次,平江民死者近五十万,得脱者十之一、二。看来当时太湖地区的人口是多的,与当时经济发达有关;但同时也看到战争是残酷的,金兵北撤,杀戮破坏是严重的,后人更要珍惜社会和谐的局面。最后,陈思恭“太湖之功”永载史册。

19. 同上书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壬子》条云:

金人犯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闻敌至,弃城走宜兴县,敌遂入常州。

按:在金兵北撤过程中,知常州周杞是一位放弃抵抗、逃命第一的官员。由于他的不抵抗逃跑为先的结果,导致常州失守。史学家李心传以“闻敌至,弃城走宜兴”的直笔,对周杞的可耻行径作了严厉的揭露。

20. 同上书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金人进犯泰州,飞以泰州不可守,弃城去,率众渡江,屯江阴军沙上。李心传自注云:“飞弃泰州,据赵甡之《遗史》,在此月癸卯。《日历》,飞奏,十一月七日自柴墟镇渡江,七日丙午也,故系于此。”

按:当时岳飞任通泰镇抚使,金人进犯泰州,飞以泰州不可守,弃城由柴墟镇渡江,屯江阴军沙上。金左监军昌既得楚州,有经营南渡之意,即再次南下进攻南宋政权的意向。在评价岳飞的历史功劳时,对他弃泰州城,率众渡江江阴沙上的做法也必须指责,决不能将岳飞奉为神明。另外,李心传对岳飞弃泰州的记载是依据了当时官方的记载《日历》,以及时人赵甡之《遗史》。换句话说,证据是充实的,材料是过硬的。

21. 同上书卷《建炎四年十一月庚申》条云:

通泰镇抚使岳飞以失守待罪。诏飞赴江阴就粮,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透漏。

按:“失守待罪”,这是事实。但高宗对岳飞还是宽容的,仍下诏叫“飞赴江阴就粮”,解决飞仓促弃城南渡,缺乏军粮等问题。其目的是令飞“极力捍御金人”,并警示他如此行动“毋得透漏”。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高宗赵构是持逃跑

不抗金的政策,他是一位卖国求荣的可耻皇帝。通过上述史料。说明高宗并不完全如此。

22. 同上书卷四一《绍兴元年春正月乙酉》条云:

岳飞自江阴军引兵之洪州。飞行至徽州,有诉其舅姚某骚扰者。飞责之。他日,舅因驰马射飞不中,飞擒而杀之。

按:上述记录,说明三个问题:其一,高宗对岳飞的军事能力是充分肯定的,对岳飞爱国爱民之态度是充分信任的,绝不含糊,所以派遣他率领军队从江阴赴洪州(即今天的江西南昌)负责江西的军事防守,抗抵金兵。其二,岳飞是深得百姓爱戴拥护的将领。在他途径徽州时,为受害百姓受理案件,严责骚扰者姚某。其三,岳飞差一点受到姚某的暗害:"舅因驰马射飞",幸亏"不中",否则,岳飞前途未卜。当然,对此恶棍,只能"擒而杀之",伸张正义。

23. 同上书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甲申》条云:

邵青自太平州以舟师泊镇江,留三日,是日,复叛去,引兵趋江阴。

按:据《南宋书》卷一七《邵青传》、《宋会要》、《要录》等有关书册记载:青济南人。原为五丈河船工,后为盗。靖康之变,率众聚舟于楚、泗间。建炎三年(1129)受杜充招安,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制。曹夺金人船,与金人战于建康江中。绍兴元年(1131)叛,攻太平州,滥杀百姓。复受刘光世招安,引舟师至镇江。再叛而东,掠江阴、崇明等地。复受宋招安,为枢密院水军统制。十年,为濠洲兵马钤辖,金人陷濠洲,巷战而死。

24. 同上书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丁未》条云:

殿中侍御史章谊言:"闻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经由镇江府、江阴军遂入平江之常熟县,所至劫掠。刘先世以枭将锐兵而不能应时擒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先世皆平陆之兵……今邵青小丑,先世大帅,乃敢越境深寇,使贼有大于此者!将何以御之?臣……望于驻跸之地,置一水军,帅以名将,计亦易办。"诏淮南三宣抚措置。

按:邵青舟师之威力,由此可见,连大帅刘光世都无法应付,任青一路劫掠到无锡江阴,并后来移舟通州海门镇、崇明。章谊建议在行在置一水军,帅以名将。不久,邵青被刘光世再次招安,授以枢密院水军统制,落实了章氏的建言。历史就这样诡异和真实。

25. 同上书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甲辰》条云:

诏以镇江府、常州、江阴军苗米三十七万斛为刘光世军中一岁之用,仍令漕臣分月给之。

按:据《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东都事略》卷一〇七《刘光世传》、《至顺镇江志》卷二一等书册记载:字平叔,保安军人,延庆子。以讨河北贼有功,授奉国军承宣使。从高宗南渡,命为制置使,屯镇江。苗刘为乱,光世与韩世忠讨破之,迁太尉御营副使。及张浚扶师淮上,命光世由太平州移屯庐州,浚言先世不可用,遂引疾罢军政。后封杨国公。卒年五十四,溢武僖。光世于诸路将中最先进,驭军无法,逋寇自资,见诋公论,故早解兵权,浮沉以终。此外,高宗下诏将镇江、常州、江阴三地苗米三十七万斛为刘光世军中一岁之用,令漕臣分且给之。可见确保刘光世军粮的兑现与落实,使光世坚定卫国抗金之决心。再则,三地苗米三十七万斛的数量可谓不少,说明长三角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

26. 同上书卷五四《绍兴二年五月乙丑》条云:

直徽猷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徐天民罢。先是上闻常州科敛害民。遣度支员外郎胡蒙往究其实,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与求奏:"朝廷号令之出,要当使民信之而已。方体究其罪,乃加除擢。赏刑措乱,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恶如此,傥使胡蒙稍怀观望,岂肯以实达于陛下之前?四方闻之,谓朝廷阳为宽恤之言,阴纵掊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劝,盖亦难矣。况天民掊克蠹民,为浙西诸郡之最,尝致无锡县之民,不胜诛求之苦。致有自断其腕、声冤讼庭者,

亦有自溺于井者。天民庇而不发,今又付之廉按之权,责之澄清之任,未见其可,乃罢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按:李心传上述记录,说明南宋绍兴初年发生在常州府无锡县的几件史实,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和思考的。第一,当时知常州府的徐天民是一位剥削百姓十分残酷的官员。第二,在浙西郡郎中,受害最甚者是无锡县,有“不胜诛求之苦,致有自断其腕、声冤讼庭者,亦有自溺于井者”。第三,如此酷吏,今又付之廉按之权,责之澄清之任,即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实在是违背朝廷宗旨的。第四,朝廷不够清明也是造成官员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原因。第五,御史中丞沈与求的奏言是正确的。他尽了台谏官的职责,敢于揭露朝廷谓“阳为宽恤之言,阴纵掊克之吏”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最后高宗罢免了徐天民“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的“澄清之任”。

27. 同上书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辰》条云:

初,命浙西大帅刘光世屯锐兵五千于维扬,光世以乏粮为词,不奉诏,言者屡奏趣之。给事中程瑀亦言:“三国、东晋虽各保长江,实宿重兵于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诚恐真、扬、楚、泗见屯不多。贼众或渡淮,则淮南为所蹂践,江浙必震。时光世遣人按行宜兴湖洑之间,以备退保。议者恐摇人心,请令光世扼险抗贼。”诏以章示光世,光世卒不为之遣也。

按:从给事中程瑀奏言看,无锡宜兴是重要的战略屯兵之地。刘光世从江北撤退江南,就选择宜兴,即“光世方遣人按行宜兴湖洑之间,以备退保”。

28. 同上书卷六一《绍兴二年十二月辛卯》条云:

左朝散郎、新知江阴军赵详之言:“陛下甄别廉污,以示天下。然州县之吏,犹闻抵冒,以干典宪。今犯赃之人,搢绅所不齿,赦令所不宥,计赃绸绢不满十五匹绞,其法禁非不重,告诫非不明也。然未闻立按察官之法。臣乞为法制著于令,申诸监司按察官,计部内州县之数,视举官法。于部内有犯入己赃不因按发,因事罥罣,每一人降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于贪赃狼籍,所犯数多,取旨窜黜。将见持节按察之官,仰承风旨,加意督责,必不容贪污之吏,叨在部属,而廉慎之风,驯可致矣。”事下刑部详之。又奏乞令经筵官兼讲诸史。上谕大臣曰:“朕观《六经》,皆论王道。史书多杂霸,又载一时捭阖辩士曲说”。遂不行。

按:赵详之,于高宗绍兴二年知江阴军,已载清光绪《江阴县志》。但未获赵详之关于建议朝廷立法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典之事以及皇帝经筵官给高宗讲解《六经》及诸史的奏言。然赵详之的奏言对后人极有价值,值得探索其深刻含义。

29. 同上书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乙丑》条云:

江阴军进士李韬、苏白伏阙上书论时事。御笔押归本贯。翌日,辅臣进呈,上曰:“所言皆细务可行,非有诋讦之语。顾不当伏阙耳,此风皆李纲辈启之,卒成变乱,不可不惩也。然韬、白所言宗子扰民等事,亦命监司郡守讥察之”。

按:江阴军进士李韬、苏白显然是二位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和谐安定生活的士大夫。他们敢于到首都临安“伏阙”向高宗反映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其胆识是卓著称赞的,秉承了爱国忠君、主张抗金的李纲崇高精神。这也是无锡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而集中的表现。至于李韬、苏白上书论时事的记录,《江阴县志》未载。

30. 同上书同卷《绍兴三年十一月乙亥》条云:

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为建康镇江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阴军沿海地分。

按:在高宗心目中,韩世忠仍然是效忠于赵宋朝廷的一员战将,他将长江下游的江防、海防任务交给韩世忠负责。后来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高宗战术战略眼光的敏锐,也证明了在南宋初期的抗金斗争中,高宗赵构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是

投降派、卖国贼。

31. 同上书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戌》条云：

侍御史魏矼言："今诸路兵官，悉属枢密院除授，膏粱阜隶之徒，往往以请求得之。而累历行阵、显立功劳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陆沉，故所在盗贼窃发，则惊慑四顾，无可措手。乞罢湖州兵马钤辖范宁等三人，因荐湖、秀州管界巡检崔慎由沉毅勇敢，久在边陲，顷为江阴兵官，遇金人游兵至戛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杀迎敌，阖境赖以安全。……乞量材录用。仍诏密院参照祖宗时《差注兵官六等格法》，遴择其人，方行除授。诏罢宁等，慎由宏令赴枢密院审察。"后四日，朱胜非进呈慎由宏差遣，上曰："台臣耳目之官，职在弹击官邪。若因而荐论人材，窃虚私有好恶。可籍记名姓，他日量才选用。"

按：作为台官负责人魏矼，推荐在江阴勇杀"金人游兵"的崔慎由是不错的。但在高宗心目中，"台臣耳目之官，职在弹击官邪"，而"荐论人材"，恐怕有"私有好恶"之嫌，与魏矼的职责不符。似乎违反了祖宗家法。但高宗还是"可籍记名姓，他日量才选用"，作出了如此的决定。另，魏矼《宋史》卷三七六有传。和州历阳人。宣和三年(1121)上舍及第。绍兴初迁考功郎，屡上书言得失。刘豫挟金人入寇，赵鼎决议亲征，矼请随同，因命督江上诸军。矼说刘光世，请贻书韩世忠、张浚二帅以谋和好。由是众战屡捷，军威大振。其后力挽和议，疏一再上，辞至激切。丁父忧去，免丧，除知宣州，不就卒。

32. 同上书卷八六《绍兴五年二月壬申》条云：

诏右承郎徐度令中书舍人试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珵，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钱棻，新授太常博士张宦并召试馆职。左朝奉郎、新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汪愷，左承议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亚并与升擢差遣。度，处仁子。宦，守兄也。自诏复十科荐士，而龙图阁直学士汪藻荐度及棠；资政殿学士叶梦得荐愷及度；显谟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葛胜仲荐珵、宦、棠；沈与求为龙图阁直学士荐棻，胡交修为给事中荐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珵除秘书省正字，宦除秘书郎，棻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愷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棠知江阴军。中兴后士，以十科荐用者自此始。

按：这是高宗南渡后，第一次以十科荐用人材的开始，是通过朝廷考试与有关官员推荐相结合选择官员制度的开创。在这里新通判潭州之王棠擢为知江阴军；《江阴县志》对此十科荐用人才制度未予著述。另外，江阴人葛胜仲(1072–1144)，绍兴五年二月，曾以显谟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推荐左迪功郎胡珵，太常博士张宦，左承议郎、新通判潭州王棠。王棠后升擢知江阴军也许是葛胜仲的力荐有关。葛胜仲生平事迹，详见《海陵集》卷二三《葛文康公神道碑》、《丹阳集》卷二四《葛云行状》、《澹庵集》卷一九《葛司成祠堂记》、《宋史》卷四四五本传等。

33. 同上书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甲辰朔》条云：

诏进士王久龄召赴行在，令阁门引见上殿。九龄，无锡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庙讳之上字，因改焉。九龄博极群书，卓越有大志。会日食求言，九龄上书论役法五害，如司马光所言，已见于今日。中书门下省奏江浙沿袭旧例，差保正长催科等事，致有破产失业流离之人。前后臣僚，论列虽多，惟九龄建陈，曲尽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龄入见，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复武举；四、均赋税；五、课农桑。上再三称善。赵鼎读九龄奏疏，谓同列曰："王君论事尽天下之害，非老生之常谈也。"乃以为右迪功郎、太平州当涂县主簿。

按：无锡人、进士王九龄可谓是一位"博极群书，卓越有大志"的人物。由于他上书高宗论役法五害，受到高宗召见。在王氏入见时，他又向高宗上五事，均及国家经济，民生、军事等要事。首相赵鼎也对王氏称赞不已。宋人孙觌撰《九龄墓志》，有具体介绍。

34. 同上书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辛酉》条云：

上次常州，赐无锡县知县李德邻五品服。初，上引德邻入对，问以民间疾苦。德邻论民户避役，田土悉归兼并之家。近旨虽令单丁女户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过一名，欲望增为五人，俾得均济。诏付户部。上以德邻留心民事，故有是赐焉。

按：李心传上述记载，可以说明下面四个问题。一是高宗赵构再一次巡视无锡，说明无锡的地位重要。二是知无锡县王九龄是位体恤百姓的清官。他敢于实事求是向高宗反映“民间疾苦”、“田土悉归兼并之家”。三是高宗也是一位明智之君，他深深懂得田为民本、民为国本的道理。四是高宗对王九龄因“留心民事”而赐于五品服，这是殊荣，激励广大官员为民办事，为民做好事。在今天社会，知无锡县王九龄的精神值得人们提倡与发扬。

35. 同上书卷一一八《绍兴八年春正月己巳》条云：

上次常州，庚午，上次无锡县。辛未，上次平江府。甲戌，上次吴江县。

按：这是高宗巡视江南后返回路过无锡县。同年三月，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同年，“始定都于杭”。九年正月，“以金国通和”，绍兴和议达成。看来绍兴八年高宗往返于建康、镇江、常州、无锡、平江等，目的是为与金构和有密切关系。

36. 同上书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壬辰》条云：

左宣义郎、知常州无锡县许忻为秘书省校书郎。忻以再召对，故有是命。

按：知无锡县许忻，也许反映民间百姓疾苦，也许对国事治理提出好的建议，深得高宗一次、二次“召对”，并于此擢为秘书省校书郎。关于许忻升迁原因及其史迹，《无锡县志》恐怕失书。据《宋史》卷四二二《许忻传》、《宋元学案》卷四五、《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许侍郎诗卷》等记载，许忻字子礼，拱州襄邑人。宣和三年(1121)进士。高宗时为吏部员外郎。极论和议不便，疏入不省。乞外补，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谪居抚州，起知邵阳卒，是一位反对与金签订合约的官员。

37. 同上书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右朝请大夫赵世鹏提举两浙路市舶。士鹏，秦桧友婿。自江阴军代还而有是命。

李心传自注云：

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王珪论士鹏再任提舶，凡珍异之物，专以奉秦桧，而盗取其半，以为私藏。当考。

按：从上述二则记载考察，赵士鹏是当时首相秦桧的“友婿”。绍兴和议后，士鹏由知江阴军迁为提举两浙路市舶，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交通工作。由于市舶司是对外贸易机构，与海外各国来华物资接触颇多，凡珍异之物，尽在士鹏掌控之下。他既可以“专以奉秦桧”，进行贿赂；又可以“中饱私囊”，即“盗取其半，以为私藏”。《江阴县志》未获此事，今后撰史志，似可补入。赵士鹏系宋太宗五世孙。具体生平事迹欠详。

38. 同上书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三月己酉》条云：

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比籴马谷，以香引钱为籴本。既为有司互用，民亦不敢觖望，第输纳溢所拋之数太多。如江阴小垒视苗拋降苗不及七万石。漕司拋下马料才三万三千石。计今所输之数，不啻十万石。如湖州产茶诸县，各有园户，祖宗朝并无茶税，州县归来立岁额，每亩输三斤，已自非法。……江阴、武康皆王畿之内，听闻如此。……欲望降诏申敕，自约束后，将创意循例者究治同坐，庶几美意实惠，同浃于民。”

按：从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奏言看，作为“王畿之内”的江阴与武康，当时各种名目的杂税颇多。江阴有马谷钱，它以“视苗拋降”之数由农民负担。“江阴小垒”，这样一个管辖地域不大的地方，每年“所输之数，不啻十万石”。其剥削程度可谓厉害，税收猛如虎啊！

39. 同上书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八月丙午》条云：

礼部拟定故太师、清和郡王张俊赠典，乞依韩世忠例。先是，上谕秦桧曰："武臣中无如张俊者，比韩世忠相去万万，赠典宜令有司检讨祖宗故事，务从优厚。"及是进呈，上曰："俊在明受间，有兵八千屯吴江。朱胜非降指挥与秦州差遣，俊不受。进兵破贼，实为有功，可与赠小国一字王，令礼部拟定。"于是特封循王。国朝淳化以后，异姓不封真王，其追封盖自俊始。俊葬无锡县。比葬，自行朝至无锡，将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为荣，后谥忠烈。

按：张俊(1086–1154)，字伯英，成纪人。少负才气，起于群盗，与金人战，屡立奇功。绍兴初拜枢密使，知朝廷欲议和，首请纳兵权，秦桧德之，尽罢诸将兵权付俊。岁余无去志，桧复嗾江邈论罢之。后官至太傅，封清河郡王。俊当南渡后，首握兵柄，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惟俊附桧成和议构成岳飞之狱，为世所鄙。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六十九，封循王，谥忠烈。事详《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张忠烈王传后》、《海陵集》卷二三《张循王神道碑》、《渭南文集》卷一六《德勋庙碑》以及《宋史》卷三六九《张俊传》等书册。上述诸书少有记述张俊卒后葬于无锡县。今《要录》明记此事，且安葬时之隆重场面跃于纸上。今张俊墓地在何处，值得文博界考实。

40. 同上书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二月壬寅》条云：

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先是，直秘阁、知临安府、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荣嶷言："自建县为军，于朝廷初无所补。而以一县之财，供一州之费，遂使徭役科率倍于他州。兼常州失此一县之赋，两皆受弊。"故有是命，仍诏存屯兵三百八十余人，以知县兼军使。

按：荣嶷建言是正确的。废江阴军为县，隶属常州，江阴之徭役科率减少，百姓受益；同时对常州来讲，江阴并入，增加了一县之赋税，不再"两皆受弊"，是一项善举。此事《江阴县志》也未将江阴废军为县的真正原因讲清楚。

41. 同上书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八月辛卯》条云(图三)：

初，以运河春、冬水涸，诏江湖诸路粮舟皆自镇江府转江阴而来。至是司农少卿张宗元入对，论近粮舟自下江来，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闸则有关津之阻，转江则有艰险之虑，二者皆非良便。今宜于沿流权就下卸。命户部计行在储蓄之数，豫定量度。因河流济通之时，令两浙转运使随宜转般，公私两便。先是浙西提点刑狱公事邵大受尝请置转般仓于镇江之海鲜堰，未及行。于是户部乞如二人言，令淮东总领所措置。


於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日遣使尋盟
和好益堅皆陛下德威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
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絜特
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爲諸路倡也
初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
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對論近糧舟自下江
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關津之阻轉江
則有艱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流權就下卸命

图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影

按：从上述史料记载，南宋漕运、物资运输等都离不开大运河江南段。而镇江、常州、无锡、江阴又是运输之枢纽。但是，每到冬、春季节，运河水涸，物资粮食运输困难。所以官员张宗元、邵大受都提出"随宜转般"的办法，解决运河季节性水涸的运输能力。他俩的建议，包含了民生思想，值得人们敬佩。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编辑：阎智海、何桦)

两《唐书·李贞传》匡正

李心言

两《唐书》,即《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原名《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唐朝开国初,重史事,即修前朝史,又把撰写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成为以后《旧唐书》的修撰底本。《旧唐书》撰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上距唐王朝倾覆30余年。众多史书一致认为:《旧唐书》虽撰成于离乱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但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数朝传记,多抄录官修实录、国史原文,故“本纪”、“列传”颇为详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即多据此书。《新唐书》撰成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上距北宋立国已是百年,社会稳定,原散佚的古籍陆续面世,给撰修积累相当史料,故有了“事增文省”的编辑方法。《新唐书》撰成后,却非议一片。如宋吴缜《新唐书纠谬》指出:《新唐书》编辑有“八失”,谬误有二十门390余处,“不考其虚实有无, 不校其彼此同异”,“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期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故史家“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

《旧唐书·李贞传》是根据武周朝实录写成,记事简略,倾向性鲜明,贬污痕深。唐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高宗之兄,“善骑射,涉文史,有吏干,为宗室材王”;“道可以幽赞神明,行可以仪刑列辟”。垂拱初,愤武则天僭干天位,起兵匡复,不成殉国。按:实录,是每个皇帝统治时期所修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朝人奉勅编撰,编撰者必顺应主政者的好恶,于实事每多忌讳。试想,越王李贞是武则天的首号政敌, 败死后制改姓虺氏,由此血洗唐宗室数百人及拥李勋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并冤杀宗室子女(流人)三千余人。在武周朝实录中,李贞能有公正的评说吗?《李贞传》中就有“人伏其才而鄙其行”,“临水自鉴”等不实恶语。但其记载越王李贞反武匡复全过程是可信的 (史实与褒贬可以不同)。而《新唐书·李贞传》,由于作者治学不严,疏于考证,在“事增”中文理混乱,写下讹文,误导后人。

2012年,友人传来《越王李贞墓志铭》全文,反复阅读,领悟日进,结合家谱的祖史记载,深感两《唐书·李贞传》谬误之多,今以一家之言予以匡正之。

一. 唐《越王李贞墓志铭》的发现及其对两《唐书·李贞传》的匡正

大唐王朝289年,几经战乱,五代53年,连年战争,国家档案损毁严重,唐人所撰当朝国史原文散佚多多,故两《唐书》成书后,即有纠谬、订讹之专著陆续问世。随着时间的推延,特别是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原散佚的古文献、原藏于地下的新史料被陆续发现, 现存史书的记载亦得以补充或匡正。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指出:“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

1972年,陕西省昭陵博物馆通过考古发掘,在太宗昭陵陪葬墓之越王李贞墓中发现了墓志铭。墓志铭成正方形0.98×0.98米,由志盖和志铭两石迭合。志盖成覆斗形,上有阴刻篆体4行共16字:“大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志铭文字为阴刻隶书30行,每行32字,字径1.6×2.5厘米,全文共882字。墓志叙述李贞的生平事迹,反武匡复起事失败和遇难以及平反昭雪、陪葬昭陵的概况。墓志曰:

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

王讳贞,字贞,陇西狄道人也。元皇帝之曾

孙,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皇帝之第八子也。

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必有河目海口,龙章凤姿,辉若木而挺生,派咸池而载诞,横风云而落落,揭日月而昭昭。道可以幽赞神明,行可以仪刑列辟。固本枝于百代,缉熙光于万年。则周公其人,噫,见之于王矣!惟王禀七曜之粹,冠三代之英;乘白云于帝乡,其容以穆;索玄珠于罔象,其道惟微。雅好典坟,招延豪杰。攀桂枝之偃蹇,赏修竹之檀栾。文标七步之奇,乐对三雍之妙。由是自天之祐,比川泽而增深;干云之姿,历岁时而逾邈。乃累封原、汉、越三王,食邑万户。使持节安、徐、扬三州都督,相州刺史,迁绛州刺史,兼太子少保。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褰帷作镇,爰降纶綍,乃授绵州刺史,又迁豫州刺史。十郡连衡,三州辐辏,浩攘龙聒,化理尤难,恺悌昭明,风俗斯变。属高宗厌代,椒掖君临;履霜坚冰,乾道斯革;比干委命,忠诤莫从;威公泪尽,空闻继血。王慷慨延首,喑呜誓心。乃七国而连师,申九伐于商野。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明明上天,曾靡下鉴。苶然煨烬,夫何可言?呜呼!以垂拱二年九月十一日遇害,薨于州馆,春秋六十二。俄而上天悔祸,大慝咸诛,旧物维新,颓纲必复;君侧之恶,尚巧如簧,汩罗之冤,未申朝命。睿宗抚远,我后登庸,追远饰终,具斑惟叙。呜呼!以开元五年五月廿日旧封建谥曰"敬王"。以开元六年正月廿六日,诏陪葬于昭陵。礼也。有子冲等五人,并弈弈星连,轩轩霞举,发言为论,受诏成文,德懋汉蕃,道光周翰。痛乾纲之中圮,哀品物而潜蒙。乃受授韬钤,谟谋敬爱,霜戈彗扫,月羽星流。未交锋于魏阙,咸丧元于中野。惟家之索,牝鸡几怨于诗人;天下击之,周勃未安于刘氏。

开元神武皇帝,明断自天,雄姿拂日,赫龙光于紫极,归帝座于皇图。百姓昭明,六幽光宅。仁霑动殖,德被沉潜。追继绝于前王,乃诏封于宗子。横桥北走,渭水东流。地势半于平陵,风烟通于毕陌。迟迟容卫,历城阙而无声;寂寂车徒,上郊原而望断。庶乾坤或毁,松柏为薪。遗风尚结于人思,明德见嗟于来哲。敢缘兹义,乃作铭云:

黄云萧索,紫气氤氲。发祥降祉,吐曜腾文。于万斯年,必百代祀。永锡尔类,钦哉不已。克岐克嶷,知微知章。褰帷受委,仁声孔扬。历数遘屯,宗枝靡托。翻然凤举,奋矣龙作。风飞电扫,欲野喷山。丘陵反覆,轮毂朱殷。天命匪忱,不利攸往。僵仆大憝,沉潜朽壤。申冤复祉,爰洎我朝。潜灵秘景,陟降云霄。旌旆逶迟,笳箫断绝。草冷烟覆,松寒雾结。鸡鸣泉路,犬吠云中。庶神仙之可托,播金石于无穷。

这篇越王墓志铭,应是《李贞传》之史源之作,由大唐朝廷撰写于开元六年(718),早于《旧唐书》编纂200余年。遗憾的是两《唐书》编纂时都没有采集到,更为遗憾的是《旧唐书》成书1000余年,《新唐书》成书900余年之后才被发现。墓志是同年代的人写同年代的人和事,所记史实系原始史料,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及其权威性。我们以越王墓志铭,对照两《唐书·李贞传》,不难发现其有漏误多处:

(一)越王李贞的仕历:墓志记历任相、绛、绵、豫四州刺史,而《新唐书》仅记豫州,《旧唐书》记相、蔡二州(蔡州是李贞遇害之后70余年由豫州改称的,写蔡州不妥)。

(二)越王李贞反武匡复起事的政治历史事件的时间:墓志记垂拱二年(686),而两《唐书》记垂拱四年 (688),《唐会要》则记垂拱三年(687)。

(三)越王李贞的政绩:墓志记"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褰帷作镇,爰降纶綍,乃授绵州刺史,又迁豫州刺史。十郡连衡,三州辐辏,浩攘龙聒,化理尤难,恺悌昭明,风俗斯变。"按:是高宗帝亲选越王贞为绵州刺史(656–661),出镇西南。时吐蕃东进犯境,边事告急,境内"剽劫之患,时闻栈阁","浩攘龙聒,化理尤难"。经越王治理,边患少,民风变,城池繁华,社会稳定。而两《唐书》则

不记。

(四)越王李贞遇害的时间、地点和平反昭雪的时间：墓志记“以垂拱二年九月十一日遇害,薨于州馆”,“以开元五年五月廿日旧封建谥曰‘敬王’”,“以开元六年正月廿六日诏陪葬于昭陵”。而两《唐书》都记于开元四年追复爵土赐谥号,没有记陪葬昭陵事。

(五)越王李贞的卒年:墓志记“春秋六十二”,而两《唐书》都不记。按墓志测算,李贞生于武德七年(624),薨于垂拱二年(686),终年62岁。按两《唐书》测算,李贞生于武德九年(626),薨于垂拱四年(688)。

(六)越王李贞生育子男总数:墓志记“有子冲等五人”。两《唐书》都不记总数。

二. 以《越王李贞墓志铭》“有子冲等五人”的记载,用《锡山李氏世谱·谱原》为《旧唐书·李贞传》补正

众所周知，家谱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之一。宋《御制吴氏族谱序》指出:“诏征天下诸名家志铭序传,各种文集及旧勋家乘事迹,用备参稽核编国史。”今人王鹤鸣也在《中国家谱通论》指出:家谱具有其他典籍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可以印证史家的论断，校勘史实之讹误,解决历史之悬案,补正正史之不足”。

明崇祯十年(1637)首创的《锡山李氏世谱》是以两宋之际杰出的抗金名将、南宋开国宰相李纲为始祖、李赓为始迁祖,记载李纲家族发展史的重要史书。由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前南京刑部员外郎翁素撰写。其《谱源》指出:“江左之李,在今为巨族。昔宋洪迈铭其先墓,谓其系出唐宗室,而不着其为何名。殊不知实本于越敬王之苗裔。敬王名贞,昭陵第八子。当武后垂拱戊子(688)之秋,与琅邪王冲,愤其僭干天位,欲议匡复事,不成而死,于是属籍悉见诛窜。而敬王次息定淮公瑄,析居光之固始,唐末,自泳避乱,徙家邵武。迨五季时,有讳光远者,事闽,官尚书。生浚,拜司徒。浚生赠少保僧护。僧护生赠太保赓,侨家无锡”。

上述151个字,是《锡山李氏世谱·谱源》记载的李纲家族的祖史。其要点有四：

(一)越王李贞及其长子冲等忠辅王室共赴国难,于是属籍悉见诛窜。

(二)李纲是越王李贞次子瑄的后裔。

(三)瑄逃离虎口至光州固始，唐末避乱其后裔入闽居邵武,直至北宋李赓才迁居无锡。

(四)李纲之父夔、祖赓、曾祖僧护、高祖浚、五世祖光远的名讳都载入史书的。

翁素撰《谱原》是有史可循的,要点第一项,两《唐书》有详细记载;第二项两《唐书》漏记越王次子瑄的人和事;第三、四项有多部方志可得佐证。

明嘉靖《邵武府志·李忠定公世家》曰:“李纲,字伯纪,邵武庆亲里人。其先来自光州固始,世居无锡。五世祖(名无考)居邵武,仕闽,官至尚书。高祖(名无考),位司徒。曾大父僧护,赠少保。大父赓,赠太保。父夔,字师和,幼聪敏,书一览成诵,文不停缀,以进士起家,尉华亭,有政声,生纲于官邸,寻迁令,官至右文殿修撰,赠卫国公。纲幼有经纶倜傥之志节……公先世无锡人,父夔葬焉。其居无锡者世系无考。”此府志由邵武知府刑址、名士陈让编纂,成书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比首创《锡山李氏世谱》及《谱原》撰写的时间早96年。

明弘治《无锡县志》卷十九《寓贤》曰:“李夔,字斯和,光之固始人,唐末避乱徙邵武,父赓又徙居无锡。夔元丰三年进士,累官至集贤修撰知邓州兼京西南路安抚使。子纲、维、经、纶。纲相高宗,赠夔太师、卫国公。”此县志由赐进士第中奉大夫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邑人秦夔总纂,成书于弘治七年(1494)。比首创《锡山李氏世谱》及《谱原》撰写的时间早143年。

无锡史志办编《无锡名胜》(2005年版)的胶山李纲祠条曰:“李纲祠,在胶山北麓,祀宋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李纲。李纲远祖本陇西人,他的九世祖因避祸,迁居福建邵武,祖父李赓始迁居

无锡胶山北麓。”撰稿人是已故文史专家、邑人沈虹太。此文指出:李纲的九世祖迁邵武,与《谱原》所说的“唐末,自泳避乱,徙家邵武”完全一致的。按:唐史记载王仙芝于乾符三年(876)十二月陷申、光、芦、寿、通、舒六州。据此,李纲的九始祖迁邵武当是乾符三年,距越王遇害瑄析居固始的时间约有190年(686–876),即瑄之六世孙了。

综上所述,唐《越王墓志铭》、《旧唐书·李贞传》和《锡山李氏世谱·谱原》等三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李贞反武匡复全过程是相同的,是为信史,其中李贞生育子男总数及其流向的记载清楚,微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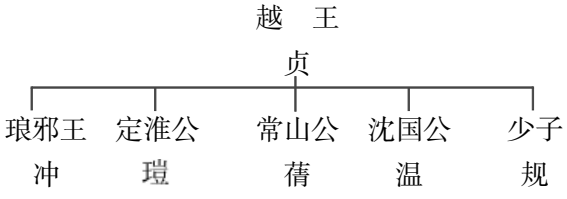
《越王李贞墓志铭》记:有子冲等五人。

《旧唐书·李贞传》记:贞长子琅邪王冲,兵败走博州城,为守门人所杀;少子轨,兵溃而归,缢其母自杀;冲弟蒨,坐与父兄连谋伏诛;温,以告其朋党得实,减死流岭南,寻卒。

《锡山李氏世谱·谱原》记:越王次息定淮公瑄,析居光之固始,唐末,自泳避乱,徙家邵武。

《旧唐书·李贞传》的子男据武周朝实录不记其总数,在贞冲反武全过程中出现了冲、蒨、温、轨四人,与《越王墓志铭》“有子冲等五人”对比,明白地告诉人们,《旧唐书·李贞传》漏记了越王子男一人。《锡山李氏世谱·谱原》则记载了贞冲反武匡复过程中脱险的次子瑄,析居光之固始,唐末其后裔去了邵武,为越王李贞保存了一支忠脉。古人言:家谱“用备参稽核编国史”的功能又一次在此显现。我们坚信“国史、方志和家谱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的论断,是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的。故《锡山李氏世谱·谱原》关于李瑄的人和事,为《旧唐书·李贞传》漏记的“越王子男一人”作了补正,时间在370年前,而不是现在。

一桩历史悬案——唐宗室越王李贞房后继有人还是“嗣绝”?在发现的新史料(越王墓志铭)和国史(《旧唐书·李贞传》)以及家谱(《锡山李氏世谱·谱原》)三史书的共证下终于得到了正确的答案——越王李贞房后继有人,且枝繁叶茂。兹附李贞生育子男总数五人及其流向表:



贞次子定淮公瑄是贞冲反武匡复起事的政治历史事件中的幸存者。因在封爵地或授职地,不在反武现场,贞、冲失败后得信迅速远离险境;或得朝廷某重臣有力掩护,成功地脱险,最后去了“光之固始”,此时的定淮公瑄正值不惑之年,完全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就是历史,自古皆然。按:固始县,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夏商二代的皋陶封邑,春秋时蓼国,唐时属淮南道光州,宋时属淮南路,元至正十三年(1276)置河南江北等处中书省时,光州及其辖县固始才进入河南省境版图。据清顺治《固始县志》记载,县境所至“东寿春,南麻城,北颍息,地綦斥矣”。自1932年起,多次析缩成至今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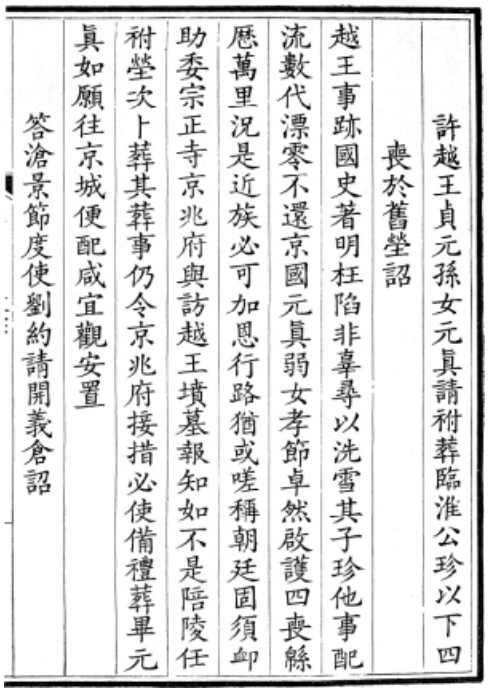
三. 以《越王李贞墓志铭》和《旧唐书·李贞传》、《锡山李氏世谱·谱源》三史书,关于李贞生育子男总数及其流向的记载,为《新唐书·李贞传》匡正

《新唐书·李贞传》在全文抄录《旧唐书》后,按“事增文省”的编辑原则,增补了最后一节56个字,即“贞最幼息珍子谪岭表,数世不能归。开成中,女孙持四世丧北还,求祔王茔。诏嘉悯,敕宗正寺、京兆府为访其兆,非陪葬者听葬。女名元真,为道士。”其增补文字,源于李贞薨后150余年的唐文宗开成四年六月的《听越王归葬诏》,曰:

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辜,寻已洗雪。其子珍,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真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委宗

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祔茔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备礼。葬毕,玄真如愿住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此诏令,被宋宋敏求编入《唐大诏令集》,后又被清董诰编入《全唐文》,诏名为《许越王贞元孙女元真请祔葬临淮公珍以下四丧于旧茔诏》(图一)。而宋初王溥编《唐会要》和今人《唐大诏令集续编》中的上述诏令把"其子珍"改成"其孙珍子"。这四部文献中,"其子珍"和"其孙珍子"的世次辈分无误。《新唐书·李贞传》增补的最后一节56字,没有给这篇传记增添文采,相反由于上下文不统一,不作梳理而构成病误:(一)上文写"贞少子规",下文写"贞最幼息珍子"。据《唐会要》卷五"越王贞"条目下,有"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辜,寻已昭雪。其孙珍子,他事配流……"。此处明明告知"珍子"是贞之孙辈,当然不能在贞之子辈冲、蒨、温和规之间去抢排行,故"贞最幼息"误。(二)上文写"温以前告,流岭南",下文写"珍子谪岭表"。据本传记上文写的


許越王貞元孫女元真請祔葬臨淮公珍以下四
喪於舊塋詔
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以洗雪其子珍他事配
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元真弱女孝節卓然啟護四喪緜
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卹
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
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元
真如願往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答滄景節度使劉約請開義倉詔

图一 《全唐文》书影

越王贞反武的政治历史事件中,只有贞之四子温谪岭南,珍或珍子某可能是温之后人,故"珍子谪岭表"误。又下文元真道士"持四世丧北还者",当是贞之五世孙女也。由此考可知增补之"贞最幼息珍子谪岭表"句全错了。《新唐书·李贞传》记载的越王贞生育子男,去除错记之"珍子"外,相同于《旧唐书》即冲、蒨、温和规四人,对照墓志记总数五人,即漏记了越王次息定淮公李瑄。(三)《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写唐宗室四十一房,"三十曰越王"。世系表"越王房"记越敬王贞有子男:琅邪王冲、洽、沈国公温、常山公清、临淮公珍子、规六人。其谬误有三:1. "珍子"是孙辈,该剔除。2. 据两《唐书·李贞传》都记"蒨、常山公、坐死","清"与"蒨"在字的形、义、音三者都不同,此处应是贞之三子"蒨",故"常山公清"误。3. "洽",不是越王贞之次子。查高宗龙朔三年李姓右相次子名"洽"。近族,且年龄相近,有可能误记为越王次子。由于越王贞首唱反武称帝举兵起事,惨遭空前绝后的镇压,属籍悉见诛窜、史料尽毁,武周朝实录记载寥寥,现在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用《锡山李氏世谱·谱原》和越王墓志铭去校正两《唐书》中关于李贞及其子男之谬误。《宗室世系表》越王房该正确地记载越敬王贞之子男应为琅邪王冲、定淮公瑄、常山公蒨、沈国公温和少子规五人,理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后记:本文指出:越王李贞次子定淮公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错写成"洽",而"洽"是高宗龙朔三年奸相李义府之次子。《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还有一例,即雍王房下的淮阳王道明之子"景融",错记为东平王诏之孙。读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点校本之勘误表,可以发现《宗室世系表》有人名错者6处,性别错者1处,辈分错者6处,兄弟排行错者1处,兄弟同名或同封者2处,地名错者1处。

(编辑:阎智海)

南齐《善卷寺记》是我国最早的梁祝记载

——兼论江苏宜兴是梁祝传说之源

路晓农

梁祝传说发生于东晋，千百年来一直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传播。由于在流传中往往融入当地的内容，因此各地的记载、传说、本子就各不相同，关于传说的发源地，也就众说纷纭，不知所本。

大凡传说，总是有其原型或源头的，只是因为历时久远，初期无记载或记载较少或记载散佚，而难以考证确定罢了。2006年，江苏宜兴，浙江宁波、上虞、杭州，山东济宁以及河南汝南的“梁祝传说”，同时进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根据历史记载的时间与内容的可信度来看，笔者认为，宜兴才是真正的梁祝传说的本源发生地。

一. 1930年钱南扬根据典籍记载提出梁祝“浙东(宁波)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俗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理论研究广泛开展，其中包括了对梁祝传说发源地的探索。特别是钱南扬先生，于1925年秋考察宁波梁祝祠、墓后，发心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一边自己翻书，一边各处托人代为寻访，并于1930年1月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刊登了《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一文，向读者征集梁祝相关资料。主要有：1. 唐及唐以前的著述中的记载；2. 各处志乘中关于坟墓的记载；3. 各处关于祠庙的记载；4. 各地读书处的遗迹；5. 与祝英台故事相似或有关的材料；6. 各种祝英台戏曲的脚本；7. 各处的唱本小说等等。通过对所搜集到资料的认真比对与研究，钱先生提出了梁祝故事发生于浙东的“宁波说”(即梁山伯绍兴人，祝英台上虞人，梁后为鄞令，死葬宁波，祝英台哭坟合葬)，并得出了“从浙江向北，而江苏安徽，而山东，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肃”的故事流布结论。

应当说，以钱南扬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促成了“梁祝”文化的集中性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他们是近代“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驱。

纵观钱先生分析与考证的思路，则是以当时掌握的历史记载的时间和内容作为依据的。其思路如下：

首先，据明末徐树丕的《识小录》称：“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然而《会稽异闻》不知何代之书，钱先生找遍书目不可得，故不知所云；《金楼子》为梁元帝萧绎所作，但钱先生翻了几种版本不同的《金楼子》，却发现书里对梁祝故事的记载一个字也没有。因此《识小录》中所说的“梁祝事异”，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和可供考证的资料。(按：直至今天，我们还未发现《会稽异闻》其书和《金楼子》中关于梁祝的实质性记载。)钱南扬说：“我们虽不敢相信徐氏之言是十二分的可靠，然也无法证明他是不可靠。在未发见徐氏之言不可靠的证据以前，只好当它是可靠的了。”

其次，据宋张津所作的乾道《四明图经》(1169)称：“《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钱先生认为，尽管张津只引用了《十道四蕃志》中“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的一句话，况且“同冢”二字又很笼统，但总算写到了梁山伯、祝英台。钱先生称，《十道四蕃志》是唐中宗时的梁载言所作，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有“梁祝”实质性内容的记载。

再次，据清翟灏《通俗编》(1751)引晚唐张读《宣室志》云：“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

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其四,宁波有座梁山伯墓,清康熙闻性道《鄞县志》中载有宋大观明州知事李茂诚所撰的《义忠王(即梁山伯)庙记》(1107)。钱南扬于1925年考察时,见庙内供着梁山伯的土像及梁祝二人的木像,并存有一块清雍正十年重刻的明万历三十三年的梁君庙碑记。梁祝墓就在庙的西侧,墓碑上刻着"晋封英台义妇冢"为明嘉靖丁未鄞县知县徐易所立。钱先生说:"此庙在宋大观已经建造了,则无论如何总是事实,到现在有八百余年了……"

由于当时其它地区没有发现宋以前的梁祝记载,这样,唐《十道四蕃志》就成了当时有实质性内容的最早梁祝记载,同时也是梁祝故事起源于宁波的最早文字记载;唐《宣室志》则成为最早的梁祝传说故事;而宋《义忠王庙记》及宁波梁山伯庙、梁祝墓更是梁祝"宁波说"的有力佐证。钱南扬的这一权威性的结论,整整影响了70多年。

二. 钱南扬肯定"宜兴化蝶说"但与宜兴梁祝擦肩而过

钱南扬在研究中,对"宜兴梁祝"也十分重视。表现在:

1. 将"宜兴梁祝"排在仅次于宁波的位置。1930年2月出版的《民俗周刊》"祝英台故事专号"中,共刊登了16篇文章,首先是四篇"宁波说"论文,随后即刊登了马太玄的《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排在第二位。在这篇文章里,马太玄先生根据清代的几部宜兴县志,把相关的梁祝记载都找出来了。其查阅工作相当细致,仅仅摘录的材料,就有四千字之多。钱南扬还在文中加了多处按语,并根据清吴骞《桃溪客语》中的相关材料,对一些情况进行了补充。

2. 肯定了"宜兴化蝶说"。钱南扬在研究中发现,宜兴自宋代史志里就有了"梁祝化蝶"的记载,并刊录了大量吟咏"梁祝化蝶"的诗词,这是宁波不具备的。他说:"还有一事值得注意的,就是宋元明宁波的志乘中,没有一句关于化蝶的话。上面所举的例(按:指《祝英台故事叙论》中所列举的化蝶诗词),都是宜兴志乘中的。所以我疑心祝英台故事传到宜兴之后,才把化蝶事加入的。虽则到了清朝,宁波也有了化蝶的传说,光绪鄞县志里也有李裕的'女郎歌以冤,辄来双凤子'的诗,然恐怕是又反从宜兴传入宁波的。"而钱南扬把宜兴梁祝排在第二位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宜兴毕竟有宋代的梁祝记载,况且是"梁祝化蝶"传说的起源地。

3. 发现了宁波记载突出梁山伯、宜兴突出祝英台的特点。钱先生在沅君《祝英台的歌》(按:"祝英台故事专号"第九篇)一文后加有按语,说:"还有一件颇堪注意的事,试比宁波和宜兴两处的记载,显有不同之点。宁波似乎偏重于梁山伯,而宜兴却偏重于祝英台。宁波只有几篇《梁山伯庙记》,叙述梁氏生前和死后的功绩","同时在宜兴方面,却只有祝英台读书处、祝陵,简直没有梁山伯插足的余地"。又说:"宁波注重在梁山伯的显圣,所以有看经的巫祝、问卜求子的善男信女,成为一个迷信区域。宜兴注重在祝英台的艳迹,所以有寻踪吊古的骚人墨客,成为一个文艺的区域"。"梁氏的庙,全靠迷信而能维持如此长久。庙既能永久维持而不废,因此这个故事的势力得以日益发达,所以现在这个故事在宜兴的势力,远不及在宁波之盛。"

然而,在"宁波梁祝"与"宜兴梁祝"的比较中,钱先生毕竟选择了前者,而与"宜兴梁祝"擦肩而过。其原因有三:

其一,查阅资料的贫乏。当时,他们能掌握与查阅的资料,主要是"清嘉庆二年《宜兴县志》、《宜荆分志》(即《新修宜兴县志》与《新修荆溪县志》)、道光《续纂宜荆县志》、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钱先生虽从清吴骞《桃溪客语》中得知,在宁楷的嘉庆志之前,宋代的志书中,也

有祝英台的记载,但却没能找到。

由于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交通极不方便和安全,古籍资料大量散失,难于集中,缺乏各方面查阅资料的环境与条件;况且,征稿启事刊登18天后,《祝英台故事专号》就十分仓促地出笼了,因此,他们所查到的资料是局限的。对于宋《咸淳毗陵志》的引文,仅从清吴骞《桃溪客语》得知,并未见到原文(按:现在绝大多数国内学者所用的宋《咸淳毗陵志》"梁祝"记载,都是从《桃溪客语》中引得的,或是再引用钱南扬先生的)。对现存的明洪武十年《常州府志》、成化二十年《重修毗陵志》、正德八年《常州府志续集》、嘉靖十三年《南畿志》、万历十八年《宜兴县志》,清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二十四年《常州府志》、二十五年《重修宜兴县志》以及乾隆元年《江南通志》都未看到,更不用说大量的古籍记载了。

其二,吴骞《桃溪客语》的误导。由于钱先生并没有看到宋《咸淳毗陵志》的原件,又因为吴骞在《桃溪客语》引用时,没有照原文抄录或与原文核对,仅仅是凭头脑中的记忆写出来的,其中有多处出入,反而使钱先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其三,清邵金彪《祝英台小传》的误导。造成钱先生错误判断的另一篇文章,是收录在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里的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该《小传》云:"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说祝英台不是宜兴人,只是与梁山伯到宜兴来读书而已。这一记载,连钱先生也感到奇怪,他在沅君《祝英台的歌》一文后的按语中说:"一篇《祝英台小传》,不出于宁波人之手,却反而出于宜兴人。"因此,钱先生完全有理由认为,连宜兴县志也说祝英台不是宜兴人,肯定是不会错的,终于造成了"梁祝"与宜兴历史擦肩而过的遗憾(按:对于《桃溪客语》与《祝英台小传》的错误,笔者另有专论)。

三. 1932年冯沅君通过采风提出梁祝"河南(中原)说"

在"祝英台故事专号"中,钱南扬刊登了一篇沅君的《祝英台的歌》,其歌共六段二十九句,内容是"十八相送"。这首歌谣,是沅君小时候,听到她老干娘经常反复唱的,所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她还讲述了一个当时河南流传的很有特色的梁祝故事,大意是:梁祝二人的父亲是挚友,俩夫人怀孕后,便指腹为婚:若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都为男孩就一起读书,都为女孩就一起学女红。后来,祝父死了,梁家一贫如洗,祝母怕女儿受苦,便骗梁家说生的也是男孩。到了入学年龄,梁家约祝家同送儿子去读书,后来先生起了疑心,便令英台退学。英台回家时,山伯去送她,不过此时英台早知山伯就是自己的未婚夫了,于是借物比喻,就是老干妈唱的《祝英台的歌》。别后许久,梁去祝家拜访,方知祝为女子。后祝母将祝另聘,梁闻信后悲愤而死。大喜之日,男家许英台先拜梁墓再拜堂,英台方肯上轿。英台拜墓时,墓忽裂开,祝钻进后墓复合,坟头飞出一双花蝴蝶。

沅君,即冯沅君(1900–1974),字德馥,河南唐河人,现代女作家与学者,沅君是她的一个笔名。因《民俗周刊》虽刊登了她的《祝英台的歌》,但却把浙江宁波说成是梁祝传说的源头,所以,她于1932年春去河南时,对当地民间流传的梁祝传说与民间文艺进行了采访。经过采访,发现汝南县有一个梁祝传说的风物圈,与传说十分相似,且民间流传的曲艺歌谣尤为丰富。因此,提出了梁祝"河南说"(亦即刘康健、马紫辰先生所称的梁祝"中原说"),认定梁祝传说发生在汝南县马乡镇,并"以河南为中心,渐次向风物圈周围扩张"的论点。

梁祝"河南说"认为,梁祝传说发生于西晋晚期或东晋,汝南县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梁祝传说遗迹:不仅有梁山伯家乡梁岗、祝英台家乡祝庄(朱董庄)、马文才家乡马庄,还有梁祝结拜的村庄曹桥、梁祝读书处红罗山书院以及埋葬在古京汉官道两侧的梁祝双墓。而从红罗山书院到梁岗和朱董庄都是十八里,于是就有了十

八相送的故事。仅仅因为战乱,汝南大户大批南迁,才把中原的梁祝故事带到了江、浙一带。

然而,河南虽有梁祝的风物圈、传说及民间文艺,但在清及清以前的史志古籍中,却没有一点河南梁祝的记载,不能不说是"梁祝中原说"的软肋。因此"中原说"并不为大多数专家学者看好,丝毫没有动摇"梁祝宁波(浙东)说"的地位。

四. 梁祝墓记碑与梁祝"济宁说"

建国初期,山东微山马坡出土了一块明代的"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樊存常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梁祝"济宁说"。

该碑初于1952年在鸟山县第六区(按:今属微山县,旧属邹县)疏浚白马河时出土,就地保管;1976年,在平整河道的平坟中又被埋入地下;1995年,经政协委员提案后重新挖到此碑。至2003年,为了配合"梁祝邮票"的发行与宣传,樊存常又请民俗学会刘魁立会长到场,隆重举行了复出土仪式。

该碑立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全碑共835字,由前都昌知县赵廷鳞撰文,内容分为两个部份:一是当地流传的梁祝故事;二是重修梁祝墓的原因及过程。大意说:外记二氏,出处弗祥,近来走访各长者,得知这样一个传闻:昔济宁九曲村祝员外,膝下仅有一女,羡他人有子读书致贵。其女英台扮为男装外出读书,道遇邹县西居梁山伯,同请峄山先生授业。三载后英台思亲而归;一年后山伯访之,方知祝为女子。经数月,山伯病故,葬吴桥东。英台苦思山伯,于西庄马郎迎亲时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全节,从葬山伯之墓。今有南京工部右侍郎崔公经此看到废冢,建议重修,并建神祠,安排人守嗣,以传节义云云。

该碑开宗明义,说是本碑所记的梁祝,出处不详(按:外记,非正规的记载;弗,不;祥通详),是最近走访了各位故老,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传闻。可见,赵廷鳞为了撰写这篇碑记,还是翻阅了大量资料的,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无奈之下,他只好走访当地的老人,才记录了梁祝的事迹本末。这里,赵氏特地用了一个"外记",以表示这是正史以外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明代正德十一年之前,济宁的史志古籍中,是没有任何梁祝记载的。

重修梁祝墓后,不仅促成了梁祝传说的广泛传播,且后来也就有了记载。在七十年后的万历十六年(1588),邹县知县王自瑾在峄山传说中的梁祝读书处题刻了"梁祝读书洞"及"梁祝泉"石刻。到了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五十四年(1715)《邹县志》中,亦称:"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

关于这块梁祝墓碑记,还有一段插曲。清焦循(1763–1820)的《剧说》卷二云:"乾隆乙卯(1795),余在山左,学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石刻。"这一记载,钱南扬在《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材料的报告和征求》、《祝英台故事集叙论》中都曾引用过,并认为嘉祥有梁祝合葬墓。50年代,郭沫若据此记载曾派员到嘉祥考察,结果无功而返。实际上,焦循记的那块嘉祥墓碑碣文,就是微山出土的这一块。因为嘉祥与微山同属兖州府(即今济宁),而焦循的这一记载,是在第二年乾隆丙辰到了浙江宁波,看到《宁波府志》详载梁祝轶事后,联想到河北林镇也有梁祝墓、家乡江都也有祝英台坟而写的,并不是当时的记录,于是把地名搞错了。

1996年,《济宁日报》发表了张自义、胡昭穆、上官好岭、卞雄杰合写的文章《梁祝故事在济宁》,阐述了梁祝"济宁说"的观点。主要有:1. 有微山出土的文物明"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邹县峄山上有明人勒石的"梁祝读书洞"遗址;2. 清康熙十一年(1672)《邹县志》有"梁山伯祝英台合葬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的记载,清同治《峄山志》称峄山万寿宫内曾供有元代梁祝汉白玉石像;3. 有梁祝传说的风物圈:梁祝马三氏居住地可考可查,且有梁祝墓、梁祝读书洞等遗迹;4.《梁祝墓记》的记载富有传奇色彩而无

艺术加工,合葬由乡人决定而无化蝶附会,马氏迎亲用车而非轿且无霸婚之举等等，显示出墓志的真实性;5. 由于北方的战乱,造成了文化的南移,故而记载滞后。

无疑,由于明正德梁祝墓记碑的出土,济宁梁祝值得重视与研究。然而,济宁缺乏梁祝的早期记载内容,不能不是个极大的遗憾。

五. 南齐《善卷寺记》是最早最可信的梁祝记载

20世纪末,宜兴蒋尧民先生从《宋咸淳毗陵志》(1264)“卷二十七·古迹”得知,南齐所建的善卷寺里,有一篇《善卷寺记》,其中记述了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

《咸淳毗陵志》记曰:“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这篇《善卷寺记》(后作《寺记》)刊载于何处？又是何时何人所作的呢？学者们进行了考证,并得出如下结论:

1.《寺记》肯定作于唐大和(827–835)前。唐李蟆曾作过一首《题善权寺石壁诗》，其序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节度使李蟆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李蟆,唐宗室后裔,会昌元年进士,终官大司空。他在大和中曾在善权寺修读，于修读时看到寺内的《寺记》乃是十分正常的。因此,李蟆按照《寺记》中的记述,把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写进诗序,题在善卷山的石壁上,应当是可信的。李蟆告老辞官后,就定居在善权寺,死后葬在善卷。《题善权寺石壁诗》,就是他告退后所作。由此可知,《寺记》必作于唐大和前。

2.《寺记》应作于善卷寺建成初期。通常庙宇会存有“寺记”与“寺志”。其中“寺记”是寺庙兴建的记录,是寺庙建成时所作;“寺志”则是寺宇兴衰与沿革的记录,是后人所作,并可不断续记。此外,还有一种“记”,是寺庙重建或局部修缮的记录,或是一种游记。这种“记”,均会在标题中标明“重建记”、“修缮何物记”或“游记”之类(如善卷寺就有宋《陈氏舍田记》、《重装大殿佛像记》,元《善权重建藏殿记》,明《重修善权佛殿记》、游记《善权记》等)。据明文徵明《善权寺古今文录序》称:“(善卷寺)其事具郡素甚略,而未有特志也”。既非“寺志”,又非“重建记”、“修缮记”与“游记”之类,那么,《善卷寺记》则应是寺庙兴建的记录，应作于善卷寺建成之时或建成初期。

3.《寺记》必作于齐武帝在位期间。据宋《咸淳毗陵志》,明嘉靖《南畿志》、万历《宜兴县志》等9部志书记载，善卷寺于齐高帝建元二年(480)以祝英台故宅创建,但是,《寺记》却说是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这不是相互矛盾的吗？宋资政殿学士李曾伯《善权禅堂记》称:“因考颠末,此寺自齐武帝时建立寺额”。原来,善卷寺虽于高帝建元二年开始拆迁、修建,但到建成并建立寺额时,高帝已病死,齐武帝即位。《寺记》称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弃高帝之功而立武帝之绩,则明显带有为齐武帝歌功颂德的色彩。齐武帝于483年登基,493年死后,才由郁林王即位。而齐武帝死后,则不可能为他涂脂抹粉,说他赎英台旧产建寺。因为当时的权力争斗相当激烈,齐武帝死后的一年中就三易其主:齐武帝的堂弟萧鸾先是废杀郁林王萧昭业、后又废海陵王萧昭文,自立为明帝。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少年丧父,由高帝抚养,高帝将他视作己出,他对高帝的感情很深。所以,齐武帝死后就不可能再为他唱赞歌，而应据史实记作齐高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由此可见,该记必作于齐武帝在位期间(483–493),这才符合历史为当政者所记的一般规律。

4.《寺记》应作于齐武帝即位之初。善卷寺是宜兴于南北朝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据唐李蟆的记载,规模相当恢宏。它于480年开始着手修

建,如果历时三到五年的话,到齐武帝即位时或即位不久才正式落成，而建立寺额又必在建成之初。由此,可以推断,所谓齐武帝时建立寺额,也应当在齐武帝483年即位不久。在佛寺落成并建立寺额时,请文人写下《善卷寺记》,为当政的帝王唱赞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善卷寺记》则应作于公元483–485年之间。至于何人所作,无考。

5.《寺记》是一块碑刻。宋丞相周必大《泛舟录》(1167)记到善卷寺时称:“按,旧碑: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周必大不仅看到了《善卷寺记》古碑,而且明确指出,齐武帝在创建善卷寺时,所拆迁的不只是祝英台故宅一家,而是整个祝英台居住的村庄。由此可知,《善卷寺记》是寺内的一块碑刻,故保存的时间较为长久。

6. 唐宋间《寺记》碑刻尚存。看到《善卷寺记》碑刻的人,除了前文提到的唐司空李蟾、宋丞相周必大外，至少还有宋南山居士及湖州知府薛季宣、常州知府史能之等。宋宰相李纲少时曾在善权寺修读，后第进士。他于建炎元年(1127)善权寺恢复“广教禅院”寺额后,在修缮佛堂时曾施俸重塑释迦牟尼金身，至绍兴元年(1131)落成时,由南山居士撰文,作《重修善权佛堂记》,其中说到“常州宜兴县善权山广教禅院始是齐武以宅佛氏……”,就是指齐武帝赎祝英台故宅建寺之事;宋薛季宣来到祝陵,游过善权洞后作《游祝陵善权洞》诗,并特别注曰:“寺故祝英台宅”;常州知府史能之是《咸淳毗陵志》的编纂者,他在编纂《咸淳毗陵志》时,还专为梁祝事对照《善卷寺记》进行了考证。由此可见,这块碑刻,在唐宋间尚在寺内。

由于《善卷寺记》作于公元483–485年,比《金楼子》早70年左右,比《十道四蕃志》早200多年,比《宣室志》早近400年,因此,它是我国迄今发现并可考的最早关于梁祝的文字记载。不仅如此,它还是最真实、最可信的梁祝记载。

我国其它地区的梁祝记载，其源多出于文人笔记。在文人笔记中,虽有亲见的事物,但更多的是听来的传闻，以及从资料中所搜集到的信息,并非全是自己亲身所历,本身就带有许多不确切的东西。而根据文人笔记记载的志乘,其真实性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不然的话,我国多处方志与典籍中的梁祝记载就无法解释了。

梁祝传说经历了1600多年的传播，其记载基本上是以传说为主的。除了许多典籍直接梁祝传说的内容外,史志中不少古迹、遗址、名胜的记载也源出于传说。以宁波为例,志乘中梁山伯庙的记载,就源于宋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而这个《庙记》所写的,就是带有浓重神话色彩的梁祝传说;史志中最早的“义妇冢”记载,也简述了一个传说中的梁祝故事，而其依据的“旧记”,则正是《义忠王庙记》。尽管宜兴的史志、古籍中,也不乏如“梁祝化蝶”之类传说的记载,但《善卷寺记》中的记载却完全不同,它所记的内容并不是梁祝传说,而是善卷寺创建过程。只是在记录帝王(齐武帝)作为(收赎祝英台故宅创建善卷寺)的时候,顺便带记到祝英台的。确切地说,《善卷寺记》写到祝英台,完全是沾了帝王的光。因此,它的可信度与史料价值都是其它梁祝传说记载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认,《善卷寺记》是我国现存可考的、最早、最真实、最可信的梁祝记载。

六. 宜兴唐代的梁祝记载也与《善卷寺记》有关

梁祝的记载,时间久远的甚少,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渐多。唐及唐以前的早期记载凤毛麟角,至今全国仅发现四、五处。而宜兴除了南齐的《善卷寺记》外,还发现了两处唐代的早期梁祝记载。

一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金寿楣《阳羡奇观》称:“《十道志》: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钱南扬与张恨水先生都说《十道四蕃志》其书不传。笔者曾经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处查阅,确无此书。



图一　善权寺（齐武帝时在祝英台故宅上建造）

但在清嘉庆《重订汉唐地理书钞片八》中，载有梁载言《十道志》的残卷，共抄录载于《太平御览》中的320条、《太平寰宇记》30条、《太平广记》3条，其中“卷下·江南道”记有苏浙皖闽事，但未见一个“梁祝”文字。山东清《聊城县志》引唐《艺文志》称：“唐梁载言（按：梁氏为聊城人）《十道志》十六卷，具负故事十卷，具负事迹十卷。”但在《重订汉唐地理书钞片八》中，未见附载的故事和事迹，可见其附载的故事与事迹均已散佚。按照钱南扬先生关于《金楼子》梁祝记载的判断，在未发现《阳羡奇观》所引《十道志》文字不可靠的证据以前，应视为确据。

我曾查阅《中国历史大辞典》及多种版本历代人名词典，均称梁载言作《十道志》。《十道四蕃志》是否梁氏所作，未得确证。但《十道四蕃志》应有其书，因为在《重订汉唐地理书钞·梁载言十道志》序录中除多次阐述梁《十道志》外，也有一处提到《十道四番志》，称：“至尤延之《遂初堂书目》，犹载有《十道四番（“番”通“蕃”）志》文献，《通考》遂不著录，则已亡矣。”因此，笔者相信《十道四番志》也为梁载言所作，但应作《十道志》在前，后来在《十道志》的基础上增加“四番”而成。

二是在明释方策弘治甲子（1504）《善权寺古今文录》“卷六·唐诗”中，收录有李蟫的《题善权寺石壁》诗，其诗有序为：“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节度使李蟫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奉敕作十方禅刹，住持乃命门僧玄觉主焉……”。据笔者考证，该诗的写作时间，约在876–879年间。李蟫的这一诗序，不仅本身就是梁祝的早期记载，也是《善卷寺记》碑刻的重要佐证。

这两处唐代记载，都与《善卷寺记》关联。李蟫的《题善权寺石壁序》自不必说，一看就知道是对《寺记》相关内容的直接引用。《十道志》中“祝英台读书处”的石刻，也与《寺记》有关：

明陈仁锡（1581–1636）《潜确居类书》称：“善权洞在常州府宜兴县国山东南，一名‘龙岩’，周幽王二十四年洞忽自开。俗传祝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为友，读书于此，后化为蝶。古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盖咏其事。南齐建元二年，建（善权寺）于其故宅，刻‘祝英台读书处’六大字。”从陈仁锡的记述看，善卷山上“祝英台读书处”的石刻大字，在公元四百多年的南齐就有了。因为创建善卷寺时收赎了祝



图二　碧鲜庵（梁山伯与祝英台原读书处）



图三　晋祝英台琴剑之塚(善卷洞后洞处)

英台的故宅,所以,善卷寺建成后,就在山上刻了这六个字。因此,《十道志》中关于“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的记载,正是根据善卷山上的这一古迹才记下的。

七. 宜兴才是梁祝传说的本源发生地

宜兴除了最早的梁祝记载外，还有丰富的遗存。

宜兴的“梁祝遗存”分为“历史遗存”与“传说遗存”两种。

其中历史遗存有：

1. 以祝英台故宅改建的善卷寺(图一)。该寺在善卷山南,始建于南齐高帝建元二年,齐武帝时建立寺额,千百年来历尽沧桑,现仅存天王殿、圆通阁、涌金亭及华藏门断垣,亦都只是清及清后的建筑。

2. 碧鲜庵碑(图二)。在善卷后洞处,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原善卷寺后，经考确认为史志古籍记载中的唐碑(按:另有专考)。

3. 善卷后洞摩崖石刻。唐代摩崖石刻已湮灭,现存仅3处:一是“飞来石”上铭刻4则,包括碧鲜庵碑出土记录、抗日军队拓展祝英台东潭记录以及梁祝诗词等;二是后洞石壁高处“阆环仙境”篆刻;三是后洞石壁“祝英台造像”石刻,署为“戊子中秋宜兴蒋晓云作”。

传说遗存有：

1. “祝陵”村名,在善卷洞南里许;

2. 晋义妇祝英台墓,在善卷洞东南1里青龙山上;

3. 晋祝英台琴剑之冢(图三),在善卷后洞;

4. 梁家庄,在善卷洞西北4里;

5. 马家庄,在善卷洞西20里;

6. 胡桥,在梁家庄西里许,是去马家庄的必经之路;

7. 十八相送之路，从善卷起到张渚十里亭共十八里,沿途有双井、土地堂、恶狗村、凤凰巢、七里亭、十里亭等。

8. 民间“观蝶节”。善卷山蝴蝶特多、特大,当地把最大的带长长尾翅的黑凤蝶称为“祝英台”,次大的黄凤蝶称为“梁山伯”。故县志称:“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精魂。”相传农历三月廿八是祝英台忌日,也是当地传统的“观蝶节”。每到这天,周围乡民都要穿上鲜艳的服装,赶到善卷山观蝶、踏青、游洞,祈求“蝶仙”保佑。

9. 碧鲜竹,俗称“英台竹”,生于善卷后洞,传为祝英台生前喜爱的植物。

宜兴与各地的“梁祝”相比,还有七个“最早”与一个“唯一”的优势：

1. 现存可考的最早“梁祝”记载(南齐);

2. 最早的祝英台故宅记载(南齐);

3. 最早的梁祝“读书处”记载(唐);

4. 最早对“梁祝”进行考证的史志(宋);

5. 现存可考的最早“梁祝”文物(唐);

6. 最早的“梁祝化蝶”记载(宋);

7. 最早与“梁祝传说”相关的地名“祝陵”(宋前);

8. 唯一有“祝英台故宅”记载之地。(按:均有专考)

正因为宜兴有最早的“梁祝”文字记载,有祝英台故宅和梁祝读书处，有美丽的梁祝化蝶传说和“观蝶节”民俗,有现存最早的“梁祝”文物,所以,只有宜兴,才是梁祝传说真正的起源地。

(编辑：阎智海)

再说“绿萝庵里看梅花”

石　雨

“绿萝庵里看梅花”的典故,现在无锡人已不大晓得了,但是“老无锡”们很熟悉:明代无锡南门有个叫龚勉的读书人除夕跑到东门绿萝庵避债，感叹自己贫困处境，在庵内壁上题诗一首,诗末云“绿萝庵里看梅花”。从此以后,这诗句就成为经济困难的隐语。现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无锡东门段风景名胜建设规划方案中有个景点叫“绿萝探梅”,据称这个景点名称设计的文化主题与“绿萝庵里看梅花”有关。然而,明清史籍中未见有绿萝庵里避债的记载，整个事情竟是查无实据!

绿萝庵不是寺院,是私人会所

明代绿萝庵很有名气，虽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湮没，明清时的多部无锡县志却对它均有记载。该庵在东门外，隔护城河与东门城墙相对,环境优美幽静。绿萝是藤本植物,生命力极强盛，有水即能活，其枝叶努力将绿色奉献人间，尤具空气净化功能。唐代诗人杜牧有诗句“栏围红药盛,架引绿萝长”,以芍药花之红映衬绿萝叶之绿,极尽色彩艳丽。绿萝庵这名称相当诗意。

绿萝庵主人是明嘉靖年间无锡有名的诗人、画家、退职官员王问。他致仕回无锡后,在城东觅地构精舍,方便自己读书会客宴饮,当时他与翰林学士华察,即现在坊间所称的“华太师”等无锡名流经常诗酒往来。由于他本人长期隐居五里湖宝界山,就“召僧守之”,即聘请和尚负责日常管理。所以绿萝庵是王问的私人会所,但后人看到绿萝庵的“庵”字,就以为它是烧香拜佛的寻常寺院,实是一个大误解。

当时绿萝庵并无佛寺常见的大雄宝殿、藏经阁之类建筑,只建有钓台、翻经台、乐饥亭、惠光塔、白牛谷、海天吟阁等景点。当时有关绿萝庵景致的诗文颇多，如海天吟阁诗云:“负郭宏开水上楼,春深画永足淹留。萝荫染碧连幽馆,柳色垂青绕细流。芳席有时来上客,闲清终日狎群鸥。桃源未必能逾此,高眺真同物外游。”将绿萝庵的方位、环境、景点特色描写得淋漓尽致,给人们的印象美丽深刻。

龚勉其人其事

无锡史上确有龚勉(1536–1607)其人。他生于嘉靖十五年,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字子勤,号云屋,后改毅所。无锡人,祖籍常州,后迁浙江,明初其先祖又由浙江迁至无锡定居。祖父辈都是勤朴农民。龚勉自幼聪颖,学习认真,文章好,书法好,不到20岁,就做了秀才,嘉靖四十三年(1564),29岁,考中举人,隆庆二年(1568)登进士榜,开始仕途生涯。

龚勉先后任嘉兴、吴桥知县,升任南京刑部主事,记载说他“明习爰书,为大司寇倚重”,意即龚勉撰写的司法文书,清楚准确,深得刑部尚书信任器重,晋升南京户部员外郎、郎中,记载说他 “处脂不染”——户部相当现在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国家粮食仓储管理中心,是所谓的“肥缺”,郎中正五品,相当现在的司局级正职,掌握实权,龚勉却不以权谋私。

之后龚勉任嘉兴知府、浙江参政,晋浙江按察使,晋浙江右布政使后致仕。回到无锡,龚勉针对当时江南粮长役差弊病，提出解决问题的“八议”,上报地方当局,得到采纳,百姓因此税赋简便,各类手续支出“省费过半”,不禁感恩戴德,为龚勉建生祠顶礼膜拜。纵观无锡地方史,历代官至尚书、侍郎、布政使等高位的读书人有很多,但无锡人为无锡人建生祠,只有龚勉一人

得此殊荣。另外,当时建生祠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已名震朝野,他在病中接受百姓请求,撰写《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这碑已湮没,但碑文现在还能看到。

当我们基本了解龚勉情况后,再来看他除夕逃到绿萝庵避债的可能性就会觉得很小,其事很不合常理。龚勉未做官前,虽然清寒,却是一个良知健全乐观向上的耕读儒生,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并无遭受意外灾祸的记录,也无不良嗜好,如酗酒、嫖妓、赌博、吸毒之类败家恶习,明代那时无毒品流通,会有什么额外需要,必须依赖大量借贷,致使除夕无钱应付上门的讨债人?

绿萝庵避债诗疑问

旧时无锡广泛流传的绿萝庵避债典故是:明代有年除夕,龚勉无力还钱,从南门走小路,躲到绿萝庵,以避开上门讨债的人。院中冷清寂寞,龚勉心情凄凉,就题诗壁上抒发郁闷:"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在别人家。今朝大年三十夜,绿萝庵里看梅花。"庵中尼姑见龚勉有此才情却遇困境,十分同情,招待他吃了年夜饭。从此龚勉发奋读书,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显宦。就这样,"绿萝庵里看梅花"渐成除夕外出避债的无锡俗话,而"绿萝庵"、"看梅花"也演化为经济困难的隐语。

这所谓龚勉绿萝庵避债诗,直白粗糙的打油诗风格,毫无诗家语韵味。龚勉年轻时有《始居南郭作》诗云:"迂志厌尘俗,因家南河濆。去城仅里许,地僻堪栖云。居然山林趣,况复非离群。绕屋皆水竹,开门见耕耘。遥望傍郭山,空翠来氤氲。予适鱼鸟性,去来颜色欣。税地给家食,借书广见闻。感彼南阳业,时吟梁甫言。"此诗朴素优美,把明代南门跨塘桥一带闹中取静、田园牧歌式乡村风光描写得仙景一般,同时也流露出他虽家境清贫,却胸怀诸葛亮躬耕陇亩为国服务的大志。任嘉兴知府时,龚勉咏烟雨楼诗:"孤屿当空涌碧涛,屿中楼阁入云高。苍茫仙峤浮湖面,缥缈瀛洲隔市嚣。烟雨一天唯此胜,风流千古独吾曹。春来东海桃花浪,还向矶头钓巨鳌。"气势雄浑,笔调清新。把这两诗与绿萝庵避债诗比较,可见诗风完全不一致。

另外,阅遍龚勉本人及明清相关诗文等史料,找不到关于龚勉到绿萝庵避债的记载,仅见于民国时的诗文。所以,将"绿萝庵里看梅花"与明代龚勉牵扯一起,也许不过就是民国时文人报人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轶事创作,以影射当时除夕破产者外出避债的窘态,吸引受众眼球而已。值得指出的是苏州也曾流传类似避债诗,说是唐伯虎有《除夕口占》诗云:"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情闲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此诗写除夕避债于淡定中带拮据的无奈,含蓄得多,明代苏州也确有竹堂寺,但是《唐伯虎先生集》、《唐伯虎先生外编》、《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诸书中均无此诗。恐怕它和无锡龚勉绿萝庵避债诗一样,不过是后人假托之作。笔者将这问题提出来,供无锡、苏州地方史专家研讨。

"绿萝探梅"与"绿萝国色"

既然"绿萝庵里看梅花"的典故纯属乌有之事,大运河东门段"绿萝探梅"景点名称的文化内涵,也就无从说起了。再说无锡已有以梅花为胜景的梅园,重复建设梅花景点实是资源浪费。

无锡史上东门有牡丹一本,每年春天花开数百朵,曾是无锡一大景致,观者如云,文人雅士留下的诗文曾编成集子。有诗记此事:"千红万紫笑春风,富贵花开春已终。洛圃香凝题好句,春光独占在城东。"可证东门一带水土非常适合栽培牡丹。

所以笔者觉得,如用"绿萝国色"替代规划中的"绿萝探梅",也许更具东门地方特色,且可以弥补现在无锡缺乏牡丹观赏胜景的缺憾。这无论对市民还是对旅游者,将更有吸引力。杜牧笔下的"绿萝红药"优美意象也当让位于"绿萝国色",无锡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可以因此增添新内容。

(编辑:阎智海)

解放前无锡报业“四大天王”结果迥异

吴伟勋

在1951年6月3日的《苏南日报》上刊载的无锡市人民法院布告中，华耀麟等人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布告中对华耀麟的罪行揭示如下：“华耀麟，男，四十一岁，无锡人，住新民路前城头弄六号。“报棍”任匪三青团主办之《大锡报》总编辑、《导报》副社长等职，与反革命分子孙德先、袁鹤皋、计锡麟等四人称为“四大天王”。在任职期间一贯利用报纸，进行反革命宣传，实行敲诈勒索，诬指华志成为“嫌疑分子”，敲诈金镯一支。并凭籍恶势力，诱胁市民选他为“国大代表”及“参议员”，解放后，大肆造谣恐吓群众，诬蔑政府。”

以上布告揭示了“四大天王”的恶名，他们控制了报社的权力，利用抗日胜利后惩办汉奸的机会，与反动的官方机构相互勾结、包庇，实行敲诈勒索。他们均在战前就已在报业中出名，对地方情况熟悉，例如孙德先、袁鹤皋等人，而华耀麟则在原《锡报》做画工，在抗日中参加过三青团，并被敌伪特工站逮捕过，后又承包汪伪之竹木税等伪职。抗战胜利后，华耀麟因讨好姚冬声而暂代《大锡报》总编辑，但是到《大锡报》重行改版时被辞掉。约半年多时间，华耀麟故态复萌，与孙德先、袁鹤皋形成三人档，旋办《导报》，气焰更加嚣张，并用金条拉拢重点对象。在解放前这一笔肮脏账，也只有人民政府才能负责一笔笔地算清，由于他们罪大恶极，故在镇反中被判处严重的处罚。孙德先和袁鹤皋初判是死刑，布告都已印好。他们二人曾在1949年与钱锺汉一起去苏北接洽无锡解放事宜，当时，民族工业家荣德生鉴于江南解放在即，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不甚明确，因此委托商会理事长钱孙卿的儿子钱锺汉与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杨数村与苏北联系好，到苏北去接受教育。而孙德先和袁鹤皋二人平时与钱锺汉关系甚密，旋提出一起去苏北，当时孙、袁二人的出发点是想捞点政治资本，作为有功地方，而袁鹤皋还提出带一个徒弟，作为其保镖。这事经过秘密商量后决定，杨数村是联络员，钱锺汉代表荣德生，孙德先、袁鹤皋代表无锡市工商界，另外一人是随员，因为孙、袁二人都是吸鸦片的，要一个人侍奉。

他们一行顺利到达苏北高邮后，由中共负责人顾风（解放后担任无锡市市长）等接待，顾十分慎重并向上级汇报，结果只同意钱锺汉与杨数村二人去淮阴会见苏北军区领导管文蔚、陈丕显、包厚昌等。这次收获至大，使得无锡的工业生产仍能照常开工，社会秩序也较好，达到了和平解放的目的。

而孙德先、袁鹤皋原先包涵投机成分之美梦没有实现，在镇反中还是被判处重刑。后经钱孙卿等向苏南行署请求，念其二人曾在解放前紧张形势中，冒险到苏北解放区进行活动，蒙核准改判为死缓2年，获得了宽大，强迫劳动改造。

从此“四大天王”中，华、孙、袁三人均判死缓2年，只有计锡麟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财产全部没收。

而劳动改造均在无锡，旧称苏南监狱，且在印刷厂一起劳动，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孙德先年事较高，但文学根基好，被安排为机印车间总校对。

袁鹤皋年纪也不轻，在装订车间劳动，他与孙德先都因在过去社会关系复杂，而外来调查资料的人比较多，经常提询，一般也称他们二人为过去无锡的“活字典”。

华耀麟担任机印车间的发稿,安排生产,工作比较忙些。

但他们三人,均判死缓2年。按规定判了死缓后均带脚镣,待投入劳动后即去除,但只有华耀麟一人带脚镣多年,这是全监唯一的带镣劳动。根据他平时为人,能说会道,而看他还是谈笑自如,并不像有什么忧虑的样子。直到肃反运动逐步深入,政府又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坦白检举大会,华耀麟却拖了脚镣,向大会进行坦白,他家里还藏着过去敲诈的金条70两(计7根10两的金条)。政府马上押他一起到他家里,金条是砌在墙壁里的,经取回后,华耀麟的脚镣也当即去掉。这使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偷天换日,弄虚作假,迟早要被识破的。而政府为什么要他带镣劳动,这也是一种考验,看你能不能自觉,这思想改造就是要依靠自己。

华耀麟经此重大的考核,自觉过去的一套是行不通了,只有在劳动上才有转机。政府则本着教育为人,每到年终照常开展评选积极分子的活动,而华耀麟也榜上有名了。在全国开展公私合营后,政府还组织劳改人员到监外去参观,无锡的市容大变革使大家吃惊,社会的发展如此之快。尤其到申新三厂去参观,其规模比以前更大了,包括振新纺织厂也合并在一起,还听到厂方负责人作了报告,申新的发展还要扩充到百万纱锭的计划,这说明了公私合营的前景是如此宽广,令人振奋。最后还鼓舞我们,好好接受改造,重做新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原振新纱厂副经理蒋宪基突然经过会场时,华耀麟情不自禁,忘记出来参观前向大家公布,见到熟人也不能招呼,而他欲向蒋宪基招呼的行为后来受到了批评。(蒋宪基曾是《导报》的社长,是华的老上司)因蒋宪基是申新纺织公司副经理,是路过此地,弄得他也十分尴尬,虽看到熟人不少,但也不好向大家招呼。

孙德先、袁鹤皋、华耀麟这三个死缓2年后均改判为无期。孙德先因遭遇家庭变故,他的妻子已病殁,儿子在外地工作,因此家人对他的照顾等于零,且他的吸毒年数较早,而今年老多病,已无能力劳动。政府对他还是相当关心,平时已让他全天休息服药,尽到人道主义的责任。

袁鹤皋却十分活跃,他的年龄要比孙德先差的多,加上家境较好,因此对他照顾的不差。而当前的处境不同了,各人有各人的前途,同时,也不能结成小团体。孙德先病倒后,他对外调的任务也由袁鹤皋一人担当,确实比以前忙,因此造成他天天写材料,而其他的装订工作也不能安排了,他也藉此机会,如不写材料也是一支笔在写字。其实他是在向政府靠拢,因工作人员很忙,不可能经常来车间,那时就有风传,印刷厂有二支笔,一支是袁鹤皋,另一支是排字间的计锡麟。这情况原来我也不清楚的。我的劳动安排在棉织部,担任总收发,要管理四五个车间,十分繁忙。后毛巾部并到苏州去了,工务主任徐煜初来棉织部,调我到大灶当收发。后印刷厂张主任又调我到印刷厂排字车间担任收发,因此就与他们接触多了,听到的反映也不少,如华耀麟说,忙了一天,不及人家一支笔。排字车间虽十多人,派别却不少,相互不配合、不协调,好坏不分。我了解了以上情况后,即向印刷厂张主任提建议,印刷厂可以开展劳动竞争,分产量、质量、责任、效果,分成排字、机印、装订三组,每月小组评比,每日作记录,全年全厂评比,因此效果极好。全年的积极分子人数大增,连排字车间的张中杰也评上积极分子。他原是社教院的学生,由于生性偏激,相互关系不融洽,经常给教管员吃批评,但他年轻,接受能力强,排字技术较好,后经过谆谆的劝导,使他幡悟改正,走上了正轨。华耀麟而后也有觉醒,从开展劳动竞赛后,每台机工负责性加强了,过去推着做,现在是争着做,所以使他安排也顺利了。机印车间的业绩蒸蒸日上,华耀麟见到我,总要说几句,认为自孙德先患病休息以来,孙的工作也由他担当,过去范力琪刑满回家后的工作也由他负责,多做了不见好,而车间一有点事就招来

批评,因此埋怨一支笔,这明指是袁鹤皋,因为印刷厂的李指导员天天要找他,华耀麟感到委屈,认为自己永世没有出头之日。我还是劝他不要灰心,还得千方百计要多为政府出力,少为自己打算,成绩是日积月累,改造思想是洗心革面,但是要做到也不是容易的,一切还得向前看。可见他俩积怨甚深。我调到印刷厂时间并不长,后棉织部工务主任姚静梅(是印刷厂张主任的爱人),又把我调回棉织部织造车间,要求我搞劳动竞赛,因此当时称我为"救火收发"。但织造车间环境却完全不同,都是女犯,情况更加复杂,而离开印刷厂就与他们隔绝了。

不久,劳改企业建华工厂大扩充,另建新址在双河尖,是过去的电热厂改建的,主要重点是机械厂,生产机床附件卡盘,已打出牌子,完全是机械化,有新型的车间,分三班制生产。棉织部并到常州去,我也调到机械厂当收发,并委我为犯人中的小头头,为纪律维护组组长,王双林为副组长。一直到1966年4月26日,我们被判15年的已到期,一共达30多人。到1966年5月15日,上午宣布,只有我一人能够回家,樊典狱长找我谈话,回去后要做好榜样,继续好好改造。计锡麟在上一年被改刑1年,但还是调到社诸农村等待处理,其他均一律往社诸农场留待。那时的形势是严峻的,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列为"四大天王"的最末一位计锡麟,政府对他的量刑是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财产全部没收,计大中木行股份4000万元,以及他个人的衣服等,没有听到有什么金条,这说明他并没有参与敲诈集团。但政府对他家庭也相当照顾,因其妻子无工作,而子女较多,正在读书,政府还是按人头每月给予补助,这一点使计锡麟觉得感激,也使他能安心地改造。他妻子依靠缝纫加工补贴家用,直到大儿子有了工作后才好转。我与他均是西门人,平时互相关心。他也在解放前染有毒瘾,吸鸦片的开销很大,如孙德先和袁鹤皋是依靠杨祖让,而计锡麟也有后台的,靠山是马路上的京沪饭店,老板贩毒起家,计锡麟被其请为京沪饭店的顾问。计直到解放后才被迫戒掉吸毒,他的妻子有时到我家来坐坐,谈到计锡麟戒掉鸦片的痛楚,相等于换了一个人,鸦片对他的身体危害至深。

计锡麟一直到1979年才回到家里,我们相隔了14年。赵天一也从陕西释放回来,同样也是与计锡麟安排在第四橡胶厂做半天轻微劳动,领点报酬。在政治上也可参加民主党派,他俩均加入民革为会员。那时,我们积极写了不少文史资料,我个人就达40万字,而他们二人也写了不少。我到1983年申请平反,直到1985年重新判决,撤销1951年的判决,并定为投诚成员待遇。计锡麟也去申请平反,他与锡西共产党陆道元有联系,结果也平反,只是一般的平反。因此看来计锡麟在"四大天王"中是罪行最轻的一个。计在民革中声誉也极佳,后登上民革的芳名录。

其他三人的结果,只有袁鹤皋是在1979年释放回家,并且政府还退给他一些黄金,作为晚年的生活费。据国家规定,建华工厂对死缓2年并改判为无期后,表现好的超过25年,就可释放,他就属于这些条件,是比较特殊的。

而孙德先因已奄奄一息,死在狱中。

但未听到华耀麟释放的信息,他以后的情况,我们也不得而知。由此说来,这"四大天王"的结果各有不同,处境各有迥异。

(编辑:阎智海、何桦)

张闻天与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王 玲

抗战时期张闻天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可说是建树良多。张闻天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至1942年1月去陕北、晋西北等地进行农村调查,离开中央核心领导层。在此期间,他对中共内部的干部教育工作一直亲自负责。1937年4月,《解放》周刊创刊,张闻天任主编。1937年12月起,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兼任。1938年5月,马列学院创办,张闻天兼任院长。从1939年2月起,他兼任干部教育部部长并兼《共产党人》编辑。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为宣传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

一. 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

1. 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培养。建党初期,党就开办了各类训练班和讲习所,并注重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培养干部。大革命时期,党通过选派优秀分子进黄埔军校和去苏联学习等途径来培养干部,并要求在革命工作中训练干部,使各级地方党组织成为培养干部的直接训练机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培养领导苏区和白区革命斗争的干部,中央又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等各级学校和训练班。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培养大量的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方面的领导干部,成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1935年12月,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党要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也强调:“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张闻天在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明确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过去,没有我们党的大批干部的牺牲奋斗,人民事业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今后,如果没有我们党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总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始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并将其视为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因素。

2. 敌后抗日战场急需大量干部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勇敢深入敌后,建立扩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与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相反的新形势。从1938年春到1940年底,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华中等大片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也发展到近50万,抵抗和牵制了日军45%以上的兵力。与此同

时,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到1亿,党员有80万。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极大地提振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但是,由于发展速度很快,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领导干部。从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国各地大批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知识青年,成群结队,热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这些新生力量,虽然抗日热情很高,但急需加强领导和培养领导干部；二是既有的领导干部亟待加强学习。经过长期战争考验或长期地下工作锻炼的干部,虽然革命意志坚决、对敌英勇作战,但是,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任务,急需提高领导斗争的水平和能力。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培养能够担当抗日工作重任的领导干部，已成为党领导抗日斗争亟待加强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也引起了张闻天的高度重视。

3. 建国大业需要储备领导人才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伴随着抗战的胜利步伐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必将继续担负起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同敌人作艰苦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且还要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复杂的斗争。党不但要拥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也还需要有自己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要有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又懂得专业技术的革命新干部。由此，党中央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等。对于这些学校,张闻天十分重视和关心,他曾到陕北公学等学校讲过课、作过报告;他虽然不是“鲁艺”的发起人,但在“鲁艺”创办之前,毛泽东曾专门与他商讨过,他还于1938年4月20日为鲁艺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

二. 张闻天对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贡献

1. 创办延安马列学院

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1938年5月5日,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120周年诞辰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学。从马列学院创办伊始到1941年7月改组,张闻天兼任院长前后有三年多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时，张闻天主持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课程。学校专职教师的配备在当时延安堪称一流。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他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线方面的主将之一；讲授哲学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他所著的《大众哲学》一书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他曾留学苏联，后来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国民经济部部长,他第一个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杨松和讲授西洋革命史的陈昌浩也都去苏联学习过,陈昌浩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此外,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曾到马列学院讲授党的建设课程,或作专题报告。除了以上6门课之外,张闻天还十分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他多次邀请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战争与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和《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毛泽东的其它重要著作每当发表,张闻天也都要组织学员认真学习。

学院从1938年5月开办到1941年7月改组,通过入学考试,共招收过5个班(即五届)。第一

班80多人,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再加上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专门开设的两个班100多人,学员全部约有八九百人。学员的基本构成是两部分:一是参加革命战争多年，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其中有些还是很有资历的红军指挥员和地下党的领导人；二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入党的知识青年,这些学生在入学之前,大多经过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安吴训练班等的短期学习。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可以说,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列学院培养和教育了一批坚强的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创造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2. 主办三大理论刊物

《解放》系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24日为适应“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新形势而公开发行的一份理论刊物,张闻天任主编。从创刊到1941年8月31日终刊,共出版134期。

在主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张闻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除了从事刊物的领导工作外,他还在刊物上发表了《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等重要文章,得到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称赞。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和发表(署名洛甫)的文章就有20多篇。张闻天还经常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解放》的选题内容,分配写稿、组稿的任务，并把来自各地党的报告选登在上面。有些文稿还请毛泽东审阅,听取意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文章都是首先在这本刊物上发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解放》刊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对干部的宣传教育中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1939年《解放》创刊两周年时刊发的编者专论就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所发表的文章，乃是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并特别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著作。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部工作时,张闻天报告说:《解放》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传播了中央主张”。毛泽东赞扬说:“洛甫报告很好”,并认为“理论刊物的编印延安是空前的”。

《共产党人》是按照毛泽东的提议而创办的一个全国性党内宣传教育刊物，并由他亲自撰写《发刊词》。从1939年10月20日到1941年8月共出了19期,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及有关部门对党的建设的指示、决议,传播党建工作的经验,宣传党的政策和策略,指导干部教育工作。主任编辑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张闻天为该刊先后撰写了《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党的两种工作方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纪念五五学习节》等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

《中国文化》是1940年2月15日创刊的。193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延安文化界要与外界多加联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应扩大,由张闻天兼书记,出版《中国文化》,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随即,在文委书记张闻天领导下,《中国文化》由秘书长兼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主编出版。在第1、2期上,分别刊出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两个报告。《中国文化》兼顾为抗战服务和提高学术水平两方面的任务。该刊对不同观点兼收并蓄,打破各种限制,努力营造一种大胆创作、著述,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氛围,令人耳目一

新。《中国文化》出版到1941年8月20日第3卷第2、3期合刊后停刊,共出版15期。

3.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编译出版马列著作

培养领导干部，除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和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外，还必须有一些可供学员学习和研究的教材。就当时而言,尤其需要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译本。在这方面,张闻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刚到陕北时,就指导中央宣传部的同志编写简明通俗、图文并茂的《党员课本》,并由他亲自修改定稿。他还亲自组织与指导编写了一套抗日根据地小学语文课本。最为著名的是他亲自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也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1937年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因读者反响热烈,供不应求,后在上海、武汉等地相继翻印,流传全国。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参考了这本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将这本书作为课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了10多个版本,印行在20次以上,可见它是当时极受欢迎的教材。诚然,由于当时参考资料少，加之全党对于历史经验还没有进行系统总结,因此,该书有些史实不够准确,论断不够正确。但总的来说，由于张闻天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这本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张闻天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也化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了做好马列著作编译工作，他在马列学院特地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编译部,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该部前后花了将近六年时间,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10册、《列宁选集》20卷。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适应了党中央大量培养干部的迫切需要。

三. 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对张闻天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实践和思想观点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历史经验和启示：

1. 干部教育第一。抗战时期,尽管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十分艰苦，但党中央依然创造条件开展和发展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科研院校。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除了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外,还主管中央内部的干部教育和宣传工作。此外，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不仅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还经常参加各级干部学校的教育活动,作报告、搞讲演。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工作,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兼任部长。1941年12月到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相继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在总结几年来干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这对当前来说,还仍然是适用的。

2. 培养干部应强调德才兼备。党对干部的要求历来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关于抗战时期的“德”的要求,就是毛泽东1937年10月为陕北公学成立时所作题词的内容:“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

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这个题词,不仅仅是对陕北公学提出的，也是对陕甘宁边区和全国所有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提出的，是为所有干部学校规定的德育方面的培养目标。张闻天在主持干部教育时正是按照这一要求去做的。在“才”方面,张闻天提出干部必须“精通业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要安心于自己所负担的任何革命工作,而且要把这工作做好。在他的积极主张下,有关内容被列为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第一次写进了党章。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对干部的要求也十分具体,如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帮助35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帮助老百姓订一个10年植树计划;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31万匹布、470万斤铁等等。张闻天还认为,这些品德和能力的养成，既要通过干部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业务课程的教育，更需要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这种革命品德和工作能力一旦形成,就能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取得伟大的胜利。

3.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生命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原则。对此,张闻天结合实际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马列学院正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培养、教育干部的。张闻天非常重视实际工作经验,凡有高级领导人从前线、敌后或大后方回到延安,都要请他们作报告。先后到马列学院作报告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董必武、贺龙、张鼎丞等二三十人。这些报告的内容,有的涉及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战略和前途,有的讲敌后战场、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有的则专门介绍如何开辟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对日作战、如何克服困难,等等。这些高级领导同志的报告,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每门课程讲完后，都由张闻天主持半天的课堂问答,就一周所学的功课综合提问,考查学员的理解程度与掌握的情况。他根据学员的不同学习情况，提出不同的问题，请学员进行回答。在检查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理解上有何困难，青年学生出身的新干部能否联系实际,并根据各自不足之处给予指导。这种课堂问答,带有自由讨论的性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形式。学员们私下把这种教学形式称为“照相”。张闻天也觉得这个称呼很好,有时也加以使用，并风趣地说:“现在我们开始‘照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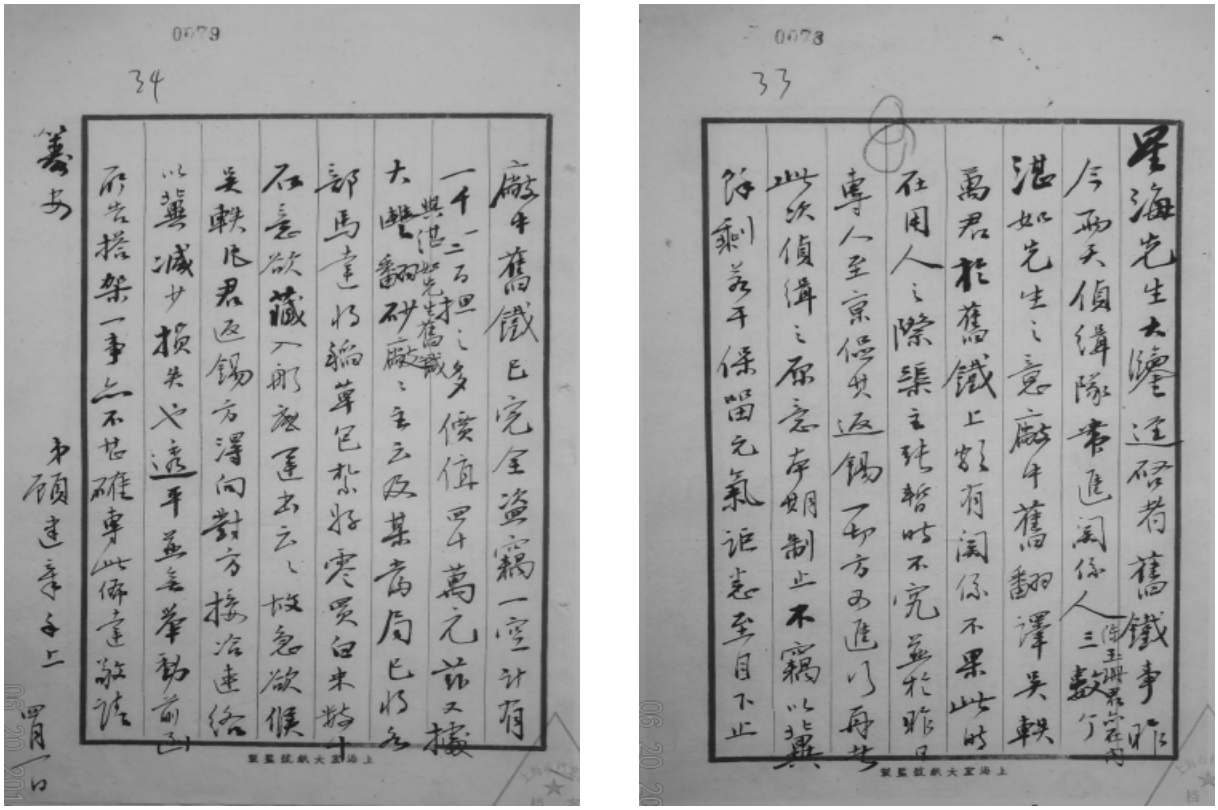
除了在马列学院对学员进行基础知识和理论教育之外，为增强学员对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的感性认识，张闻天还要求学员上山开荒种地,参加大生产运动和下乡征购粮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列学院改组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张闻天响应中央发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的号召,于1942年亲自率领一个调查团深入到陕北、晋西北进行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以实际行动树立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榜样。

综上所述,张闻天在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中付出的心血,既包括他对我们党重视干部教育培养传统的传承和广大,也内含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他关于干部教育培养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于当前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进一步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等,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编辑：阎智海)

庆丰纱厂 1943

顾　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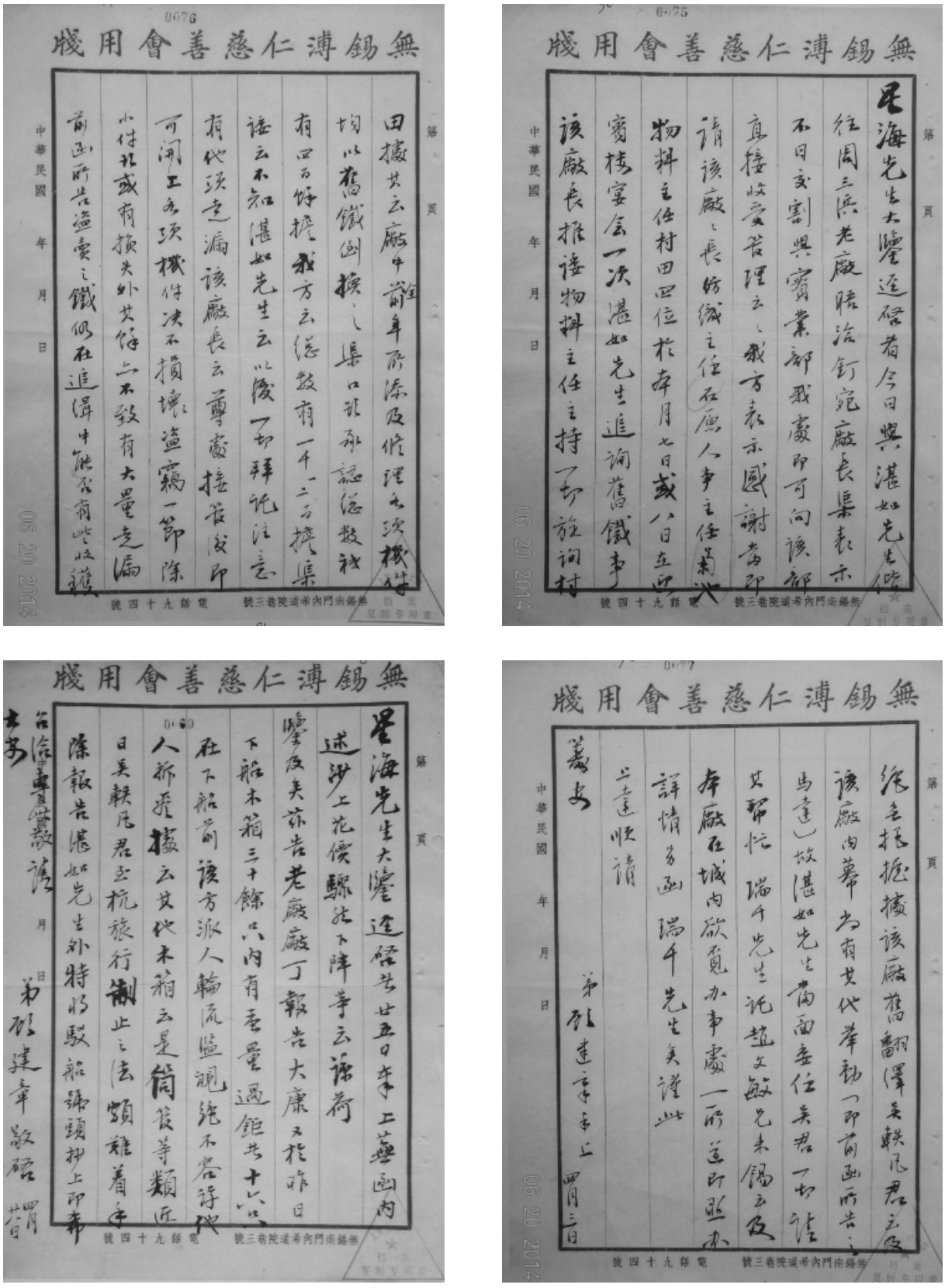
图一　顾建章致唐星海函(4 月 1 日)

1937年日寇轰炸无锡周山浜，庆丰纱厂受到重创并被日军占领。1938年日寇将庆丰纱厂交给日本大康纱厂经营管理。1943年是无锡庆丰纱厂被夺第六个年头,厂名为“大日本纺织庆丰纱厂”,这一年庆丰纱厂发生急剧变化。笔者在上海档案馆查阅到几十件唐星海信函(图一、图二)等史料,经过整理、归纳和研究,本文试图再现七十多年前的真实情景和部分细节。

“归还”闹剧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侵华日寇野心受阻。为了壮大自己的邪恶势力,1943年1月日寇与汪伪政府发表《共同作战联合宣言》,开始对盟国宣战。作为“安抚”,日寇将1937年掠夺的部分工厂交给南京伪政府管理,演出“归还”闹剧。

贪婪的日本大康纱厂在归还庆丰之前,大肆偷盗庆丰的物资，唐星海则安排耳目暗中监视。1943年3月21日,日本领事馆派人到庆丰商议归还事宜,要求把透平发电机揩抹清洗,似乎要拆卸运走,唐星海得悉后焦急万分,吩咐密切监视。3月23日,大康纱厂开始搬运庆丰厂内的设备和花衣旧棉絮等物资,共装有六、七船。4月2日,顾建章与陈某到警察局,举报参与盗窃和销赃的案情，并与侦辑队长同赴周山浜与钉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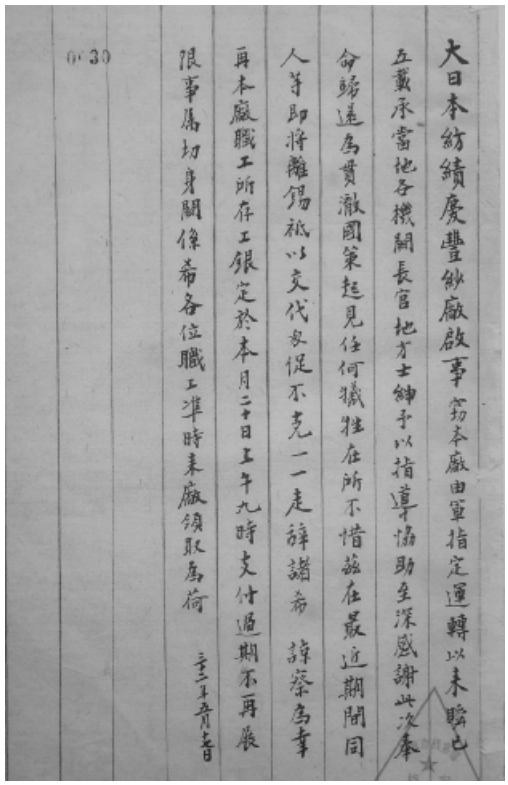
图二　顾建章致唐星海函(4月3日、4月28日)

接洽,后来私运生铁的人被捉到。

4月3日,陈湛如(庆丰中方代表)和顾建章(顾叶舟侄儿)一起来到周山浜会晤日方钉宛厂长,钉宛表示日方将把“大日本纺织庆丰纱厂”交给南京政府实业部,庆丰再从实业部接收管理。陈湛如当即表示感谢,决定在迎宾楼宴请钉宛厂长、纺织部主任石原、人事主任菊池、物料主任村田等四位。4月14日中午,陈湛如在迎宾楼宴请钉宛、菊池、村田,吴轶帆(翻译、原为医生),陶心华(庆丰老财务主管)、顾建章等作陪。钉丸担保发还后即可开车。根据唐星海授意,席间陈湛如追问旧铁被盗事情,厂长推诿物料主任主持一切,随即询问村田,村田支支吾吾说:被盗400多担。唐星海实际掌握为1200担,村田推说不知道。钉宛厂长再三表示:各设备均完好,接管后即可开工,就此搪塞过去。4月20日,周山浜工房内设解散酒,席开六桌,21日发放解散费,然后雇船8只,月底送返。日人眷属23日准备搬走,少数留下交接。

4月29日,上海召开有关日据工厂归还南京政府实业部会议,钉宛从无锡出发前与陈湛如和陶心华见面,表示过两天回锡商讨正式归还事宜,对疯传的厂内盗窃之事进行狡辩。5月2日,为了防止盗窃,陶心华安排尤松麟、惠荣林、尤阿二、蒋老五等人佩戴自卫团袖章进厂看守。为了安排上海保丰部分人员回无锡,唐星海委托好友杨四箴回锡交涉邓姓房屋事宜,作为归还后的办公用房。杨四箴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17年毕业后担任无锡圣公会副牧师,抗战后避居上海,担任上海辅仁中学校长(光复后回锡担任无锡辅仁中学校长)。

1943年5月17日周山浜贴出启事,全文如下:“大日本纺织庆丰纱厂启事:窃本厂由军指定运转以来,瞬已五载,承当地各机关长官地方士绅予以指导协助,至深感谢。此次奉命归还。为贯彻国策起见,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兹在最近期间,同人等即将离锡,祇以交代匆促,不克一一走辞,诸希谅察为幸。再本厂职工所存工银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九时支付,过期不再展限,事属切身关系,希各位职工准时来厂领取为荷。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图三)归还闹剧就此告一段落。


大日本紡績慶豐紗廠啟事

窃本廠由軍指定運轉以來瞬已
五載承當地各機關長官地方士紳予以指導協助至深感謝此次奉
命歸還為貫徹國策起見任何犧牲在所不惜茲在最近期間同
人等即將離錫祇以交代匆促不克一一走辭諸希
諒察為幸
再本廠職工所存工銀定於本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支付過期不再展
限事屬切身關係希各位職工準時來廠領取為荷

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0·30

图三　日本归还庆丰纱厂启事

常阴沙再现“时泰祥”

无锡沦陷后,常阴沙的“庆丰纱号”与母厂一起遭殃,奄奄一息。为了抢夺棉花资源,1943年的常阴沙更是大小汉奸、三教九流横行霸道的角力场。为了生计,顾叶舟的堂弟顾赞廷挺身而出,依托顾叶舟在常阴沙耕耘多年的影响和广大棉农的情感因素,出资成立新“时泰祥花行”,在常阴沙一带为庆丰、保丰、上海庆祥花号、苏伦纱厂等代理收花。期间常阴沙“庆丰纱号”同时存在,顾锡麟(顾叶舟侄儿)一人挑二担。

1943年初,汪伪政权公布《战时物资移动取缔办法》,常阴沙的棉花被列为统制物资。还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唐寿民任理事长,唐星海任“苏浙皖纱厂联合会”常务委员。唐星海还担任下属的“棉业公司”的董监事,任务是收购低价原棉,从无锡抽调高级职员龚讚模到

上海代替他做此工作。1943年3月5日,上海市纱厂业同业公会成立,理事长闻兰亭,副理事长江上达,唐星海是常务理事之一。

4月27日,顾锡麟给唐星海的信函要点:常阴沙的"苏南公司"近日联络地头蛇"特工队"挨户搜查各家花行,凡没有经登记过的立即定为"囤积罪",没收棉花;登记过的强行"抽买三成"。因事先获知消息,连夜将庆丰名下的棉花补办登记免于没收,但是被强行"抽买三成"损失惨重。与此同时,江上达名下有几百包皮棉储存在常阴沙,他买通赖志泉开了私人证明,获得免抽三成损失。希望星海先生与江上达联系,疏通关系避免损失。"苏南公司"是敌伪控制的南方纱厂在常阴沙的联合收花处。唐星海利用各类人脉,在各种势力混战中疲于奔命,苦苦支撑庆丰纱厂经营。

兄弟博弈

无锡沦陷后,唐星海将主要精力用于筹建上海保丰,无锡事务则由弟弟唐晔如和叔叔唐纪云就近关照。狡猾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七分头与唐氏兄弟讲条件,先主动向唐星海提出合作三条件:资产修理归庆丰,流动资金归大康,利益对半;唐星海没有答应,坚持庆丰权益全部归还。于是日本大康纱厂全力向唐晔如施压,提出附加条件:同意日军征用庆丰发电机(3座计6000kw)。唐晔如组建了"庆丰股东管理委员会",成员有:唐晔如、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等。在汪伪实业部次长袁愈佺牵线下,南京伪政府实业部任命唐晔如为经理,过特志为厂长。

1943年9月,汪伪政府改组,袁愈佺下台,梅思平任实业部部长,次长陈蚩君,要员王树春,唐星海与新班子关系热络,于是通过南京法院状告弟弟唐晔如侵权。无锡法院倾向唐晔如,南京法院则倾向唐星海。唐晔如的主要辩词是:唐星海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唐晔如才是家族产业的正统继承者,双方各施其招不分伯仲,官司陷入胶着状态。此刻大和藤六向庆丰纱厂提出索要"复旧费"120万日币,向庆丰施压,笃信佛教的唐晔如和唐松源自知不是应付邪恶之才,只得请出擅长与狼共舞的唐星海收拾残局。唐星海立即上下周旋左右打点,最终实业部在工业司帮办交监人许庆潼交监下,由前厂长过特志将庆丰交给唐星海。面临千疮百孔的庆丰和诡异凶险的局势,四十六岁的唐星海重新规划庆丰发展的蓝图;在常阴沙,六十七岁的顾赞廷带领顾家子弟在产棉区艰难前行,确保母厂的原料供应。

回归后的庆丰恢复了1937年的厂名:"庆丰纺织漂染整理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后的董事九位:陈湛如、唐纪云、蔡松如、唐星海、薛汇东、蔡漱岑、唐鸿基、唐瑞千、孙国英,陈湛如任董事长,唐星海任经理兼厂长。唐星海将经历轰炸火烧过的2000纱锭转移放置到常熟一间米厂内,第二年建立了"常熟家庭纺织工业社"。其余设备进行填平补齐,逐步恢复运行。任命吴玉麟任厂长(原戚墅堰电厂经理),黄云癸任副厂长。唐晔如和唐松源到上海另辟蹊径,筹建了源丰毛纺厂和肇新纱厂,他们仍旧是庆丰较大的股东,只是暂时退出庆丰经营管理层。

唐星海来到周山浜,在归还后的老厂区巡视一周,复建工程蓝图早就在胸,问题是如何筹钱。1920年老庆丰创建初期恰遇"纱贱花贵"险境,全靠父亲唐保谦从九丰面粉厂调动资金支持,顾叶舟从常阴纱调剂棉花,确保庆丰纱厂脱险。时过境迁,如今没有了当年的助力,只能全靠自己。唐星海权衡保丰和庆丰两地股东的微妙关系后拿定主意:无锡庆丰恢复所需资金要从无锡挖。

本文描述了庆丰纱厂的唐氏和顾氏在沦陷区奋斗求生的故事,是当年棉纺业的典型。在国难黑暗的1943年,锡商凭借坚韧毅力和智慧与命运抗争,犹如岩石缝隙中顽强生长的一颗颗小树。

(编辑:阎智海)

唐文治故居轶事

于　芷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轰炸无锡,我家避难胡埭。次年初夏回南上塘租赁的住所,隔壁王尧臣宅(今梁溪饭店)已成伪无锡地方维持会,驻日军一部站岗放哨，常见汽车绑了一批青壮年百姓驶入。夜深人静,隐约听见拷打哀号,且只见捉进去,不见放出来,心中恐慌,乃于1939年春迁出,寄居前西溪唐文治故居,在那里度过四年少年时期。时唐先生住上海租界养病,拒绝敌伪方面邀请任职，派五十岁左右的太仓同乡王某夫妇在锡管理房产，我称之为王先生、王师母,他们待人和蔼,常给我娓娓讲述唐宅故事。后来我上中学,许岱云、徐湘亭、须小山诸老师都是国学专修馆毕业生,也常讲起唐先生事迹,使我对唐宅增加了解,现就记忆所及笔录之。

一. 周舜卿义赠宅基

旧时梁溪从西水关入城析为两支，一支向东为束带河,一支向北为内城河。前西溪和后西溪都是内城河的支流，两溪之间在清末尚多荒地棚户,水面开阔处叫做荷花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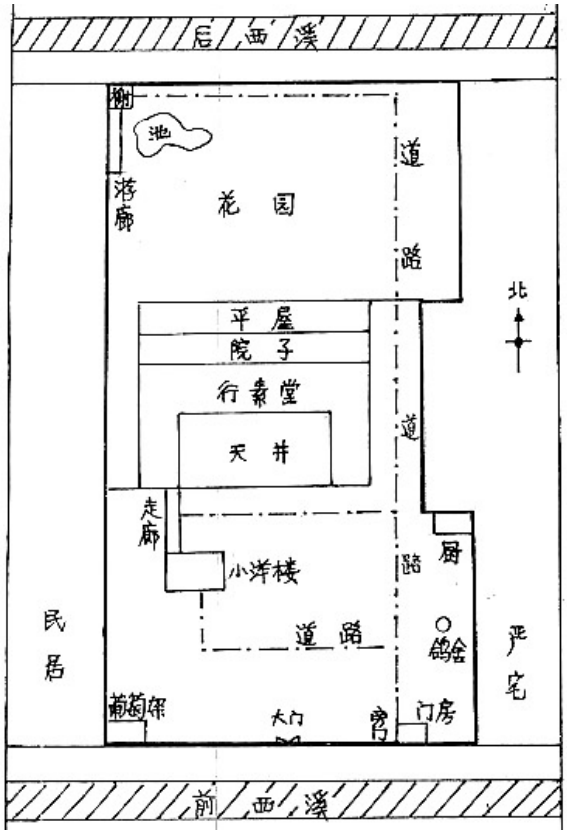
1903年至1906年间,唐先生供职满清政府,从商部右丞做到署理尚书。父亲唐若钦老塾师,性喜水乡山林,对无锡风光极为欣赏,有终老之意。偶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家周舜卿所知,便主动赠予前西溪宅基一块,面积约十余亩。唐先生孝顺父意，愿购此地基筑室寓居，但决不接受馈赠。1909年左右,唐先生送上地价,周氏原款璧还,往返几次,如《镜花缘》中之君子交易。直到周氏去世，唐先生向其长子周肇甫表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一向清廉自守，令尊厚赠使我感激，但我不能有损节操,望能谅鉴。”结果周家终于收银圆三千元,了却唐先生心愿。

其实这时唐先生已摆脱仕途，主持上海南洋实业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即使受赠也并无关系。但唐先生爱惜名誉,坚持避嫌,人品端正如此,足为后人楷模。

二. 唐宅的平面布置

此前前西溪已成断头河浜,不通城中直河。唐宅居河浜中段,宅第北延至后西溪,东与严毓芬宅相邻,西面有些零星民居。交通尚称方便,是市区闹中取静的地块。

经唐先生亲自擘划,四周筑墙,中部建堂,前后建园,平面布置略如下图(图一)。大门南向,平时关闭,从旁门出入。门房一间,司阍兼任



图一　唐宅平面布置示意图

花匠杂役。后有鸽舍状如水塔,蓄鸽子数十只,飞翔空中,昼出晚归。主建筑行素堂两层,木结构,自成院落,形似四合院、转盘楼。大厅五开间,堂匾为黎元洪手书,桌椅、茶几与一般厅堂相同,并设一米见方之书柜六只,内贮经史子集,异于常规。厅上铺方砖,楼上楼下居室敷广漆木地板,皆有外廊转通。后面院子植梨树两棵,秋天硕果累累。最后平房七间为下房。

堂南有一栋小洋楼,三开间两层,西式清水墙,是教育家俞庆棠女士与唐先生长子唐庆诒教授的婚房,建于1921年,晚于行素堂十年。设走廊与主屋相通,为唐、俞每日定省必由之路。

宅内道路均以煤屑夯实,上面平铺青砖,冬青夹道。前园散植海棠、樱桃及玫瑰、月季等花卉,隔壁严宅之木香攀墙而入,芳香扑鼻。后园凿池,暗沟与后西溪通,一池春水,黄石驳岸随意曲折,周边垂柳拂面。沿墙种翠竹、芭蕉。中部广栽桃花,春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如临桃花源。西北角设水榭及游廊,供来客小憩。

宅第装潢比较朴素大方,透出文人气息。

三. 下轿冒雨过孔庙

大厅外廊的西侧,过去停着一乘小轿。

1920年唐先生创办国学专修馆时,双目已失明,行走不便。后来国专迁至学前街尊经阁,也只能乘轿上班。路线是从前西溪向东至贯桥街(今健康路),于堰桥下左转经学前街,过孔庙而达学校。在孔庙的"圣域"、"贤关"两枋的一侧,立有花岗岩竖石,上刻"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字样,封建时代人人遵守,民国以后无人理会。唐先生是孔门弟子,为表示对先师的崇敬,关照轿夫到此须让他下轿,扶杖缓步而行。某日途中忽然落"阵头雨",未备雨伞,抬轿者加速步伐,想冲过门枋。不料唐先生心中明白,顿足唤停,冒着瓢泼大雨走过孔庙,穿了湿衣上课。

校中老师为防止重蹈雨中步行,损害唐先生健康,商定在国专后街开一便门。从此行程改为自前西溪入七尺场,转学弄,左转至北禅寺巷便门出入。

此事在社会上辗转传播,群众益信唐先生之诚意执着。

四. 腌草头与酱香橼

王先生生活简朴,一袭长衫旧而整洁,说话斯文有礼,其实文化水平不高。王师母慈祥和气,擅于持家,一顶纱帐上许多小洞,她用各种淡色碎布剪成圆形,细针密线缝作补丁,看上去十分漂亮。他俩一贯粗茶淡饭,到初一月半才吃点小荤,说是向唐家学的,现在想来是受唐先生潜移默化。

后园桃丛中有一片苜蓿,太仓人叫草头,无锡人叫金花菜,嫩的时候很鲜美,老了嵌牙齿嚼不动。前园杂树中有两棵香橼,只能闻不能吃,太酸。有次王师母送给二碟小菜:腌草头和酱香橼。她说这是唐先生最爱吃的,让我家尝尝,果然味道与众不同。原来她乘草头鲜嫩茂盛时摘下晒半干,盐渍装翁;把香橼洗净去瓤,塞进萝卜丝,放在自制的甜酱中浸透,使得"菜蔬逾珍馐"。七十多年过去,令我思念不置。

王先生讲:唐家从不杀鸡宰鸭,中午青菜豆腐,下午的点心非芋头即山芋,早餐有只鸡蛋作营养品。门生故旧如馈送鱼肉糕点只吃一半,另一半留下招待宾客。还说唐先生自云:小时家境清寒,偶而买了一只蟹,全家分而食之,小孩只分到一只蟹脚;现在经济上好转,也应该节约,常念物力维艰。

五. 光线暗淡的书斋

厅堂西侧的房间是唐先生卧室,后面隔为书斋,窗外树高叶密,采光很差。大概他已失明,读书由义女陆汝挺口念,著作自己口授,让陆汝挺笔录。一天王先生打开书斋门窗通风透气,我年少好奇,潜入张望,看到书桌上狼藉一片,放着一尊唐先生的石膏胸像,西洋雕法,两只眼球如同白果,有点怕人。柏角上有张信笺,抬头书"润格"两字。事后我问祖父"润格"是什么意思?答:"这是为别人写字、绘画、治印、作文的价格,唐先生擅作古文辞,意境似归有光。外界常有人

请他作书序、行状、铭文,收的钱都捐给慈善组织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常发生天灾人祸,无锡人捐助财力物力和人力帮助灾民。去年三门峡市来人寻访慈善家后人,表示谢意。我的二姨夫过智修因救灾1930年死于洛阳,事过境迁没有证据。后在唐先生的《茹经堂文集》(图二)中找到《过智修赈灾死事碑铭》,得以证实始末详情,后裔随无锡代表团前去,获得三门峡荣誉市民称号。《碑铭》痛斥军阀混战,不顾人民死活,对过智修殉职深表同情,是为无锡红卍字会义务写的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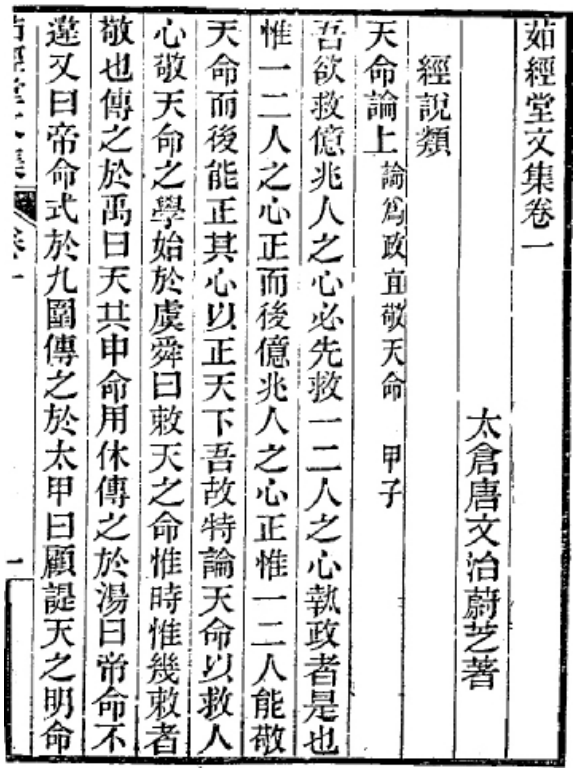
六. 日本武官占鹊巢

唐宅地广房多,只住王先生、我和两位表姐四家十余人,小洋房空着虚掩门窗。某日我看见一妇女推门而入,连忙告知王先生和众人赶去,只见那妇人坐在俞庆棠梳妆台前打扮,问她毫无答复,双眼直勾勾地,脸上抹了圆圆胭脂,原来是个花痴。只得扶出大门,嘱其回家。

没过数月,后西溪日晖巷口之大洋房挂出“大日本领事馆”招牌,一个翻译来通知王先生:“领事馆武官某某君看中唐宅小洋楼,限三天出清即来居住,以示中日友好,不得有误!”王先生知道回拗不得,即时去邮电局挂长途电话汇报唐先生,疾忙将家什搬出。

第四天来了对日本夫妻,三十多岁,均身材高大,面皮白净,穿着便衣,见了我等略为点头,好在分开了住,互不干涉,还算平安无事。到次年夏天的一个酷热日子,这个东洋人忽然驮了老婆到行素堂走一遭,东洋婆作羞涩状,我等见行动诡异,不免匿笑,东洋人察觉,勃然停步怒视,我等一惊避开。

沦陷区的无锡人,背后都叫日本人为“毛面畜牲”,既恨又怕,说不定会翻脸加害。我父母认为与虎为邻不如避为上策,遂迁至西门外。估计这个日本武官要到1945年战败后才回国。


茹經堂文集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天命論上 論爲政宜敬天命 甲子

吾欲救億兆人之心必先救一二人之心執政者是也惟一二人之心正而後億兆人之心正惟一二人能敬天命而後能正其心以正天下吾故特論天命以救人心敬天命之學始於虞舜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者敬也傳之於禹曰天其申命用休傳之於湯曰帝命不遹又曰帝命式於九圍傳之於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图二 《茹经堂文集》书影

解放前夕,唐先生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亲临寓所问候,对其道德文章很为推崇,让他继续担任教授直至去世。

唐宅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改造为迎溪居民小区。

唐先生在宝界桥堍的别墅茹经堂,建于1934年,由上海交大、无锡国专师生集资而建,以纪念唐先生七十寿辰。1937年汉奸密报我战区司令冯玉祥将军在里面开会,日本派飞机轰炸,炸死躲在琴山的看守人一家三口。1984年重修,陆定一题书门额,邓颖超题词。1986年公布为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

噫——宅破山居在,城春草木深。

(编辑:阎智海、徐驰)

孙武及其《兵法》诞生于无锡?

顾一群



图一　孙武像

《无锡史志·无锡梅园诞辰百年纪念专刊》刊载了穆鼎源先生《〈孙子兵法〉诞于无锡梅园小罗浮山》一文。文中称:“史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凭生武奔吴’。这五个字说明三点……。孙凭先在齐国,因国乱家破,无法生存,才携妻南逃吴国,并在吴国生下孙武。”穆先生还考证了孙凭携妻奔吴的时间,认定为公元前536年,地点为吴国罗浮山桃园。吴国罗浮山在哪里呢?穆先生认为在无锡“(今梅园东山)是不容置疑的”。

孙武的《孙子兵法》饮誉古今中外。东汉的军事家曹操曾云:“吾读兵法战策多矣,孙武深矣。”他对《孙子兵法》进行了研究注释,并运用于战争实践。唐代的大诗人杜牧对《孙子兵法》详加注释成书刊行,在《注孙子序》中云:“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一一相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郭化若将军评价:“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军事巨著,也是世界上流传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兵法宝典……其通篇博大精深、结构严谨、说理精微、逻辑严密。一直为中外古今名将所推崇,并成为世界范围内通用的兵法战策。”法国的拿破仑在读到《孙子兵法》译本时遗憾地说:“倘若我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美国前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说:“《孙子兵法》在美国军校中,是作为教科书来学习的。”日本学者阿多俊介在《孙子之新研究》一书中说:“孙子为富于天才之人,其书之在今日,无论任何人,莫不谓为万古不易之真理,又其头脑之甚有组织、思想之博大,读者不胜惊叹。”英国学者布劳称:“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中所载的许多原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运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不仅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应用于经济、管理、体育、人生等社会多方面的具体实践。

孙武(图一)被人们奉为“武圣”。对于这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名人,研究他的人生轨迹必须抱着极其严肃、认真、慎重的态度。

孙武真的如穆鼎源先生所云,出生于无锡的古小罗浮山今东山,并在东山撰成《孙子兵法》吗?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明确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的曾祖父原为陈国国君陈厉公子完,又名陈无宇。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陈无宇献莱之宗器于襄公”,入齐受封。(《左传·襄公六年》)到了齐景公八年(前540年),陈无宇已官至上大夫,曾护送齐女少姜到晋国为晋平公夫人。(《左传·昭公二年》)陈无宇的儿子陈书,字子占,于公元前523年率齐军伐

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将乐安封为他的食邑。(《左传·昭公十九年》) 学者厉立中根据《左传》、《吴越春秋》等史籍推算,孙武约生于齐景公十三年(前53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据学者杨善宇先生考证, 孙武奔吴时间为公元前517年前后。

从以上史籍记述来看, 孙武原为齐国乐安人,于18岁左右方始奔吴。

穆鼎源先生可能为了证实孙武诞生于吴国之今无锡东山, 在引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将“凭生武”之后的“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 文字及标点符号删去, 成了 “凭生武奔吴”。即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理解孙武在奔吴前已经出生了。

穆鼎源先生大作中还引用了《中国历史名人大破译》一书,并武断地称:“查春秋时期,齐国并无乐安之地名。”这更有悖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并且,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山东广饶县城北近30华里草桥村发现了古乐安城的遗址,证实了孙武为古乐安(今广饶)人。

孙武奔吴时初居何处呢? 明末长州 (今吴县)人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称“隐于罗浮山之东”。《嘉泰吴兴志》记载:“罗浮山在县(长兴)东二十五里。”并记载有:乌程县(今吴兴县南)伍林村有伍子胥宅,“昔子胥避难筑室于此, 旧基尚存”。学者厉立中考查,“孙武隐居地与伍子胥至吴暂住之宅甚近。所以后来伍员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穆鼎源先生大作中称:“古代, 太湖四周雾茫茫, 山隐现, 统称罗浮山, 罗浮山是各山泛称。”又云:“中国的江河湖泊多,罗浮山也多。”如广东省的罗浮山,长100余公里……无锡罗浮山只能称“小罗浮山”。文中也提到长兴罗浮山,但断言 “孙凭父子也不可能在此居住”, 只能“……隐居在无锡小罗浮山(今梅园东山)是不容置疑的”。文中并称:“但山(东山)仍留有古迹遗存,刻有‘小罗浮’三个斗大之字的巨石,重达七吨,至今立在山顶。”笔者查阅无锡历代县志和多部文献, 并未见到东山古称小罗浮山的记载。只知“小罗浮”之由来为荣德生先生构建梅园时,因广东罗浮山梅花名誉古今,而有“小罗浮”之命名,并用大块黄石镌刻立于山中梅林。不知这一石刻竟成“古迹遗存”,作了小罗浮山的佐证。荣德生先生如地下有知,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想。

孙武到了吴国后,协助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一起,南征北伐,将他的兵法运用于实践,先后克舒、灭徐,打败了楚国、齐国等强国,战胜了陈国、鲁和越国,使吴国称霸于诸侯。后在伍子胥被吴王夫差逼迫自尽后,退隐避居,修订兵法。约于公元前480年逝世,终年55岁。汉代袁康、吴平撰写的《越绝书》吴地传记有“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清同治《苏州府志·冢墓》也记有“长州县有孙武墓”。长州县今为吴县,吴县西太湖胥口香山里有教场山, 附近有教场里村。《香山小志》 记述:“教场山即吴宫教美人战处”,同时记有:“二如庙在小横山,二妃,即吴宫教战,孙武所杀之两美人也。”附近尚有二妃墓。

孙武大半生生活在吴国, 为吴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吴地人民永远怀念这位“武圣”,无锡、苏州都建有祭祀他的祠堂。对他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不一定非要认证他出生何地,在何处撰写《孙子兵法》。如果一定要将这位不是出生于无锡的名人说成无锡, 那只能如穆鼎源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指出的那样,“当下有些地方为发展旅游事业竞相与孙武攀边”。然而他接着又说:“但史实不容更改,孙武出生地毕竟在吴地,具体在今无锡市滨湖区。”(东山在无锡滨湖区境内)这样说岂不是自食其言?

(编辑: 何桦)

致力城市文博服务 打造奉献公益团队

——综述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两年发展概况

陈 蓉

引言：江阴博物馆自2014年起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起,启动“志愿者之家”建设工作,首批招募志愿者有20名，他们活跃在双休日博物馆的各大展厅进行公益讲解，参与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为观众了解文博知识,欣赏馆藏文物藏品提供着普及性的教育和服务，成为江阴博物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统计,两年来,58名志愿者在博物馆义务讲解600余批次,累计服务时间超过21040小时,受益观众万人。

一. 博物馆志愿者概念

志愿者服务作为一种自愿的、不计报酬和收入而参与社会生活，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的志愿者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在国际博物馆界也称为”博物馆之友”,泛指所有义务为博物馆服务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根据博物馆的岗位需要和志愿者个人的意愿或专长,自愿到博物馆提供讲解、引导、翻译、整理等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精神追求。博物馆志愿者行为的特点有自愿性，主要以实现自我和精神追求为价值;无偿性,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与其所服务的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物质利益关系,提供义务服务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物质报酬;积极性,对观众,对博物馆,对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博物馆吸收志愿者的目的主要在于缩短博物馆和参观者之间的距离，增强参观者的亲切感和参与感，强化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教育机构的职能，更好地依靠社会公众服务于社会公众,实现着博物馆教育职能上的意义。当前博物馆志愿者主要职能是承接各种团体，承担博物馆的讲解任务；另一方面是在博物馆咨询台做信息咨询员,负责接待参观的观众,同时解答观众的各种疑问；还有的协助博物馆科研人员进行一些与研究有关的工作，或从事其他博物馆业务方面的工作，这些志愿者一般是有特殊的才能或者某一方面的专长。

二. 博物馆志愿者发展现状

(一)国际社会博物馆志愿者发展

博物馆志愿者，是1907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首开先河的，但成为制度化而普遍为博物馆所采用,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国外,几乎博物馆的所有工作，只要具备相关的行业知识,经验、兴趣和热忱,志愿者都可从事。博物馆的志愿者在国外被称为“博物馆之友”,世界博物馆之友联盟(WFFM)就是他们的组织。如大英博物馆,正式馆员1000人,志愿者则多达500人。

(二)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推动和确立的关键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志愿者纳入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专业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在全社会有效开展,2012年9月,文化部在深入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央文明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广泛开展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第一次对加强基层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定期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工作人员和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在适当时机对各地成绩突出的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志愿者予以表扬和奖励。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志愿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志愿服务开始进入

规范化推进的新阶段。2012年12月16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业委员会在南宁召开年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委会章程》和《中国博物馆志愿者条例》,首次以规章的形式将博物馆志愿者管理纳入行业管理体系。

(三)中国博物馆志愿者发展意义及现状

当前,我国现有博物馆3000多座,而且每年还在以100多座的数量增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在博物馆参观、学习。尤其是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公众日益把博物馆作为日常文化休闲的主要场所之一,博物馆也成为了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之相对应的,由于诸多理念、体制等方面的不足,我国博物馆在具备大量文物、文化资源的同时面临着人才资源不足的困境,这无疑制约着博物馆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而博物馆志愿者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志愿者的出现,弥补了专业人力的不足,提升了服务品质,扩大了服务层面,把博物馆文化进行广泛的社会传播,从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博物馆事业中来。

我国博物馆的志愿者活动起步较晚,始于199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第一次招募活动,第一批博物馆志愿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白鸽志愿服务队"。此后,博物馆志愿者工作一直处于自由发展阶段。2009年5月,受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宁波博物馆联合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内知名博物馆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业委员会,专委会秘书处就设在宁波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71家博物馆会员单位组成,大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专委会致力于促进和传播博物馆志愿者理念,组建全国性的博物馆志愿者网络,搭建博物馆与志愿者之间的桥梁。几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越来越健全的形式下,中国博物馆志愿者工作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专委会也成为中国博物馆界较有影响力、最具特色、最具活力的专业博物馆志愿者组织。

三. 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成立定位、组织框架及特色

(一)志愿者之家成立定位

江阴博物馆创建于1988年,随着国家加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氛围和环境营造力度,尤其是2008年起,国家实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推行,需要进一步发挥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社会服务机构功能。江阴博物馆总面积为11200平方,展馆面积约6000平方,共设江阴古代史馆、自然标本馆、青铜器收藏馆、刘氏兄弟业绩馆等各类展厅13个,其中包括特展厅3个,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面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和百姓的需求,以及博物馆面广量大的文博知识传播的迫切性,江阴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凸显。我们认识到,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意义已经是全球的共识,社会和观众呼唤博物馆提供教育的平台,博物馆也需要更开放地面向社会,以更开放的心态推动博物馆知识教育服务观众,志愿者团队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途径。这条道路通向观众,更通向博物馆的未来。我们希望以志愿者作为载体,在大众与博物馆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提升博物馆的服务品质,扩大服务层面,使有限的资源与无尽的服务需求有效配合,匡正社会风气,发挥关怀社会以及服务民众的美德。借鉴同行经验,依托自身力量,通过公开招募、报名和培训上岗的方式,2014年5月,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应运而生了。

(二)"志愿者之家"组织管理框架

1. 管理原则

江阴博物馆志愿者当前承担的主要职能是周六、周日下午为观众提供公益讲解,讲解范围为江阴博物馆及其下属的刘氏故居国保单位和中医史陈列馆市保单位。对志愿者之家,原则上实行馆内陈列开放部门主抓落实,志愿者团队自治的管理方式。每年的招募、接受报名和相关

的培训由部门负责，日常上岗排班考核由团队负责。成立之初,就在20名志愿者中成立活动组和考勤调度组两个小组，每小组分别推选两名组长,负责协调志愿者活动和日常排班工作。今年起,又根据增加了青少年志愿者的实际情况,各增加了一名小学和中学生志愿者的家长参与到考勤组中,形成了家长热心参与的氛围。博物馆每年举行一次上岗暨表彰大会,2-3次部分成员座谈会,2-3次参观交流活动。博物馆要求志愿者之家依托成员力量和才干，实现管理自主性,定时、定岗、定责开展各类活动;建立成员间QQ、微信群,及时发布公告,分享服务动态和信息；倡导志愿者以多种方式记录精彩的服务瞬间和服务故事,留存服务的资料,通过博物馆网站、微信公众号、地方电视台和报纸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报道。

2. 招募、培训及上岗考核

每年春节前后和寒假期间，博物馆通过网站、微信、馆内宣传栏发布招募通知,接受报名,持续两个月,4月开展面试和培训工作,5月正式上岗。今年江阴博物馆再次启动第二批志愿者的招募活动，在2014年面向社会招募成人志愿者的基础上,又推出面向江阴实验小学、江阴市中和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少年志愿者”定向招募项目。有600余名在校学生报名参加了“青少年志愿者”的招募。江阴博物馆和校方进行层层筛选,100余人通过笔试后进入了严格的面试环节，选定41人成为准志愿者参加一系列课程的培训。对于考核范围,成人志愿者讲解员和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有所区别，考核方式为任意选择2个馆,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和第一批志愿者组成4个考核小组,抽查被考核者在展厅内陈列区域进行讲解，每个馆讲解时间不超过8分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仪容仪表、语言表达、讲解内容、自由发挥和培训出勤率。

3. 志愿者人员年度工作考评

江阴博物馆志愿者的服务内容为提供义务讲解服务,参观引导和介绍场馆,维护讲解中自己和听众的秩序、安全,支持博物馆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遵守江阴博物馆有关对外开放的一切制度和相关规定。我们制定了详细考核细则,志愿服务时间由志愿者本人与志愿者考勤调度组协商确定,一般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志愿者无法按商定时间到岗服务应事先向考勤调度组请假,以便协调安排,事后尽快补足相应服务时间。志愿者参加本馆社会教育志愿服务活动时间由志愿者本人与志愿者活动协调组协商确定,一般每年不少于2次。如有变更,需及时上报活动协调组。需参加本馆组织的志愿者培训活动，参加次数不得少于全年培训次数的2/3,如不能参加,向考勤调度组请假。志愿者上岗前在志愿者工作手册上盖章。离岗时要由工作人员确认并在志愿服务登记表上签字,以作为日后衡量工作的依据。完成公共服务问卷调查,每次讲解服务收回问卷不少于5份。

考评方法方面，以确保服务质量和维护团体良好形象为宗旨,以公开、公正为准则,以年工作量为主要依据,每年进行考评一次。考评合格且愿意继续从事志愿工作者，单位加盖注册登记后,可直接延续一年。考评小组由陈列开放部、志愿者组长组成。考评依据以全年的日常工作实绩为依据。其中:志愿者讲解出勤记录占总分值40%，志愿者社教活动出勤记录占总分值20%,志愿者培训出勤记录占总分值20%,志愿者观众评议表占总分值20%。考评程序方面根据日常工作实绩进行评分，其中当年工作量必须满12次或24小时以上。如特殊情况,则由考评小组讨论后对其做出评定。根据考评结果得出优秀志愿者名单及续任江阴博物馆志愿者的名单,确定第二年工作小组的人员安排,并向全体志愿者汇报考评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工作的要求。

4. 志愿者奖励

我们拟定了对志愿者的奖励机制。一是对本馆举办的讲座及其他活动有优先参与权;二是可参加本馆组织的有关文博单位的参观交流

活动;三是免费获赠《江阴文博》期刊;四是定期参加本馆组织的学习培训和交流等文化活动。另外年终考核为优秀志愿者及合格志愿者的人员均可在一年一度的表彰会上获得相应奖励。

(三)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发展特色

1. 人员的组成

江阴博物馆志愿者工作正呈现出良好态势,逐渐形成以社会志愿者和小学高年级、初一学生及大学生为主体的局面,成人志愿者结构为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和社区工作者。目前志愿者中年纪最大的是60多岁,最小的11岁,五年级学生。

2. 组织专业培训

志愿者经过面试后还要参加博物馆组织的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上岗。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基本为三天二十个课时。2014年专门邀请苏州博物馆人员进行了《博物馆志愿服务理念与实践》培训,开展了江阴地方史讲座培训,讲解稿及讲解礼仪培训。2015年,江阴博物馆专门制作了《培训考核手册》,融讲解稿、培训计划、培训事项说明、考评制度等于一体,并开设博物馆基础知识、江阴考古发掘概述、地方文化史及江阴博物馆馆史、展厅讲解知识点指导和现场实践以及博物馆安全防范等一系列课程。

3. 和"世界博物馆日"结合

结合201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江阴博物馆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志愿者之家"成立仪式,向志愿者之家授牌,20名志愿者讲解员正式上岗,会议现场发放了志愿者手册和徽章。当天还与江阴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举办"博物馆日,文化助残公益行动"活动。2015年5月17日,世界博物馆日前夕,举行了2014年度志愿者表彰暨2015年志愿者上岗仪式,对2014年5名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彰,向2015年新招募的38名志愿者颁发了上岗证。活动现场,播放了志愿者精心制作的2014年度志愿者工作回顾PPT,新老志愿者代表上台发言,还有志愿者原创诗歌的朗诵,充分展示了博物馆志愿者的风采。两名考核优秀的志愿者分别走进标本馆和江阴地方史馆,进行了讲解展示。

4. 交流学习活动拓展

志愿者日常的培训交流都是学习和增加团队凝聚力的机会,我们努力为志愿者创造条件。曾任江苏考古队队长长达25年之久的陆建芳,应邀来江阴博物馆,给志愿者们讲述他作为带队考古发掘江阴部分祁头山墓群、石庄的高城墩墓群、青阳悟空寺等考古经历。专门组织志愿者们赴中国博物馆届志愿者工作的领头者——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志愿者一起参与了"博物馆讲解态势语训练培训及志愿服务中的问题及冲突处理"课程学习,并参观苏州博物馆,进行志愿者工作交流。适值常州博物馆《圆明园兽首回归——保利国宝展》等三大展览同时展出,特别组织了志愿者前往常州博物馆参观学习。另外还组织博物馆志愿者们参观沈鹏艺术馆、顾山红豆、长泾老街、袜子博物馆等地方历史遗迹、文保单位和民间博物馆等。

5. 参与重要讲解接待服务

志愿者还经常参与重要讲解。曾接待台湾高雄国乐团、央视《百年巨匠——刘天华》摄制组参观团队;接待中宣部原副部长龚如瀚、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庚辰等一行;接待纪念民族音乐家刘天华诞辰120周年音乐会的澳门中乐团、台湾中华国乐团和香港竹韵小集中乐团一行70多人。今年9月1日开展的《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江阴抗战特展》中,志愿者勇挑重担,已有50人次志愿者不仅在周末上岗时间,还利用平日闲暇时间,分别接待来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区和学校参观者近30个团队近800人,树立了志愿者的公益服务形象。

6. 志愿者之家年刊

2014年底,我们创办了一本反映志愿者工作风貌,记录志愿者之家大事,互通志愿者成员

信息的刊物《博物馆志愿者之家年度掠影集》，受到了志愿者和观众好评。并设想每年一期，充分调动志愿者积极性，由志愿者负责组稿、写稿和提供部分资料，博物馆编辑策划印制，让广大志愿者依托这本期刊找到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也让观众对本馆志愿者工作有了更多了解。

四. 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志愿者服务的认识高度有待提高

我们要在正确看待博物馆志愿者上有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志愿者的定位。志愿者是什么？是博物馆工作者、管理者？是观众？也许不能仅仅从“博物馆-志愿者”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从公共社会运行的角度来审示博物馆志愿者的意义。博物馆志愿者首先是公民社会成熟度的标尺，其次则是志愿者的象征意义，即不在于现阶段志愿者对博物馆有质变意义的贡献，而在于博物馆志愿服务是社会参与公共机构运行和管理的一种象征，第三才是志愿者对博物馆的具体贡献，第四则是志愿者在博物馆志愿服务客观上超越博物馆机构而对社会造成是正面影响——这很可能是民主与自由的摇篮。这些理念的宣传和深化，是我们当前还做得不够的。如果只是将建设“志愿者之家”作为博物馆专职讲解人员不足，公益服务不够的一个补充，显然会有利用和帮忙之嫌，无法走得更远。让志愿者的行为真正成为自发自觉并愿意持久的行动，并感召社会志愿精神的发扬，推动正能量的弘扬，才能真正显示博物馆志愿者建设工作的深远理念。

(二)制度和组织架构有待完善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秘书长安来顺说，“博物馆首先要认识到，当今的博物馆志愿工作已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现代博物馆社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博物馆要对志愿者工作进行科学引导和有效管理，完善包括志愿者招聘程序、组织化管理、培训标准和评估要素等系统化设计。还要注意博物馆和志愿者之间双向良性互动问题。博物馆对志愿者的各种制度设计必须始终坚持与志愿者的意愿、地位、权利和自主管理相向而行。为此，博物馆特别要重视对志愿者法律意义上的保障，使他们既义务地为博物馆服务，又享有充分的权利。同时，博物馆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组成复杂，组织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能否正常有序的进行、能否落实到实处，与管理密切相关。目前我馆志愿者工作由社教部门个别人员负责落实，未上升到全馆人员一致重视、协力关心的层面，管理主导人员和机制不健全。实施的过程中，又面临人员不稳定和个别不到岗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处理机制，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因人为因素、责任分工因素产生考评监督不到位、责任缺失等问题，这使得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管理上的规章制度，但离科学有效性和持久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在通往实现志愿者自觉、自强、自律和自治局面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新情况。

(三)服务内容的单一

当前志愿服务内容日趋多元化，志愿服务不仅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讲解、咨询，而是逐渐进入组织策划、开设讲座、图书管理、资料翻译、陈列设计、课题研究等专业领域。我馆“志愿者之家”的服务内容比较单一，两年来主要限于讲解服务职能和青少年暑期夏令营支持职能上，如何进一步拓展志愿者服务功能，取决于我们招募条件的细分、志愿者本身的专业本领和本馆所有成员对志愿者的统一认知和信任，还有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有识之士真正理解博物馆志愿者的广泛含义，从而热情参与和支持。

结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退休了，我会做一名博物馆志愿者。”“来过江阴博物馆很多次，但是还真是从来没有听过如此详细的讲解，让我真正认识了江阴博物馆。”这是普通观众的留言。两年来，江阴博物馆志愿者之家已

然成为博物馆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志愿者们通过博物馆舞台,锻炼成长了自己,他们是公共服务窗口的使者,是一个城市博物馆理念、博物馆知识、博物馆文化的社会传播者,是助力社会文明和谐的践行者。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委会主任，宁波博物馆副馆长纪云飞提出了志愿者工作“五化“的发展思路,即发展方式科学化、志愿者构成普及化、博物馆志愿者组织多元化、志愿者管理平台数字化、志愿者交流国际化。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期待有一天,在江阴,到博物馆参与志愿服务会成为一种时尚和骄傲!

(作者系江阴博物馆馆长)

(编辑：何桦)

江阴“霞印天下——徐霞客主题书画展”巡展昆明市博物馆

2015年10月22日,由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云南徐霞客研究会和江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霞印天下——徐霞客主题书画展”走进中国春城，在云南昆明市博物馆开幕，这是继2013年9月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首展后的第二次巡展活动。江阴市人民政府希望通过“霞印天下”巡展的方式,加大文化名人资源推广,扩大文化名人品牌知名度,提升江阴文化影响力,加强江阴和徐霞客游历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会长王宝才、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朱惠荣、江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龚振东受邀参加开幕式并发言，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副局长李安民、江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蒋青等领导,以及近百位市民参加了开幕式。

徐霞客是从江阴走出去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和游记文学家，他用一生的行走和卓绝的探索书写了“勇于实践,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东方传奇,是我国国土考察之先驱,为世界乃至中国地理学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誉为“旷世游圣”,是江阴人的骄傲。云南是徐霞客重要的出游地,1638-1640年,徐霞客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和腾冲一带进行了考察，完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段壮游。他追踪考察澜沧江,追根寻源,并在云南大理考察鸡足山后，编纂完成了一生编修的唯一志书《鸡足山志》,还和丽江知府木增结下生死友谊,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在徐霞客出行的终点——云南举行“霞印天下”主题书画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此次昆明站巡展以李岚清副总理亲笔题写的“霞印天下”为活动主题,分别展示了由江阴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法大家书写《徐霞客游记》碑廊作品和名人题贺书法作品、取霞客游历之境摹形绘景中国画作品62幅,其中不乏启功、沈鹏、黄胄、肖平、张海、管峻、孙晓云等名流大家和青年才俊之作，以艺术手法展现和发扬光大徐霞客精神,推广普及《徐霞客游记》经典壮阔之作，具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社会价值。展览还布以徐霞客在云南游历考察展版,江阴的发展现状图版,这是一次以文化为媒,诠释了霞客故里——江阴与云南人民的友谊,促进民族团结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活动。

(消息来源:江阴博物馆网站)

让城市中的名人故居“复活”

——浅谈无锡市薛福成故居的保护、利用与发展

顾　璟

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浓缩展示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面貌,承载了一个城市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而这些名人往往都是各个时期的社会精英，其思想和作为对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名人故居作为有形的建筑将无形的文化和历史保留了下来,成为穿越时空的历史名片。

薛福成故居作为目前无锡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要向世人展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独特的江南园林景致，我们就必须对它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让故居从一栋冷冰冰的固态建筑变成充满生机的城市组成部分，充分挖掘其文化和旅游价值，使其在保护利用中“复活”。

一. 复活名人故居的历史面貌

名人故居是前人留下的巨大财富，而这种精神财富是不可再生和不可复制的，一旦遭到破坏,即使能重建出一座一模一样的建筑,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完全变味了。因此我们应该在不改变其原有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修旧如旧,环境如初,以免遭到保护性破坏,复活名人故居的历史原貌。

1. “保护性”修复

薛福成故居的保护修复是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相关原则要求进行实施的。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坚持以不改变原建筑主体结构为基准，主体建筑群基本保留原有框架结构,对后期改造加建的墙面、私搭乱建等进行拆除。故居内部庭院绿化、园径、山石、水池与外部景观和周围环境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修复和保留故居历史原貌。

2. 文物安全管理

修复只是文物保护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文物保护部门工作者在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应进行经常性的检修和防护。文物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做好文物安全管理工作必须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近年来,文物安全事故频发,文物损毁、丢失情况令人担忧。薛福成故居秉承“保护为主,安全第一”的理念,建立了一支日常安全管理巡查队伍,开展每日安全检查,排查日常工作中存在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加强对花园池塘、白蚁防治、电气线路等三方面的隐患进行专项排查,并通过登记建档、定期排查、及时整改等手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故居主体历史建筑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二. 复活名人故居的生命力

名人故居虽然是固态的建筑，但却不应该是没有生命力的、封闭的,保护是为了利用。因此,我们除了保护它,还要让其在现代城市中恢复生机,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旅游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热点,名人故居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修复后的名人故居只有与文化旅游联系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教育功能。薛福成故居以“文化旅游”为理念，使其宣传功能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自身的文物价值与社会价值。一方面,故居每年通过积极参加旅游交流会,融入周边华东旅游市场,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其规模宏大的建筑体量,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景致秀美的私家花园和传奇的人物故事吸引了众多游客。近年来已与旅行社合作开发了多个海外旅游市场;另一方面,故居利用周边的商业圈将故居景点与休闲、美食、购物串联起来,规划区域观光路线,推出特色旅游品牌。

旅游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比如游客往往惊叹于故居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但也反映内部陈设和展览陈旧单一。虽然我们在馆内设置了建筑修复展、生平事迹展、工商实业展三个展览，但是由于故居现存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大量缺失，展出形式相对单一，布展设计制作相对落后，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观赏者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现代旅游越来越提倡体验式互动，游客在面对千篇一律的“玻璃橱窗+展品”、“图片+文字解说”时已不能产生更深层次的精神共鸣。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方向应是让张贴在墙上的图片和文字“活”起来，赋予其生命力。当然，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像一些大型博物馆引用高科技的3D体感互动技术，但是我们可以联合当地的文化社团组织编排一系列反映薛福成生平事迹和爱国精神的情景剧，定期在故居内上演，让这位一百多年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以更生动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也让更多的游客及未成年人体验故居人文历史之美。让名人故居不再是一栋承载历史的建筑，而是一段历史、一位名人传记的真实诉说者。

三. 复活名人故居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名人故居的核心。名人故居记录了主人在创造辉煌和永恒中荡气回肠的一生，也凝结了主人思想和道德上的精髓。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城市先贤的后辈有责任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传承发扬下去。

薛福成故居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理应以提供优质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为重，发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历经几年的努力，目前故居主要策划组织了传统文化节庆、非遗保护传承、未成年人八礼四仪经典国学教育为主题的三大公共文化品牌活动，并以故居为阵地，向市民及全社会普及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节庆活动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又造就了传统节日的地域性差别，薛福成故居立足无锡地方民俗，利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分别在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假日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向广大游客展示了古代祭祀礼仪和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让人们参与到节庆活动中，亲身感受传统节日的氛围，体验民风民俗之美，激发观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传承发扬下去。

2. 非遗保护传承活动

薛福成故居作为文化传播阵地，在故居内部设立了无锡锡绣、无锡留青竹刻和无锡惠山泥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故居锡绣工作室先后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市芦庄二小共建锡绣传承基地，开展锡绣进校园活动，让锡绣这颗沧海遗珠再次在年轻人中焕发光彩，推广锡绣文化和技艺。此外，锡绣工作室还定期举办女红研习会，开展锡绣、绘画、书法等艺术交流活动。锡绣传承人参与的各项社会宣传活动已被各大媒体、报社报道，打响了无锡锡绣的知名度。

3. 未成年人八礼四仪经典国学教育

八礼四仪是为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文明礼仪养成教育。薛福成故居作为我市重要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国学为根本，以推行八礼四仪教育为使命，在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八礼四仪文明礼仪道德巡讲，以此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强化文明礼仪素养。故居内还创办了“钦使第·淑女学堂”，通过诵读《女论语》、《弟子规》等书籍，辅之以仪态、茶道、书法、锡绣等课程，让学生接触经典国学，了解先贤事迹，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目前，“钦使第·淑女学堂”已开设第三期课程，其新颖的课程内容和良好的教育成果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在践行八礼四仪教育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名人故居保存了历史记忆，(下转第 72 页)

问渠哪得清如许

——关于宜兴市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思考与实践

郝殿峰



图一　培训现场

2015年7月27-31日，有幸参加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为期5天的“2015年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暨版权授权”培训班(图一),受益匪浅。这次培训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江苏省文物局共同承办，无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及相关博物馆或文博单位主管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100余名学员参加。可以说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培训，更是一次文博从业人员的盛会。此次培训班从三个方面全面系统的讲述了何为文化遗产创意产业，如何做好文化遗产创意产业以及产业典型案例现身说法和今后的出路，并提供了文化版权授权的专业指导和方向。这对于我们这个初生的博物馆来说，无异于注入了源头活水，使我们感受到了新思潮、新理念的激荡,尤其是对我所负责的展览宣教部的工作带来了启迪,获益良多。

一. 准确定位——宜博分析

宜兴是一个有着7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宜兴市博物馆的硬件设施定位是国内领先，省内一流,这就对我们的软件即展陈、服务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明年5月开馆后,作为宜兴首个综合性的历史博物馆，毫无疑问三个基本陈列和几个专题馆必然会相当出彩，之后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长期的运营和管理。其中,如何深入研究宜兴地方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丰富的馆藏；如何承担起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做活博物馆,积极地走出去、引进来;如何揭开博物馆神秘的面纱，摆脱传统的高冷形象，让文化变得生动活泼、让文化深入人心、让公众文化的形式变得多样、服务也变得更吸引人,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只是县级市的小博物馆,如何走出去,如何引进来,好像没有特别的优势。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首都博物馆,还是我们宜兴市博物馆,大家都是博物馆,相同的都是承担着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不同的是各自的文化特性。作为宜兴市博物馆来说,我们有着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有着无法复制的名人现象，所以我们完全具备与其他博物馆交流的资格。所以,如何策划具有宜兴地方特色的展览,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认识宜兴、了解宜兴、喜爱宜兴,十分必要。

二. 活力之魂——智慧展览

有人说博物馆应该是以保管藏品为主要任务,对文物的专业保护和学术专业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让历史和文物得到更好传播、传承。因此，展示宣传和社会服务是博物馆的长期中心工作,更是一项根本任务,展览宣教工作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翻译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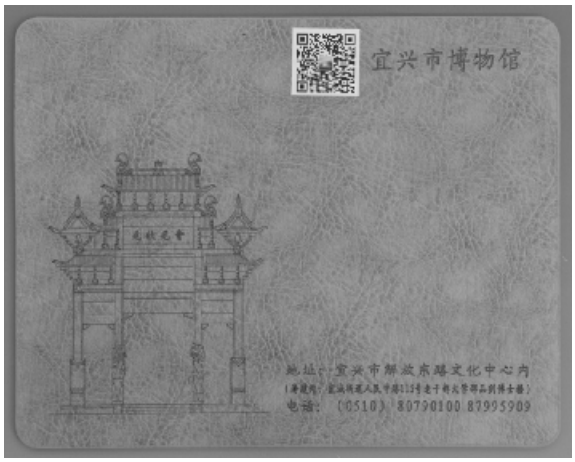
我认为，一个完整优秀的展览应该紧贴时代,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让大家喜闻乐见的同时又感受到相当的意义和价值。现场展览无疑十分重要，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大众

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将博物馆带回家的意愿也相当强烈，如何做好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文创产品，将成为一个成功展览的“点睛”之笔。

三. 魅力之翼——文创开发

本次培训让我对文创产品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我只是认为它只是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必备功能，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品而存在，模糊地认为实用性是文创产品很大的特性。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我馆藏品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我认为，我们的文创产品应该是多种档次、特色鲜明的：既有适合高端客户的学术类专著、高档的收藏品，也有适合官方交流的特色产品，还有适合大众的普通消费品。在此基础上，可以借助包括影视创作、微电影、地方剧目等媒介，借助声、光、电等各种科技手段，使博物馆丰富的藏品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不限形式、不限时间、不限地点展现在市民面前。这些产品的背后唯一不变的就是有着专属“宜兴市博物馆”的文化烙印，这个烙印代表品质、代表层次、代表信任。经过这次交流沟通，我认识到文创产品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风潮，一股力量，在这股风潮下，已经有了系统的运作方案，包括品牌授权、创意开发、市场营销、科技力量等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领域。

目前，根据我们工作的进度和节奏安排，宜兴市博物馆已经有了三款文创产品。处于文物征集阶段时，2015年2月开发的第一款 “相国牌坊牛皮鼠标垫”(图二)，是藉由家喻户晓的相国牌坊进入藏家、大众的视野，由此配合我们的藏品征集以及打开知名度的工作。2015年6月开发的第二款“一指禅”弹力手机支架(图三)，是针对时下手机用户所制作的，藉此吸引他们对博物馆微信平台乃至博物馆其他工作进行长效关注，并吸纳来自方方面面的建议，形成良性互动。2015年9月，开发了第三款“爱的便利贴”(图四)，这是以我们宜兴市博物馆主体建筑为背景而专门制作的，借助我们的“纪念抗战胜利宜兴



图二　相国牌坊牛皮鼠标垫



图三　“一指禅”弹力手机支架



图四　爱的便利贴

文物、图片展”进行宣传推广，我们特地设计赋予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即“爱的便利贴”，一下子

简单、常见的便利贴便有了生命和感情。这三款小文创都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它们配合着博物馆的工作，将博物馆的形象具体生动地在大众面前展现出来。

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相比，我们的文创产品还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其潜藏的文化、经济、教育等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激发。在宜兴市博物馆即将盛大开馆之际，我认为，应当做足做精文创产品这最后一个展厅的“文章”，进一步设计开发出不同类型档次的文创产品，将宜兴传统的文化元素植入时尚新潮的当代工艺品中，让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时尚完美地结合，同时通过这些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宜兴，感受宜兴文化的魅力，相信不但可以让大众将博物馆带回家，更可以让我们最后一个展厅创造更多效益。

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必须提倡以人为本，更好地发挥面向现代社会的现代传播教育功能，在为“物”服务的同时，更要向为“人”服务多思考、多转变。我相信，做好文化研究、文创产品的开发工作，通过“创意”产品的文化传递，一定会将博物馆历史文化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宜兴市博物馆）

（编辑：何桦）

《锋芒都尽墨无声——安徽博物院藏砚台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

2015年12月1日，由无锡博物院和安徽博物院主办，歙县博物馆协办的“从远古走来”系列之《锋芒都尽墨无声——安徽博物院藏砚台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西区二层展厅隆重展出，展期至2016年3月1日。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颇多，故有“文房四宝”之誉。砚产生于古代人们绘图、书写的需要，唐宋以后，文人好砚，到了明清时期，砚台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成为集书法、雕刻、诗文于一体的艺术品。

历代文人“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砚台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书写工具，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古人与砚台日日相伴，将砚台或置于案头、或随身携带，书写、抑或收藏、摩挲、品玩，因此历代砚台无论是造型、雕刻、还是铭文都处处流露出儒雅卓绝的文人气息。

安徽是歙砚之乡，安徽博物院藏砚数量丰富、种类齐全、品质精良。此次展览遴选出安徽博物院藏砚台精品53件，歙县博物馆藏砚台精品6件。不仅有歙砚，还有端砚和澄泥砚等品种，其中有西汉三足兽纹石砚、唐代的箕形歙砚、宋代的抄手歙砚、元代的蝉形歙砚、明代的长方形抄手眉纹歙砚以及清代的乾隆御铭渠阁瓦形歙砚等各个时代的砚台精品，另外，还有明代徐渭铭抄手端砚、清代汪羊铭抄手澄泥砚和左忠毅公端砚等文人砚。一方方古砚，犹如一个个穿越时空的精灵，向我们娓娓述说着它们的历史。

（消息来源：无锡博物院网站）

停云馆帖考（十九）

周道振

帖石流传表

帖名及卷次	石刻编次	石藏桐乡冯氏	石藏无锡窦、赵两氏	石藏嘉兴郭氏	石藏秀水孙氏	现今情况
晋唐小字卷第一	法帖甲之一，共八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改成“法帖卷第一”“晋唐小字”	原刻存窦氏，重摹散失
王羲之黄庭经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存窦氏，重摹散失
王羲之黄庭经不全本	法帖甲之二，共四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倪瓚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羲之乐毅论	法帖甲之三，共八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羲之乐毅论海字本	法帖甲之四，共四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令嘉兴博物馆存首十六行一石
王羲之东方朔画像赞	法帖甲之五，共四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法帖甲之六，共五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杨汉公、怀素、韩愈等题跋	跋于第二行起，原重摹	原刻		跋存二行	跋存二行	散失
王羲之临钟繇墓田丙舍帖	法帖甲之七，共五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羲之临钟繇尚书宣示表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法帖甲之八，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柳公权、柳璨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陶弘景华阳隐居真迹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虞世南破邪论序	法帖甲之九，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欧阳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法帖甲之十，共五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存窦氏，重摹散失
欧阳询佛说尊胜陀罗尼咒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存窦氏，重摹散失
褚遂良皇帝阴符经草书	法帖甲之十一，共五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存窦氏，重摹散失

褚遂良阴符经小楷	法帖甲之十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褚遂良度人经,范正思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	法帖甲之十三,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柳公权护命经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共十三石	冯得原刻九石,重摹四石	无锡窦氏得原刻四石	未见郭氏藏石,拓本不详	孙氏得原刻七石，冯重摹三石	

唐樵晋帖卷第二	法帖乙之一，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改为“法帖卷第二”“唐樵晋帖”	散失
王羲之姨母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羲之初月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荟疖肿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徽之新月帖,至第三行止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四行“似食”起	法帖乙之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乐二	散失
王献之体中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慈柏酒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慈比可帖,至第三行止	因破，此石文氏重摹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四行“陈赐”起	法帖乙之三，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乐三	散失
王慈尊体安和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志雨气帖,至第三行止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四行“患顺”起	法帖乙之四，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乐四	散失
岳珂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张雨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沈周致文徵明手札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鏊跋 文徵明跋	法帖乙之五，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乐五	散失
唐李怀琳仿嵇叔夜绝交书，至14行“或谓”止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15行“无之”起至44行“不涉”止	法帖乙之六，共六页。断裂，钱重摹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45 行“经学”起至 74 行“吏卒”止	法帖乙之七，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75 行“守之”起至 104 行“道士”止	法帖乙之八，共六页	重摹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105 行“遗言”起至 134 行“沟壑”止	法帖乙之九，共六页	原刻，已破裂。	重摹(钱氏补)			原刻在冯氏，后不知下落。重摹石在无锡东林书院
自 135 行“吾女”起至天监三年题字止	法帖乙之十，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汤垕跋	法帖乙之十一，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文徵明跋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嘉靖十七年春三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原石				冯氏后不知下落
	共十一石	冯得原刻十石，重摹一石	无锡东林书院得重摹一石(钱氏补)			

唐人真迹卷第三	法帖丙之一，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改为“停云馆石刻”		原刻存窦氏，冯氏重摹散失
唐孙过庭书谱，至 27 行“谢安”止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原刻存窦氏，冯氏重摹散失
第 28 行“尺棱”起至 57 行“前规”止	法帖丙之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存首 16 行及末 8 行		嘉兴博物馆存前十行不全残石
第 58 行“之能”起至 87 行“深遂”止	法帖丙之三，共六页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 88 行“今学”起至 117 行“达其”止	法帖丙之四，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 118 行“情性”起至 147 行“自标”止	法帖丙之五，共六页，原刻明末拓已断	冯重摹	此页非原刻，疑是钱氏重摹窦氏	重摹。存首五行		钱氏重摹存窦氏，郭氏重摹散失
第 148 行“先后”起至 177 行“诞若”止	法帖丙之六，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原刻存窦氏，郭氏重摹散失
第 178 行“指汉”起至 207 行“赞则”止	法帖丙之七，共六页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自“指汉”起，至“称习良”存止十九行
第 208 行“意涉”起至 237 行“可勉”止	法帖丙之八，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 238 行“之不”起至 267 行“搪突”止	法帖丙之九，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已裂为二

第268行“羲献”起至297行“於蹇”止	法帖丙之十，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298行“钝轻”起至327行“中巧”止	法帖丙之十一,共六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藏嘉兴博物馆
第328行“丽曾”起至358行“日书”止	法帖丙之十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359行“庶使”起至末	法帖丙之十三,共六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政和、宣和等内府图书印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共十三石	冯氏得原刻六石,重摹七石	无锡窦氏得原四石，原重摹一石，共原石五石			

唐人真迹卷第四	法帖丁之一	原刻		原刻	此行磨去，乐六	
颜鲁公祭姪文,至21行“卜尔”止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22行“幽宅”起至末	法帖丁之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乐七	藏嘉兴博物馆
陈深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已模糊
陈绎曾跋		原则		原则	原则	藏嘉兴博物馆已模糊
文徵明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已模糊
颜鲁公朱巨川告，至第三行		原刻		前三行赵氏重摹,并补“唐颜鲁公书”隶字		磨去
第四行“职用”起至小字“范阳郡开国公翰”止	法帖丁之三，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初存赵氏，后毁于清咸丰十年兵燹中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小字“吏部侍郎阙”起	法帖丁之四，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邓文原跋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乔篑成跋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林纬乾深慰帖	法帖丁之五，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王羲之平安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唐释怀素草书千字文,至28行“乐殊”止	法帖丁之六，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29 行“贵贱”起至 58 行“植省”止	法帖丁之七，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59 行“躬识”起至宣和、政和等印止	法帖丁之八，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赵氏不知下落，冯氏重摹后不知下落
文嘉跋	法帖丁之九，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五代杨少师神仙起居法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宋高宗释文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商挺跋	法帖丁之十，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留梦炎跋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文徵明跋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嘉靖二十年夏六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路
	共十石	冯氏得原刻八石，重摹二石	无锡赵氏存原刻一石，重摹三行一石			

宋名人书卷第五	法帖戊之一，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改为“法帖卷第三”	散失
李西台许昌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杜祁公昨日帖致留守龙图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推许帖	法帖戊之二，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黄裳跋		原刻				冯后不知下落
陈旸跋，至第五行止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六行“旸笔”起	法帖戊之三，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魏了翁跋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欧阳文忠清论帖致谏院舍人		冯重摹	原刻赵氏	重摹	重摹，射三	原刻不知下落，重摹石散失
文潞公亲人所求帖	法帖戊之四，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射四	散失
王荆公营卫帖致著作明府		原刻		原刻	原刻，首缺前三行	散失
王荆公枉顾帖致颖叔，至第三行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四行“许过”起	法帖戊之五，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蔡忠惠澄心堂纸帖		原刻		原刻	原刻,射五	藏嘉兴博物馆
又脚气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
苏文忠渡海帖,至第三行“到桂”止		原刻		原刻	原刻	藏嘉兴博物馆
第四行“府若”起	法帖戊之六,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久不奉状帖	第六行末起缺下角,另补末十二行	原刻		原刻至五行止,后缺	原刻至五行止,后缺	散失
苏文定贵眷帖	法帖戊之七,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黄文节读书绿阴帖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又沈叡达帖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魏泰道辅观		冯重摹	原刻窦氏			原刻存窦氏,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米南宫德忱帖	法帖戊之八,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御二	藏嘉兴博物馆,自第五行“蹄涔”至“葛君德忱阁下”止,存十六行
又家计帖一行止		原刻	赵氏重摹一行及隶书“宋米南宫书”	原刻	磨去	原刻磨去,重摹不知下落
第二行“经理”起	法帖戊之九,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又元日帖		冯重摹	原刻赵氏,存五行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又吾友帖四行止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五行“稍用”起	法帖戊之十,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草书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中秋诗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目穷帖二行止		原刻	重摹。自“目穷”起一行。前一行“三四次”未重摹。与《家计帖》一行合一石。			原刻在冯氏,后不知下落,重摹不知下落

第三行“道虹”起	法帖戊之十一,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又奉议帖		冯重摹	原刻赵氏	重摹	重摹,御三	原刻不知下落,重摹藏嘉兴博物馆
又海岱楼帖		冯重摹	原刻赵氏	重摹	重摹	原刻不知下落,重摹藏嘉兴博物馆
米友仁跋		冯重摹	原刻赵氏	重摹	重摹	原刻不知下落,重摹已被磨去
	共十一石	冯氏得原刻七石,重摹四石	无锡窦氏得一石。赵氏得三石，皆原刻。(赵氏重摹二行)			

宋名人书卷第六	法帖己之一，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磨去,改“法帖卷第四”	
苏才翁时相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李中孟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苏沧浪心疾帖致子玉长官,至八行止	存首二行。余六行补一石，又中断	二行原刻 冯再补六行		原刻	原刻存二行，补石缺	散失
第九行“者少”起	法帖己之二，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司马温公痰呕帖与太师		原刻		原刻	原刻,射七	散失
冯当世守边帖致修撰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范文正道服赞	法帖己之三，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射二	散失
文与可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范忠宣奉别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钱穆父病中帖致完夫国信学士	法帖己之四，共四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御七	散失
贺方回古风帖致汉逸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林和靖秋凉帖致瑶兄座主	法帖己之五，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射八	散失
又三君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秦淮海获款帖致方叔贤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蒙教帖致元礼宣德,至三行止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四行“见倾”起	法帖己之六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毛泽民春行帖致知府学士		原刻		原刻	原刻,御五	散失

释参寥伏承宠召帖与宁师乡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李端叔风毛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陈简斋诗翰	法帖己之七，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薛道祖兰亭叙	法帖己之八，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危素跋	法帖己之九，共六页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李元中莲社图记至26行“也一”止		冯重摹	原刻赵氏	重摹	重摹，射十	原刻不知下落，重摹散失
第27行“人手”起	法帖己之十，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射十一	散失
嘉靖三十七年秋七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共十石	冯氏得原刻九石，重摹一石，又再补六行	无锡赵氏存原刻一石			

宋名人书卷第七	法帖庚之一，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孙氏磨去，御六	散失
米敷文杜门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陆放翁秋雨帖与明远老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叶少蕴晚刻帖与季高贤友	法帖庚之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御四	散失
王定国老病帖与安国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海错帖与运使吏部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范文穆外姑生朝帖	法帖庚之三，共六页	原刻（钱氏重摹）				冯氏后不知下落
姜白石兰亭考		钱氏重摹至七行，原刻第八行起断为二石				冯氏后不知下落
朱文公德门庆聚帖	法帖庚之四，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张南轩先正大家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虞雍公病久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韩子苍浮江帖与叔兴礼部	法帖庚之五，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御八	散失
张于湖泾川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张樗寮祚薄帖	法帖庚之六，共六页	原刻，末二行冯重摹	重摹末二行于后石之前，赵氏得钱补本末二行			原刻在冯氏后不知下落。重摹末二行不知下落

文信国小青口诗，至五行“十里”止		冯重摹	重摹，赵氏得钱补本	重摹	重摹御九	冯重摹散失，无锡重摹不知下落
第六行“错做”起	法帖庚之七，共四页	冯重摹	重摹，赵氏得钱补本	重摹	重摹	冯重摹散失，无锡重摹毁
文信国虎头山诗		冯重摹	重摹，赵氏得钱补本	重摹	重摹	冯重摹散失，无锡重摹不知下落
嘉靖三十年冬十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冯重摹	重摹，赵氏得钱补本	重摹	重摹	冯重摹散失，无锡重摹不知下落
	共七石	冯氏得原刻五石半，重摹一石半	无锡赵氏存钱补六页一石			

元名人书卷第八	第一石，共六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已磨去，改为“法帖卷第五”。书一	散失
赵文敏每蒙尊者帖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赵文敏自山上来帖，至第五行“止存”止		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第六行“三门”起	第二石，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存第六行起至九行止	散失
又得旨南还帖		原刻		原刻	原刻，书五	散失
又如在醉梦帖，至第五行“平生”止		原刻		原刻	原刻存五行	散失
第六行“得老妻”起	第三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以中还山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如对顶相帖	第四石，共六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书四	散失
又纷纷尘事帖，至10行“拜德岂”止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第11行“有已”起共四行，在致逸民帖后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千江入城帖	第五石，共五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致吉甫教授帖，至第六行“提点欲”止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七行“求吾”起	第六石，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书六	散失
又临逸少服食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临十三行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小楷千字文	第七石，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书七	散失

又小楷常清静经	末六行重刻，在饶介之帖前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致晋之帖	第八石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书二	散失
又致叔和帖，至19行“来意”止		原刻，四行五行间断裂		原刻	原刻	散失
第20行“写纳”起	第九石	原刻		原刻	原刻，书三	散失
又致逸民帖	后附纷纷尘事帖四行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赵彦徵诗帖	第十石，共四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书三	散失
	共十石	冯氏得原刻八石，重摹二石				

元名人书卷第九	法帖壬之一，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磨去	
邓文肃致伯长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又致简斋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鲜于太常致澄虚帖，至六行“支诗”止		原刻	赵氏重摹			原刻冯氏后不知下落。重摹不知下落
第七行“十首”起	法帖壬之二，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毁，冯重摹不知下落
鲜于必仁书李白诗		冯重摹	赵氏原刻。仅存六行，第六行亦缺四字			原刻毁，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胡石塘致叔敬帖，至第四行“策上”止		冯重摹				
第五行“九关”起	法帖壬之三，共五页	原刻				原刻冯氏后不知下落
虞文静致昭文帖		原刻		原刻	原刻，书十	散失
揭文安送刘粹衷帖	法帖壬之四，共六页	冯重摹。一至十六行为一石，十七行起又一石	原刻窦氏	重摹，二石	重摹，二石	原刻毁，重摹散失
揭伯防汉晋印谱序		冯重摹与前合石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毁，重摹散失
康里承旨致彦中帖	法帖壬之五，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书八	散失
又致承旨帖，至第二行“写碑”止		原刻	赵氏补刻二行	原刻	原刻	原刻散失，重摹不知下落
第三行“不果”起	法帖壬之六，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氏重摹后不知下落
周景远致治中帖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袁清容致昭文帖		冯重摹	原刻赵氏，仅存帖首隶书题名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饶介之致士行帖，至七行“草草”止	法帖壬之七，原六页，第八行起重摹	冯重摹			重摹。存首二行。帖前存赵孟頫常清静经一行，已磨去	散失
第八行“不一一”起	四页。(与赵孟頫常清静经末六行合刻一石)	冯重摹	原刻重摹（曾收得拓本，但沈本已无此帖)			原刻早毁，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又致经历帖		冯重摹	原重刻(又)			原刻早毁，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陈敬初致伯昇帖，至十行“意厚霜”止		冯重摹	原重刻(又)			原刻早毁，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十一行“寒尚希”起	法帖壬之八，共六页	冯重摹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致相国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张贞居古柏诗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王叔明怀古诗，至29行“还十”止	法帖壬之九，共六页	冯重摹（原刻存一角四行)		存石一角，四行九字	存石一角，四行九字	散失
第30行“二白”起	法帖壬之十，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倪云林怀古诗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嘉靖三十四年夏五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共十石	冯氏得原刻五石，重摹五石	无锡窦氏一石，赵氏二石，共存原刻三石。赵氏重摹二行			

国朝名人书卷第十	法帖癸之一，共六页	钱补		重摹	重摹。磨去改为“法帖卷第六”，数一	散失
宋学士致无逸帖		钱补前八行，九行起原石		重摹前八行，九行起原刻	重摹前八行，九行起原刻	散失
宋仲珩鄙书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詹孟举叙字	法帖癸之二，共六页	原刻		原刻	原刻，数八	散失
文徵明跋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宋仲温钟王小传，至第23行“而致”止	第三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24行“一体”起	第四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解学士渊静先生赞	第五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数六	原刻藏无锡窦氏,重摹散失
解祯期书李白诗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	原刻藏无锡窦氏,重摹散失
沈学士圣主得贤臣颂	第六石，共六页，前十二行原石，十三行起重摹，亦模糊。或钱氏重摹全文为一石	首十二行原石，十三行起冯重摹	全文一石，窦氏得钱氏重摹一石			无锡窦氏藏石存,冯重摹等皆不知下落
又致三舅书,至第10行“惟冀”止		冯重摹全书为一石		重摹	重摹	散失
第11行“为时”起	第七石，共六页			重摹	重摹	散失
沈大理书陈情表,至33行“二州”止		冯重摹全表为二石，第二石“今年”起。后余石补文徵明《黄庭经》末十四行		重摹	重摹,数四	
陈情表33行“找伯”起	第八石，共六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数五	嘉兴博物馆存第一石“今年”起至末
徐武功口号诗						散失
马刑部游石湖词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刘西台致启南帖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李太仆陈言事表	第九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窦氏	重摹	重摹,数七	原刻毁,重摹散失
张东海唱和诗	第十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嘉靖三十五年春二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共十石	原刻四石，补全二石。另重摹原帖四石为五石。共十一石	无锡窦氏三石，赵氏原重刻一石，存原刻三石，原摹一石,共四石。			

国朝名人书卷第十一	第一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祝枝山古诗十九首，至21行“百余”止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22行“尺极”起至45行“历白”	第二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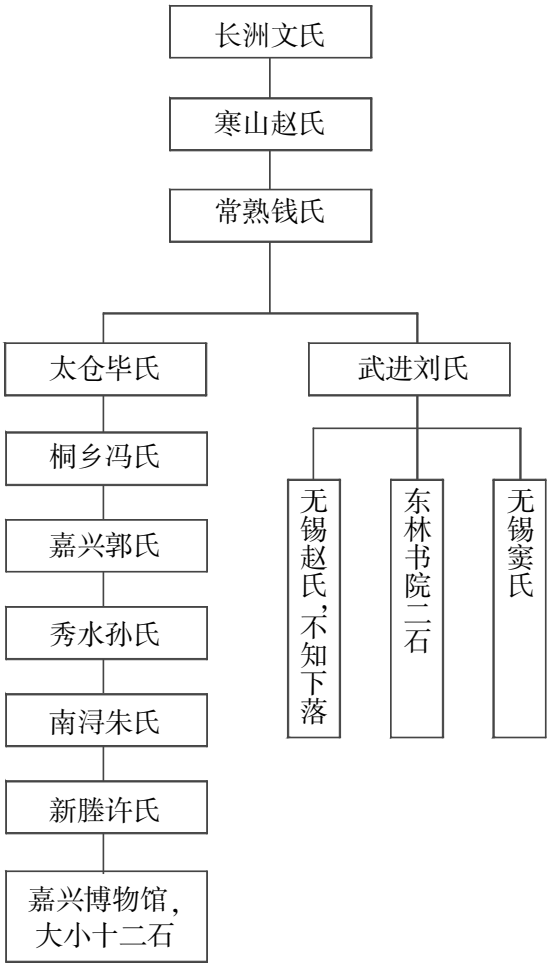
第 46 行“露霑”起至 69 行“如雨”止	第三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70 行“河汉”起至 93 行“载永”止	第四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今嘉兴博物馆藏缺末二行
第 94 行“不寤”起至 117 行“笑携”止	第五石，共六页	原刻,已断裂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118 行“手同”起至 141 行“领还”止	第六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 142 行“入房”起及自跋	第七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榜枻歌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秋风辞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又附记	第八石，共六页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顾璘跋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陈淳跋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王守题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王宠跋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许初跋		冯重摹				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祝枝山书述，至 30 行“近清”止	第九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 31 行“润吏”起	第十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嘉靖二十六年夏六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冯重摹	原刻赵氏			原刻不知下落，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共十石	冯氏得原刻七石,重摹三石	无锡赵氏存原刻二石			

停云馆帖卷第十二	第一石，共八页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
文待诏临黄庭经		原刻		原刻	原刻	散失，今嘉兴博物馆藏重刻末十四行
又西苑诗，至 24 行“之所”止	第二石，共六页	冯重摹	原刻在东林书院壁间			原刻在无锡东林书院。冯重摹后不知下落
第 25 行“海上”起至 48 行“青烟”止	第三石，共六首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49行“今皇”起至72行“之南”止	第四石，共六页	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73行“引水”起至96行“走马”止	第五石，共六页	冯重摹首五行，余原刻				冯氏后不知下落
第97行“武皇”起	第六石，共四页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嘉靖三十九年夏四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冯重摹		重摹	重摹	散失
	共六石	冯氏得原刻五石，重摹一石又五行	无锡东林书院存一石			
共计	121石	冯氏得原刻85石半，重摹36石半，共122石	无锡窦氏存14石，赵氏应存12石，毁一石，应存11石，东林书院二石			

按：郭氏自冯氏所得帖石，因未见郭藏石拓本，未知。今以孙氏所得及郭氏自藏《书谱》石刻为之。冯氏原藏石中，如第二卷《绝交书》，第四卷怀素《千字文》，第六卷陈简斋《诗翰》、薛道祖临《兰亭》，第十卷张东海书诗，第十一卷祝枝山书《古诗十九首》，皆全帖不知踪迹。无锡藏帖石除东林小学壁间二石外，窦氏所藏，初云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今知密藏得全。赵氏所藏不知下落。嘉兴藏石，据嘉兴博物展出残石云：“原十二卷二十七石。”又云：“抗日战争前，石自南浔至新塍，嵌置许氏宗祠。抗日战争后，宗祠改建礳溪小学，帖石嵌砌操场墙内。”“文化大革命”中墙圮散失，今存大小石十二块。

440余年中，帖石辗转江浙两省，屡易其主。制为总表如后：



章文翻刻本及日本印本考

章文翻刻本

按:《考槃余事》、《履园丛话》、《集古求真》等皆谓《停云馆帖》有翻刻本。《履园》、《集古》并云翻刻者为章文。而道光四年本《苏州府志》乃谓有吉由庵张氏翻刻,而不言章氏,岂另有张翻者欤?兹就章文翻刻本与原刻有相异者记如后。

于《晋唐小字卷第一·度人经》后另有薛稷拓小字《兰亭》。

李重光御库所藏薛稷拓本兰亭乃」先宣靖公东閤之旧物也手泽所存罔敢失坠」暇日重整以寿其传寸珠尺璧未易轩轾」谨端拜敬识于左晋江曾绅书」(行书四行,有"刘氏法书"、"养生主"、"陶斋珍玩"、"米□之印"、"始封于鄫"、"青社忠臣曾好"、"建业文房之印"、"曹士冕印"等十四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下略)(小行书廿八行)

按:以上共五页,刻一石。《禊帖》字小于《定武》而大于《玉枕》,界以直栏。所见二本,装裱序次不同。一在卷一《度人经》后,一在《名人书卷第七》姜白石书《兰亭考》后。

于《停云馆帖卷第十二》中,文徵明小楷临《黄庭经》后,行书《西苑诗十首》前,有文书《鹤林玉露》中《山居篇》。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 (中略)**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行书卅行)

按:右书共六页,刻一石。

章文覆刻在何时,尚不可考。所见本除增刻《兰亭》及《山居篇》两种外,其差异处颇多。最易识别者,如卷一《黄庭经》,原刻第一页首数行有麻点,而章本无之。原刻原本《宋拓秘阁续帖》,原有横泐痕四处,文氏皆照摹,章本未刻。《破邪论序》章本多石,原刻则无。卷三孙过庭《书谱》,文氏原刻上半有缺字,章本均补全。《宋名人书卷六》中陈简斋书,原刻标题是行楷"陈简斋诗翰"五字,顶格刻。章本则改为隶书"宋陈简斋诗翰"六字,与其他各帖隶书标题大小高低格式均相同。《停云馆帖卷第十二》文待诏临《黄庭经》,原刻界有直栏,章本无之。

《履园丛话》云:"较原刻略瘦。"而实不尽然。小楷大都较原刻为瘦,但卷一中《心经》及《陀罗尼咒》较原刻为肥。卷十詹孟举书《叙字》,较原刻肥而近俗。行草各帖,或肥或瘦。卷二《唐摹晋帖》皆略肥。《绝交书》又肥瘦不一。卷四颜鲁公《祭姪文》及两陈跋略肥。林纬乾《深慰帖》又略瘦。卷八赵文敏行书诸刻及卷十一祝枝山书均瘦。

章文覆此,虽行次大小粗细与原刻相同,然逐行细玩,其用笔及笔画伸缩之间,与原刻差异极多。章文覆刻时,必不能借原来墨迹一一摹勒,功力又还不逮文氏父子,故原刻丰貌神韵,远非章覆刻所能及。小楷虽亦清秀,颇觉轻佻,不及原刻古拙。《考槃余事》不及原刻之评,非诬也。

日本印本

按:公元一九三八年(日本昭和十三年),日本西东书局翻印《停云馆帖》,松田南溟释文。因所据原本已经墨填修补,故印本难从考知其拓之早晚。其中亦有数幅,为原刻残石,然又有数帖,其泐痕于清拓始有者。第六卷中杂《章翻本》,十一、十二两卷全是《章翻本》。岂原系集各种拓本,始成此帖者欤。兹略记其同异于后。

《晋唐小字卷第一》 皆自明拓原刻翻印。《黄庭经》原刻所本,是《宋拓秘刻续帖》。帖内原有横泐痕,原皆照刻。《章翻本》则未刻。今印本亦无,似与《章翻本》同,然实非《章翻本》,以首页上半诸字如二行"有"、四行"雨"、五行"生"、

十二行“海”、卅二行“环”、卅四行“根”其泐痕与原刻相同。其麻点之少,与原横泐痕同皆被修填补墨。《曹娥碑》后题识已断裂,是未补前拓本,此帖拓尚未晚。《草书阴符经》后宋人题名中“越”字已泐,则拓又非早。“越”下“茀”字是误被修补时涂去。

《唐樵晋帖卷第二》《万岁通天进帖》第二石,此已断裂成数石,是未修补前所拓。《绝交书》亦是原刻本,但文徵明跋自第二行“双”、第八行“嵇”、第九行“其”、第十行“尝”泐痕考之,既非原刻,亦非《章翻本》,不知出自何本。

《唐人真迹卷第三》 皆自原刻翻印。第二石犹是未经修补拓本。

《唐人真迹卷第四》 皆自原刻翻印。颜鲁公《祭姪文》后陈绎曾跋廿二行“然”、廿四行“孔子”、廿五行“门”等字已泐,拓已较晚。林纬乾书第五行有断裂痕,帖末各印与《平安帖》间亦有断裂痕,此清拓本中始见之。

《宋名人书卷第五》 自原刻翻印。

《宋名人书卷第六》 其中秦观《蒙教帖》末二行、毛泽民书、释参寥书、李端叔书(以上一石)、危素跋薛道祖书及李元中书(以上一石)皆《章翻本》。“观再拜”之“拜”字,”原末一点,《章翻本》刻成一横。《日印本》将末一横修去。参寥书第三行“走一”,原刻与《章翻本》于二字有“Z”号,盖“一走”也。印本亦被修除。

《宋名人书卷第七》 自原刻翻印。陆放翁书第五行“之”、九行“友”,其泐处与原刻同,但七行“暇”字泐痕,即《冯本》尚完好。

《元名人书卷第八》 自原刻印行。但《千字文》八行“彼”、九行“空”,《致叔和帖》廿六行“便”,《致逸民帖》八行“冀”字等又有泐痕,是拓本已晚。

《元名人书卷第九》 亦自原刻印行。但拓时略晚,如王叔明书第十七行“海”、“埃”又添泐痕。

《国朝名人书卷第十》 皆自原刻印行。

《国朝名人书卷第十一》 皆《章翻本》,其字较原刻为瘦。

《停云馆帖卷第十二》 皆《章翻本》。文待诏书《黄庭经》,原刻有乌丝直栏,此皆未刻。《鹤林玉露》一则,亦原刻所无。《西苑诗十首》较原刻为瘦。

注:《停云馆帖》考卷八为记述汇录,略。

(编辑:盛诗澜、徐驰)

(上接第53页) 是历史的缩影,精神的载体,文化的遗存,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没有文化,一座城市就没有吸引力,能否保护好名人故居,反映的是这座城市整体的文化氛围和公民素质,因而我们应该努力唤起公众保护文物、保护历史遗存的热情,让守护名人故居从一种小众的情怀延展成为一种全民关注的大气候,通过保护、利用、传承的手段,让这些沉睡在城市角落的历史承载物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在人们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中逐渐鲜活生动起来。

(作者单位:无锡市薛福成故居管理中心)

(编辑:何桦)

宜兴市博物馆藏“吴云根鱼化龙紫砂壶”

朱轩林



图一　吴云根鱼化龙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有三个独特：泥料材质独特、成型工艺独特、文化表达独特。其中，成型工艺独特，指的是宜兴紫砂壶手工拍打、镶接成型的工艺，与世界各地陶器成型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独特的成型方式，决定了宜兴紫砂壶不论圆、方、侧角、筋囊，不论高、矮、曲、直，均可率性制作，并且结构严谨、口盖合实、线条清晰。由此诞生的，便是宜兴紫砂壶那变化多端的造型之美，所谓“方非一式，圆不一相”，宜兴市博物馆藏“吴云根鱼化龙紫砂壶”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点。

吴云根，1892–1969，字芝莱。14岁师从汪春荣，与汪宝根、朱可心为师兄弟，制壶风格敦厚、稳中，擅长光器和筋囊器。曾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陶瓷科，结识了职业教育家、设计家王世杰，参与创办“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学校”并写下了多篇紫砂讲义，阐述制壶体会。

说起吴大师，就不得不说到他善良的心地。有一次，吴大师去往无锡鼋头渚疗养，在无锡火车站下车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前往，期间他心疼车夫奔波劳累，只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箱子放于车上，自己随车奔跑并帮忙推车，最后车费2元，他硬塞给车夫5元。或许这善良的心地，也正是成为一名艺术大师的根源。吕尧臣、吴震、何挺初、葛明仙等均出自吴云根门下。

宜兴市博物馆藏“吴云根鱼化龙紫砂壶”（图一），壶身层层波浪堆叠，立体感强，波涛中龙露出头部与半身，张口睁目，龙爪清晰可见，龙尾卷成壶把，把上鳞片清晰可见。壶钮作卷云状，壶盖中龙头可以伸缩，灵巧生动。

就“鱼化龙”这个造型，我们需要探讨以下几点：

一. 是谁创造了“鱼化龙”壶？

“鱼化龙”壶，也叫“龙壶”、“鱼龙壶”、“鱼龙戏浪壶”，蕴涵着鱼跃龙门、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之意。

一般认为，“鱼化龙”壶的原型出自明代紫砂匠人陈仲美，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神品》中有记载：“陈仲美……好配壶土，意造诸玩……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相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龙戏海涛”应为“鱼化龙”的原型，但未有实物流传。到清代邵大亨时期，经过他的精心设计，“鱼化龙”才成为一种成熟并广泛推广的经典壶型。

二. 究竟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

《山海经》有“风道北来，天乃大水全，蛇乃化为鱼”的说法；西汉刘向《说苑》有“昔日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的描述。这说明，中国古代有蛇、龙可变为鱼的说法。

《琵琶记》有“孩儿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的唱词；李白《与韩荆州书》有“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的感叹。可见，民间更有着“鱼化龙”——进士登科、金榜题名、高升昌盛的期盼。

三. “鱼化龙”壶有哪些基本造型特点？

“鱼化龙”壶，将鱼、龙、云、浪的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一般六瓣云水纹组成圆形壶身，上施浮雕，一侧鲤鱼吐珠，一侧龙首吐球。壶钮亦饰海浪，壶钮内圆雕龙首一枚，首、舌可动，巧妙灵动。壶把作龙尾状，浑然一体。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宜兴紫砂壶的昌盛，不仅源于它独特的原料、精湛的工艺，更源于紫砂匠人们的文人情怀。吴云根，一位善良憨厚的紫砂大师，做出这把敦厚稳重的紫砂名壶，想必这才是紫砂壶的精髓所在吧。目前，该壶由宜兴市博物馆收藏，并定级为国家三级文物。

（作者单位：宜兴市博物馆）

（编辑：何桦）

《吴地雅事——无锡博物院藏文氏一门书画特展》开展

无锡博物院2015年末大展，“走近大师”系列之《吴地雅事——无锡博物院藏文氏一门书画特展》于11月30日在无锡博物院中区四层展厅隆重展出，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3月6日。此次展览将集中展出无锡博物院藏文氏一门的精品书画，更有“文徵明墨笔蕉石鸣琴图”、“文震亨白岳游图卷”等重量级文物亮相。

江南吴地，自永嘉南渡以来，就一直是全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圣地。文徵明（1470–1559）是继沈周之后吴地艺坛的领袖。他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改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周以后的吴地书画，实际上完全是文家天下。以文徵明为中心和起点，师友、弟子、文氏一门数代在书画界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论时间之久，则不仅在嘉靖、万历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即使其后的数百年中有松江画派、“四王”、“四高僧”、扬州画派等多种画派与艺坛高手先后崛起，但以文徵明书画为标准模式的吴派影响力始终衰而未落，时见余绪，以至我们在近代海上六十名家中还能看到吴穀祥这样一生只宗文、沈的山水画家，而六十人中画花卉者宗吴门画家或受其风格影响的就更多了。论地域之远，则不仅自三吴地区波及全国，甚至江户初期被称为日本“唐样书法”第一人的北岛雪山，也是师从深得文徵明笔法的杭州人俞立德，所以其楷书、行书也是标准的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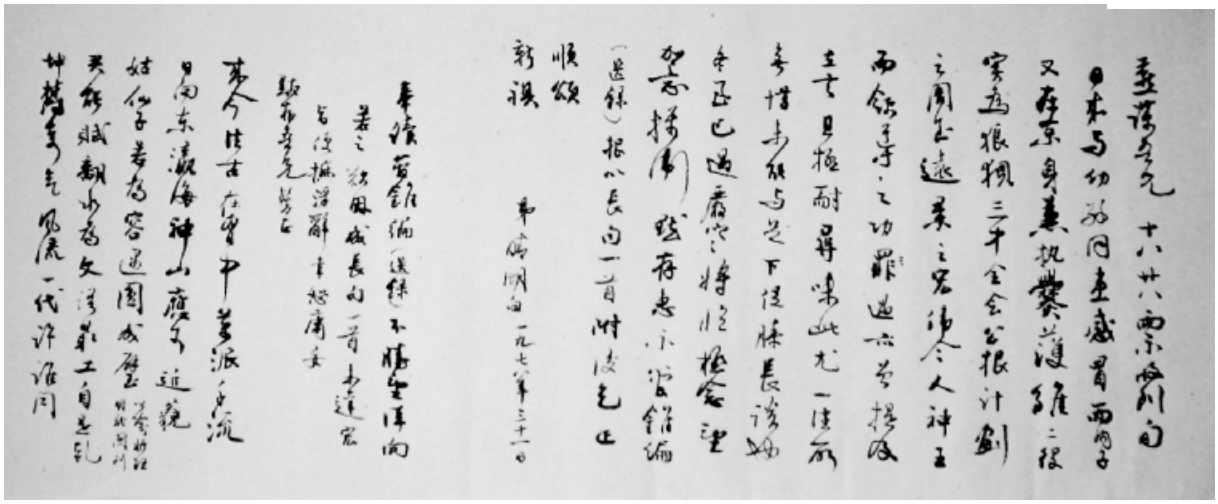
无锡博物院藏书画中，文徵明本人作品以及文氏一门作品相当丰富。其数量既多，质量亦高，不乏国家等级文物和精品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徵明父子与无锡极有渊源，苏州文家与无锡华家有通家之谊，往来密切，文化交流频繁。本次展出的文氏父子致华家手札、文氏为华氏手书家族文献，都体现出明代江南世族交游的鲜明文化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希望观众在流连于书画艺术魅力的同时，亦从中深入体味到悠久而醇厚的吴地文化内涵。

（消息来源：无锡博物院网站）

一件见证现代学人交谊的书信

——钱锺书友人郭晴湖与徐燕谋书墨迹纪事

邹绵绵



图一　郭晴湖“与燕谋书”手迹

辛卯(2011年)端午前夕,可谟兄(书信人郭晴湖次子) 自天津邮寄来其父郭晴湖遗作书信墨迹“与畏民书”、“与燕谋书”二件,属我就二件书信的写作时间、书信内容及相关背景分别加以笺注。来信中还告知二件书信的由来, 前者“与畏民(郑姓,1912–1993,系书信人内弟)书”是受信人生前将此书信交还外甥可谟保存;后者由久居上海的受信人徐燕谋胞弟徐熙载(1909–2003,名承烈)生前交还世侄可谟保存。这些便是我有幸见知二件书信墨迹的原由。

“与畏民书”内容主要是述书信人1963年新春,与友人白蕉、邓散木(三人曾相继都被打为“右派”,后摘帽)聚首北京事,其中颇有涉及现代艺苑逸事, 因限于本文题旨, 故在此不作详述。仅对“与燕谋书”作一介绍,并就书信内容及其相关背景,在记述中略作钩隐,以能真实地反映书信人郭晴湖与受信人徐燕谋, 以及钱锺书三位前辈学人的交谊, 和体现这件书信的文化价值。

在此先把这件书信照录如下([ ]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燕谋吾兄:十八、廿八两示收到。旬日来与幼孙同患感冒,而内子又在京,身兼执爨护雏二役,实为狼狈。三中全会公报计划之周至,远景之宏伟,令人神王[往]。而领导之功过亦曾提及,立言且极耐寻味,此尤一往所无。惜未能与足下促膝长谈也。冬至已过,严寒将临,极念!望加意摄卫。

默存惠示《管锥编(选录)》,报以长句一首,附后乞正。顺颂新祺!

弟晴湖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奉读《管锥编(选录)》,不胜望洋向若之叹。因成长句一首,未达宏旨,便摭浮辞,幸恕庸妄。默存吾兄粲正:

来今往古在胸中,万派千流日向东。瀛海神山应可近,藐姑仙子若为容。遇圆成璧(以喻析理明融圆到)君能赋,翻水为文语最工。自是乾坤郁奇气,风流一代许谁同。(图一)



图二 《晴湖诗稿》、《徐燕谋诗草》书影

为便于读者对书信内容的理解，有必要先对书信人和受信人作一简要的介绍。

书信人郭晴湖(1909–1990)，名则灏，字晴湖，以字行。号肆园，福州人。1931年5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无锡国专。[①]旋获上海光华大学文学士。曾执教于私立无锡中学、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光华大学(任讲师)。抗战时期在上海，利用时任光华教师的公开身份，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祖国珍贵文献事业，秘密担当了郑振铎与时任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1876–1945，著名藏书家，时主管古籍版本鉴别及价格审定)之间的联络人。还作为郑振铎的帮手，负责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等事务。[②]建国初期，举家由沪迁居天津，曾执教于天津第三中学。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摘帽。工古文，善诗赋、书法。在沪时曾与沈尹默、王福庵、白蕉、邓散木等往还交流书艺，与白蕉、邓散木多有诗赋酬答。然其一生交往最久远且甚相知者有徐燕谋（承谟)、徐熙载(承烈)昆仲及钱锺书(默存)、杨绛(季康)夫妇。[③]有《晴湖诗稿》写印本一册(由钱锺书为之题签)行世(图二)。其书法出入“二王”，作书用笔直起直落，洒脱自然，点画妍美生动，得清脱自然之妙。为友人钱锺书称誉为“挥毫珠玉，词翰双绝”。当代书坛巨擘沙孟海见其《晴湖诗稿》写印本，品味其书法后道：“好功夫，不简单！”[④]

受信人徐燕谋(1906–1986)，名承谟，江苏昆山人。早年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与钱锺书为该校同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历任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诸校英语教授。“文革”前，受高教部命编订大学英语教本，其中高校英语专业四年级教本(七、八两册)，即其所主编。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拟以外语系主任职授之，为其坚却，谓学校行政非其所长，愿尽力教导学生，培养人才。[⑤]工诗，有《徐燕谋诗草》(由郭晴湖手写全帙，由钱锺书题序，并补遗)印行。[⑥]

有关书信人和受信人，以及钱锺书三人的缔交，竟全是缘自钱锺书父亲，郭、徐二人的老

①可参见《茹经先生(唐文治)自订年谱》：“(1931年)五月杪，行毕业礼，即放暑假。毕业者，学生郭则灏等三十余人。”1935年3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发行，无锡民生印书馆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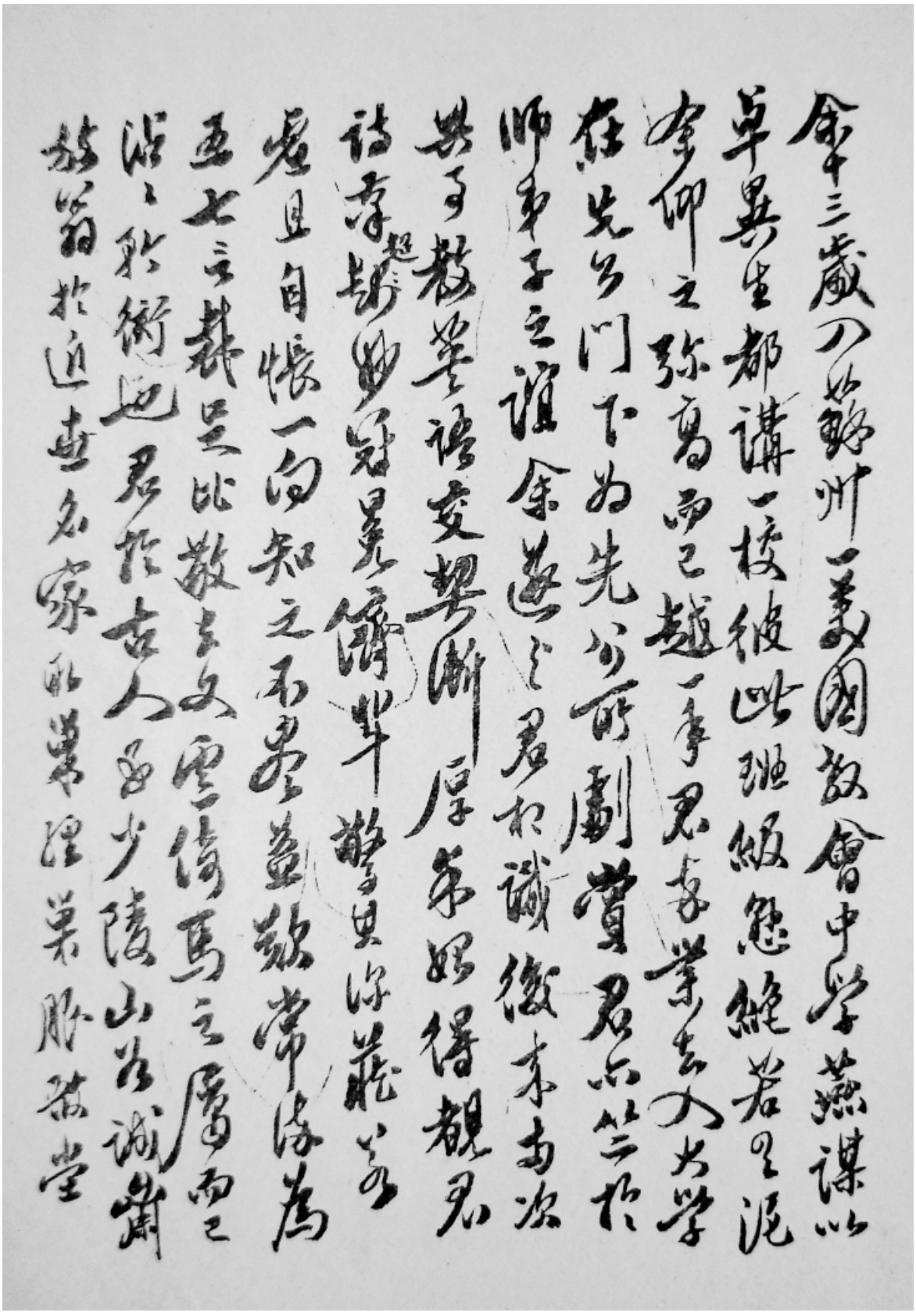
②详见拙撰《郭晴湖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祖国文献史实探究》，刊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7日第6版。

③这段文字，曾在《致晴湖(二函)钱锺书》(由笔者撰写“附注”一则。而拙注文字有幸得到钱锺书先生的修改和增益)，刊载于《文汇报·笔会》1990年10月23日。

④见拙撰《挥毫珠玉，词翰双绝——郭晴湖先生及其书艺》，刊于《书法》1993年第3期；另见浙江美院祝遂之撰《读郭晴湖先生书法观感》，刊《西泠艺报》总第23期，1987年4月20日。

⑤见徐承烈(熙载)撰《诗人、学者徐燕谋事略》，刊载于《昆山文史》第8辑，1989年12月印行。

⑥有关徐燕谋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与钱锺书的交谊，详见拙撰《诗人、学者徐燕谋与桃坞中学》，刊于《苏州日报》2012年10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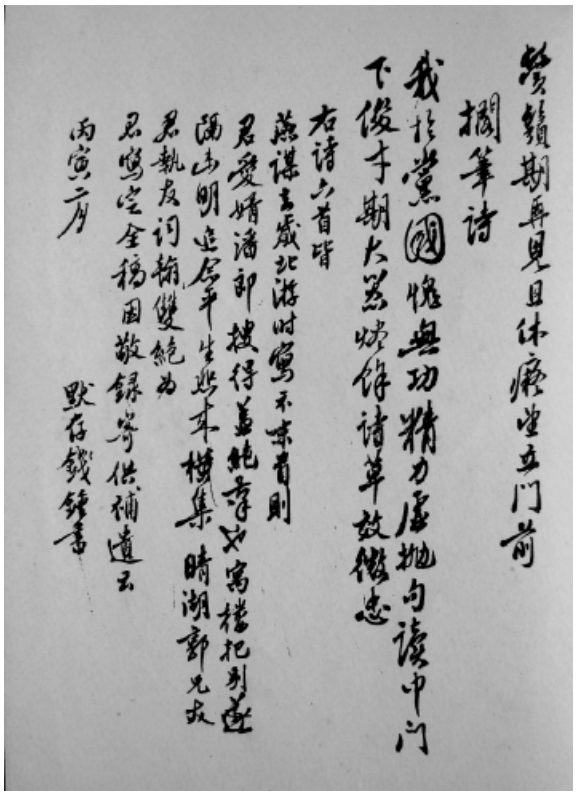
图三　钱锺书撰《〈徐燕谋诗草〉序》手迹(局部)

师无锡钱子泉(基博)先生。先说受信人徐燕谋,他就读光华大学时,从徐志摩受业英语,诗文则为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后为光华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所剧赏。1930年,徐燕谋由钱基博师的推荐, 到校址在无锡南门外羊腰湾的私立无锡中学任教该校高年级的英语, 是为他以英语教学终其身之始。私立无锡中学,创建于1920年,由教育家高阳创办,为无锡历史上第一所私立完全中学。学校聘请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出任校长,聘钱基博孪生胞弟钱孙卿(1887–1975,名基厚)等为校董。作为教育家的钱基博为提高该校的师资力量, 就召引门下高材徐燕谋到该校执教。至1933年秋,郭晴湖取得光华大学文学士后, 亦由钱子泉师的推荐到私立无锡中学任高中二、三年级国文教员(同时徐燕谋胞弟徐承烈亦从光华文学院毕业后也由钱子泉师推荐到私立无锡中学任教)。由是徐氏昆仲与郭由同事而相识,由于徐燕谋、郭晴湖二人均好吟诗遂结交。这从《晴湖诗稿》收有诗作《燕谋见惠名酒感而作此》有句:“羊腰湾里忽尝檨(即芒果),武定楼(燕谋寓居沪武定路)中夜啜粳。”所记即为二人同在无锡任教,后又同回上海任教,课余常谈艺论诗至深夜的交情。1934年秋,徐、郭二人又同应钱子泉师之召,先后回母校光华任教(徐承烈仍留在锡中任教,直至抗战爆发后返沪)。遂与当时已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 兼任国文系教员的钱锺书(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移居上海,同年9月始任教光华大学)结交。其间钱锺书、徐燕谋、郭晴湖颇多诗作唱酬,三人并有诗作同刊于《光华半月刊》。①

1985年,钱锺书在《〈徐燕谋诗草〉序》起首写道:“余十三岁入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燕谋以卓异生都讲一校。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余仰之弥高而已。越一年,君卒业,去入大学,在先公门下,为先公所剧赏;君亦竺(笃)于师弟子之谊,余遂与君相识。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图三)其中所谓“两次共事教英语”,一次即在上海光华大学, 还有一次, 因时至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在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持战时教育局面, 筹建了如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等六所师范学院。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先期在蓝田任教,便发信与电报要他入湘任教,同时召学生徐燕谋也一同前往。同年秋,钱锺书、徐燕谋、邹文海等五人结伴由上海出发,历经艰难同赴湖南任教。他们这次长途跋涉的艰难情形,徐燕谋在长达1870言的《纪湘行》长诗中作了艺术再现,而小说《围城》的第五章,也正取材于这次远行。徐、钱二人在湘西“国师”期间,除了一同教授英语外, 就是谈天论诗作诗。二人暴谑狂吟,无话不谈。钱锺书《槐聚诗存》中《戏燕谋》诸诗,便可见得。又如徐燕谋有诗,题为:“中书君《围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西穷山中。四十年前坐地炉旁听君说书中故事犹历历在目。今年(1978年)到京,出示海外有关《围城》书评,而国内竟无能举其名者,可叹也。”诗曰:“灰里阴何拔未成,君来叩户说《围城》。十年劫火诗书尽,故事偏传海外名。”当时二人诗作,常同载于《国师季刊》。这些便是钱序中与徐燕谋“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的出处。而钱锺书与郭晴湖的交谊, 如钱锺书在1941年春撰写的《徐燕谋诗序》中有云:“侪辈与君(指徐燕谋)相处,以郭君晴湖为最久。晴湖,春榆侍郎从子也,亦出吾父门,雅擅笔札,作诗小有《吴会英才集》风致,颇共余唱酬。”②又如钱锺书还为《徐燕谋诗草》书录燕谋遗诗六首,并有跋语云:“右诗六首皆燕谋去岁北游时写示,末首则君爱婿潘郎搜得,盖绝笔也。寓楼把别,遂隔幽明。追念平生,悲来横集。晴湖郭兄,友君执友,词翰双

①所述三位前辈交谊事,除了参见相关诗、序文之外,还见于由徐熙载(1909–2003,名承烈)先生生前与笔者的书信中(至今保存卅余通,内容主要涉及为笺注《晴湖诗稿》、《徐燕谋诗草》和钱锺书《〈徐燕谋诗草〉序》)。

②钱锺书 1941 年春所撰《徐燕谋诗序》,原以为该序文已佚,不意为徐燕谋、钱锺书友人,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所发现尚在人间。笔者由徐熙载先生生前告知并录示。



图四　钱锺书跋《徐燕谋诗草》手迹(局部)

绝，为君写定全稿，因敬录寄供补遗云。丙寅(1986年)二月，默存钱锺书。”(图四)由此可知他们三人的交谊长达半个多世纪。又钱锺书能为他人的诗稿二次撰序，并为他人的诗稿补遗，这也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二次题序的时间相隔四十多年，足见两人交情之深且远矣。

再说书信从起首“十八、廿八两示收到”，可知这件书信是收到“两示”之后的复信。接着以告知“旬日来与幼孙同患感冒，而内子又在京(书信人有女儿工作在北京，夫人才因事赴京小住)，身兼执爨护雏(做饭、带领幼孙)二役，实为狼狈”，以说明迟复的原因。书信时在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久。而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长达36天)，12月13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出了思想解放的先声。对此，书信人与全国人民一样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所以书信中有“三中全会公报计划之周至，远景之宏伟，令人神王(往)”之语。接着书信人凭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而对《公报》中述及对以往“领导(人)之功过”评价的措词感觉“极耐寻味”，而且为以前所无。对此苦不能与受信人当面作些探讨。由于书信时“冬至已过，严寒将临”，所以尤念老友的身体状况并希望多加保重。信末，由于同年(1978)，书信人、受信人曾同赴京，并在三里河钱锺书寓所三位老友聚首。对此，《晴湖诗稿》收有诗作《京中晤燕谋、默存赋呈》：“北秀南能自有真，支离掉臂亦精神。挖扬风雅吾何敢，却望云龙拜下尘。”其时，按三位老友钱锺书、徐燕谋和诗人郭晴湖的社会地位、名望而言，也确实是悬若云泥，然而这些并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钱锺书将自己新著《管锥编(选录)》分赠二位老友，书信人读后自觉“不胜望洋向若之叹”，为此赋了一首七律，在准备邮寄给老友钱锺书之前，趁此书信的机会就先把这首诗赋录于信末，以求得到受信人的指正。书信人所作《奉读〈管锥编〉(选录)，不胜望洋向若之叹。因成长句一首，未达宏旨，便摭浮辞，幸恕庸妄。默存吾兄粲正》一诗，后收入《晴湖诗稿》内，题目改为《读默存大著〈管锥编〉赋呈》，并将诗中最后一句改为“风流一代复谁同”，即把原来句中的“许”，改作“复”。对于这一修改，不知是否为接受了受信人的建议，或为书信人自行修改，已不得而知了。上述便是这件书信的全部内容和相关背景，至于有关书信中脱漏了书信写作的月份，鉴于书信中述及的“三中全会公报”，“冬至已过”，“顺颂新祺”诸语，书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78年12月31日无疑。

至此，郭晴湖的这件与徐燕谋书信，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书信中的三位前辈学人不仅是同学、同事和诗友之交，而且也是道义之交。同时它也可以为“钱锺书研究”提供有关钱锺书平生交游的一些相关资料。

笔者出于对三位前辈的敬仰，遂不揣谫陋地就所知上述书信中的人事情状及相关背景略

述如上。同时笔者鉴于书信人郭晴湖先生早年求学于“无锡国专”,又与受信人徐燕谋曾同在无锡执教的背景，而且在这件书信中还录有赋呈友人钱锺书的《读默存大著〈管锥编〉赋呈》诗，才有意向这件书信墨迹的保存者友人郭可谟兄建议，希望他把所保存的其父郭晴湖的这件书信墨迹捐赠江苏无锡市“钱锺书纪念馆”，以作为常年陈列品，可使得这件书信的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我想这一建议定然会为友人可谟,以及他的兄姐们所赞成,因为把他们父亲的这件“与燕谋书”和同纸附录的《奉读〈管锥编〉(选录),不胜望洋向若之叹。因成长句一首,未达宏旨,便摭浮辞,幸恕庸妄。默存吾兄粲正》墨迹捐赠并陈列在“钱锺书纪念馆”,这应该是对他们的父亲郭晴湖,和父执徐燕谋、钱锺书二位伯伯最好的纪念。

(附注:“图二”中的《晴湖诗稿》,由晴湖先生生前签署后邮赠笔者;《徐燕谋诗草》,系1990年夏，郭可谟兄南下先到上海探望父执徐熙载伯伯时,徐熙老得知他将到苏州,特将《徐燕谋诗草》一册托可谟带来赠予。是为我有缘与徐熙老结为忘年交,并有十年师生情谊的起始。)

(编辑：阎智海)

《江上数青峰——钱瘦铁作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



钱瘦铁　黄山始信峰

2015年12月19日，由无锡博物院和北京保利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太湖画派近现代名家系列之《江上数青峰——钱瘦铁作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展，展览共遴选了保利艺术中心和无锡博物院所藏近50件钱瘦铁艺术精品，内容涵盖山水、花鸟、人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时代性，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现钱瘦铁深厚的艺术功力。钱瘦铁之侄、我国著名国画家钱大礼当天也亲临展览现场。

钱瘦铁(1897–1967)名厓,号瘦铁,别号数青峰馆主,江苏省无锡市鸿声里人。因郑文焯曾为其书斋署名“瘦铁宧”,所以自号“瘦铁”。钱瘦铁是“海派”名家,书画篆刻兼擅,人格卓然,风格超迈,有“三绝巨匠”之誉。时人将他与吴昌硕(苦铁)、王大炘(冰铁)并誉为“江南三铁”,亦有再加邓散木(钝铁)而并称“江南四铁”者。

钱瘦铁的书、画、篆刻堪称三绝。其书法四体皆工,上追汉魏,不拘于点画而重意味情趣,整体上古意盎然。其绘画,笔墨酣畅悠肆,气格壮伟,力度过人,即使是尺素小品,也有寻丈之势。其篆刻,浑朴古茂、高美奇崛,其章法以阔大、安闲为上,形式感很强。

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2月19日。

《无锡文博》出版方式改革创新的方案

(2015年11月6日经《无锡文博》编委会会议讨论通过)

《无锡文博》杂志拟于2016年起以书代刊方式公开出版发行。改革方案如下：

一. 改革原因

《无锡文博》自办刊以来始终没有正式刊号,属于内部出版物。这直接导致其稿源质量不高,学术影响欠缺。由于申请刊号在实际操作上难度较大,拟通过以书代刊,先使《无锡文博》拥有正规书号,公开出版发行,再根据后续发展情况决定其前途。

二. 出版物名称

正式定名为《无锡文博论丛》。

三. 出版宗旨

主要以宣传国家文博政策、促进太湖文化圈学术研究交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无锡文博事业发展为宗旨。

四. 栏目设置

拟常设以下栏目：考古与文物、历史研究、艺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图书评论(届时将根据来稿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 出刊时间

每年年底12月印行,每年7月底为最终截稿时间。拟于2016年底出版第一辑。

六. 稿件来源

通过征稿启事征集稿件和主动邀约稿件。

稿件的质量事关刊物的持续发展,《论丛》除依托无锡文博界的研究力量、推介无锡的最新研究成果外,同时拟面向全国征稿,多渠道拓宽稿源。征稿启事除发布在无锡博物院网站外,另刊载于《无锡文博》2015年第4期及次年的出版物中。

将以高校、文博界的专业研究人员的来稿为主,兼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及爱好者,不“因人废文”,客观审核来稿,只要言之有理有据,是原创未刊稿件,均予采用。

严格杜绝抄录稿。

七. 审稿制度和编校流程

为确保稿件质量,杜绝关系稿,拟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1)匿名评审阶段：编辑部严格实行三审三校制度。初审由责任编辑负责，复审由主编负责,终审由院相关领导(《无锡文博论丛》编委会)负责。

首先由编辑部对来稿一一登记，包括稿件名称、作者信息、来稿日期、稿件类别等,经责任编辑初审认可的稿件可进行复审；

主编对初审合格的稿件进行复审，对于复审合格的稿件进入匿名评审程序；

匿名评审的稿件主要指部分专业性强的来稿,由编辑部对来稿进行匿名处理后,将送审稿件和审稿意见表(见附件一)寄给外聘专家团队(见附件二)审稿,并由审稿专家对所审阅稿件采用与否提出具体建议，在约定时间内反馈给编辑部；

对于修改后需要再审的稿件，由审稿专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对于主动邀约的稿件不进行匿名评审。

(2)正式编校阶段：编辑部对通过匿名评审的稿件进行讨论,在确认稿件达到刊用要求后,即公开来稿信息,并进行前期编辑,对于文稿的规范,如注释、标点等,由责任编辑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并由编辑部将来稿修改意见统一反馈给作者进行修改。

一、二校由责任编辑承担,三校一般由主编把关；通读清样、核红由责任编辑完成；清样稿

检查无误后,即付印刊行并保留PDF电子文档。

八. 注释规范

来稿格式及注释规范参见“附件三”,届时将刊载于《无锡文博》2015年第4期,并公布于无锡博物院网站。

九. 出版事宜

(1)出版社:初步设想,选择文物或其它出版社;

(2)刊物规格与页数:胶版纸,平装,16开本,300页以内(每期有浮动),具体页数视收稿情况而定;

(3)印数及发行:拟印行1000册,主要由无锡博物院负责刊物的发行。

(4)出版经费来源:《无锡文博》编委年费,年费不足部分,则由无锡博物院筹措。

十.《无锡文博论丛》编委会名单

主任:刘宝山

副主任:蔡卫东 宋保舵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莹 邢 娟 邹忆军 杨启明
陈建忠 陈建强 陆建新 陈 宇
陈 蓉 李一全 周小东 周小萍
金石声 荣骏炎 赵建高 徐 晖
陶 冶 郭会文 黄兴南 盛诗澜
梁溪清 阎智海

《无锡文博》编辑部

2015年11月6日

附件:

附件一:《无锡文博论丛》审稿意见表(略)

附件二:外聘审稿专家名单(略)

附件三:《无锡文博论丛》来稿格式及注释规范

一. 来稿格式

来稿需包括如下内容,顺序依次为:(1)论文标题(含副标题);(2)作者姓名(多位作者姓名中间用空格隔开);(3)内容摘要(200–300字);(4)关键词(3–5个,中间用空格隔开);(5)正文;(6)文末注明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出生年月、职称、职务、所在单位、通联地址、邮编、手机号码、电子邮箱)。

二. 注释规范

引文注释均采用页下注(脚注)格式,一律放置于每页正文下方,所引注释条目按先后顺序依次编号为①、②、③、④……,次页重新编号,以此类推。现将注释格式分别说明如下:

(一)著作

引用著作的相关信息先后顺序为:(1)责任者姓名;(2)书名;(3)出版者及出版年份;(4)页码。如所引用文献出自撰著,在责任者姓名后直接加冒号;如所引用文献出自编、校等形式,在责任者姓名后加“主编”、“编”等字样后再加冒号;如两个或三个责任者合著或合编,则在责任者姓名中间用冒号隔开;如系三个以上的责任者合著或合编,则在第一责任者姓名后加“等”字。举例如下:

①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85页。

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③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98页。

④苏智良等编著:《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二)译著

引用译著需标明责任者国别,国别置于责任者姓名前面;翻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原著者汉译姓名之后,中间用逗号隔开;翻译者有两人或三人,译者姓名中间用顿号隔开;翻译者如系三人以上,则在第一翻译者姓名后加“等”字;其余注释格式同上。举例如下:

①[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页。

②[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

③[美]邓尔麟著,蓝桦译:《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三)资料集与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引用文集析出文献相关信息的先后顺序为:(1)作者姓名;(2)篇名;(3)编者姓名;(4)书名;(5)出版者及出版时间;(5)页码。举例如下:

①王曾瑜:《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略论》,邓广铭、漆侠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②曾昭燏、李济:《博物馆的性质与功能》,李淑萍、宋伯胤选注:《博物馆历史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③曾昭燏:《中国博物馆之沿革》,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四)古籍

古籍的标注格式与著作类标注格式基本相同,除需注明责任者所处朝代之外,还需注明刊本、卷次等信息,如是影印本,则在原书名之后标注"(影印本)"字样,如是校注本,则需注明校注者姓名。举例如下:

①[清]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光绪二年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②[清]佚名辑:《华氏义田事略》(影印本),《无锡文库》第3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③[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④[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五)期刊杂志

引用期刊杂志相关信息的先后顺序为:(1)作者姓名;(2)篇名;(3)期刊名称及卷册号、期号或出版时间;(4)页码,部分期刊文献没有页码,则需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原文无页码"字样。举例如下:

①何思源:《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1922年1月),第56页。

②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6页。

③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页。

④吴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闕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第56页。

(六)报纸

引用报纸相关信息的先后顺序为:(1)作者姓名;(2)篇名;(3)报纸名称及出版时间。举例如下:

①庄希泉:《辛亥革命中的南洋华侨》,《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2日。

②魏宏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1995年7月27日。

③《无锡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为定期举开成立大会通告各界》,《锡报》1937年7月27日。

(七)未刊文献

引用未刊文献(如学位论文、未刊手稿、会议论文、馆藏档案等)除需标注作者姓名、著作名或篇名之外,还需标注文献所属机构、完成时间及页码;引用未出版的会议论文时,还需标注会议名称、地点及时间;引用档案文献时,还需标注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或按原档案自身编排方法标注;引用未刊文献时,需取得资料所有者的授权。举例如下:

①余同元:《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第76页。

②[明]华鸿山:《皇华集》卷一,木刻本,无锡博物院藏。

《无锡文博论丛》征稿启事

《无锡文博》杂志创刊于1989年,原名《无锡博物馆通讯》,1990年改现名，是无锡博物院和无锡市文物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本刊以宣传国家文博政策、促进太湖文化圈学术研究交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无锡文博事业发展为宗旨。创刊27年以来,刊物立足于无锡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广纳百川,不仅及时地反映了无锡地区的文博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全国各兄弟单位打造了文化交流的平台。

《无锡文博》从2016年起停刊,以《无锡文博论丛》形式由出版社公开出版,每年一册。现面向社会各界郑重征稿，欢迎广大业内外人士踊跃投稿。本刊所设主要栏目有:考古与文物、历史研究、艺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图书评论等。具体征稿要求如下:

一. 来稿须符合基本学术规范和《论丛》要求,《论丛》来稿格式和注释规范请登录无锡博物院网站查阅,或者联系编辑部索取电子稿。

二. 来稿须本人原创稿件,观点鲜明,资料详实,逻辑清楚,文辞畅达,文稿篇幅以8000字以内为宜。

三. 来稿除提交电子文本至《论丛》电邮外,另邮寄一份纸质文本至《论丛》编辑部。

四. 文末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电话、联系地址、电子邮箱,以便联系。

五.《论丛》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对于一稿多投的稿件,将不进入审稿程序。

六.《论丛》有权对来稿进行技术性处理,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予以说明。

七.《论丛》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和审稿费。稿件一经刊登,即付薄酬,同时寄赠样刊。《论丛》有权将稿件以印刷方式或电子方式出版，本刊给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费用。

八.《论丛》联系地址:无锡市太湖广场南侧钟书路100号无锡博物院(503室)征编部;邮编:214023;联系电话:0510-85727606;电子邮箱:wuxiwenbo@163.com

《无锡文博论丛》编辑部

关于开展2014-2015年（十三届）无锡文博界优秀论文评奖活动的启事

无锡文博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将如期举行,希望2014-2015年度在《无锡文博》发表过文章,并有意参与此次活动的作者,在2016年2月底以前,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报名。可发电子邮件至wuxiwenbo@163.com,索取报名表,也可通过邮寄的方式报名。

联系地址:无锡市太湖广场南侧钟书路100号无锡博物院(503室)征编部

邮编:214023

电话:0510-85727606